目录

[第一部分 1](#_Toc29569560)

[1.故宫文物 1](#_Toc29569561)

[2.东之桃源乡——有关徐福 1](#_Toc29569562)

[3.牧歌期的终焉 2](#_Toc29569563)

[4.关帝庙的由来 2](#_Toc29569564)

[5.气之运行 3](#_Toc29569565)

[6.二羊图 5](#_Toc29569566)

[7.青瓷色 6](#_Toc29569567)

[8.曲笔史官 6](#_Toc29569568)

[9.埋头 7](#_Toc29569569)

[10.吴越 8](#_Toc29569570)

[第二部分 10](#_Toc29569571)

[1.十八世纪的酒馆、茶馆、客栈 10](#_Toc29569572)

[2.茶馆和茶文化 10](#_Toc29569573)

[3.茶故事——茶的礼节 11](#_Toc29569574)

[4.茶故事——水和茶 12](#_Toc29569575)

[5.茶故事——英国茶 12](#_Toc29569576)

[6.茶故事——茶里加冰 12](#_Toc29569577)

[7.茶故事——乌龙茶 13](#_Toc29569578)

[8.茶故事——俄式茶壶 13](#_Toc29569579)

[9.话说麹子 13](#_Toc29569580)

[10.待春 14](#_Toc29569581)

[第三部分 16](#_Toc29569582)

[1.桥的故事 16](#_Toc29569583)

[2.威尼斯和桥 16](#_Toc29569584)

[3.鹊桥 17](#_Toc29569585)

[4.查理大桥 18](#_Toc29569586)

[5.首里城的故事 19](#_Toc29569587)

[第四部分 21](#_Toc29569588)

[1.驴的价钱 21](#_Toc29569589)

[2.金钱之恨 21](#_Toc29569590)

[3.陪购随想 21](#_Toc29569591)

[4.汽车社会 22](#_Toc29569592)

[5.同名同姓 22](#_Toc29569593)

[6.海尔比 22](#_Toc29569594)

[7.羊 23](#_Toc29569595)

[8.女性的名字 23](#_Toc29569596)

[9.夫妇别姓 24](#_Toc29569597)

[10.白菜 24](#_Toc29569598)

[11.义战 25](#_Toc29569599)

[12.常识 25](#_Toc29569600)

[13.袈裟 25](#_Toc29569601)

[14.红白 26](#_Toc29569602)

[15.升田氏的木屐 26](#_Toc29569603)

[16.典礼问题 27](#_Toc29569604)

[17.文字 27](#_Toc29569605)

[18.萨拉丁 28](#_Toc29569606)

[19.命名 28](#_Toc29569607)

[20.乌鸦 28](#_Toc29569608)

[21.俘虏的命运 29](#_Toc29569609)

[22.伸缩 29](#_Toc29569610)

[23.云仙 30](#_Toc29569611)

[24.信息化社会 30](#_Toc29569612)

[第五部分 31](#_Toc29569613)

[1.关于二十年 31](#_Toc29569614)

[2.改变视角 31](#_Toc29569615)

[3.船之眼 32](#_Toc29569616)

[4.琉球馆客商信局 32](#_Toc29569617)

[5.紫禁城的甲胄 32](#_Toc29569618)

[6.苦瓜琐记 33](#_Toc29569619)

[7.奇谈怪论 33](#_Toc29569620)

[8.酒铺泡盛屋 34](#_Toc29569621)

[9.新米利特组织 34](#_Toc29569622)

[10.清明 35](#_Toc29569623)

[11.布哈拉的劝酒文化 35](#_Toc29569624)

[第六部分 37](#_Toc29569625)

[1.械斗 37](#_Toc29569626)

[2.重温旧作 37](#_Toc29569627)

[3.落成的来历 38](#_Toc29569628)

[4.我未成名时 38](#_Toc29569629)

[5.三十年 39](#_Toc29569630)

[6.重逢之旅 40](#_Toc29569631)

[7.又一跋——《中国历史》开笔之时 40](#_Toc29569632)

[8.凝视“人” 41](#_Toc29569633)

[9.杂谈书库 41](#_Toc29569634)

[10.学生之花甲 41](#_Toc29569635)

[11.闲谈中药 42](#_Toc29569636)

[12.吉川的《三国志》和我 43](#_Toc29569637)

[13.史籍无载 43](#_Toc29569638)

[14.认识自身 44](#_Toc29569639)

[第七部分 46](#_Toc29569640)

[1.托普卡帕宫珍品展 46](#_Toc29569641)

[2.漫步卡帕多西亚 46](#_Toc29569642)

[3.勋章 48](#_Toc29569643)

[4.清代工艺 49](#_Toc29569644)

[5.生前交代 49](#_Toc29569645)

[6.药 50](#_Toc29569646)

[7.向往慈悲 50](#_Toc29569647)

[原载一览 52](#_Toc29569648)

# 第一部分

## 1.故宫文物

黄屋瓦鳞次栉比、红墙万里的紫禁城一转身成为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唯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梦魇。与黑洞洞的夜空相比只剩下那令人恐惧的噩梦。**

这是芥川龙之介描写紫禁城的名句，不禁仅让人浮想联翩，仿佛这世间就如巨大鬼神一般。

明成祖永乐帝修建的这座紫禁城迄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并迁都北京，把明朝的紫禁城摇身变为自己的皇家居所。历经战乱、火灾而严重受损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明清两代王朝的中枢都居于此。

辛亥革命后中国从此便无皇帝，因此紫禁城这座皇家宫殿便只保留宫殿之意，改名为“故宫”。据史料记载，因“故”字容易让人有思慕故乡、故国之意，有人认为应避讳此义而改名为“废宫”。无奈“废”字又给人荒废、颓废的印象，最终紫禁城更名为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多是明清两朝皇帝的珍藏品，当然还收藏了一些古代文物。但皇帝们的收藏品却未必是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精华。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多数认为明代并不是绘画的时代而是一个工艺繁盛的时代。对此我也有同感，当时特别是宫廷画家颇为不济，明代绘画可圈可点的怕是只有以苏州为中心的民间画家。虽生气盎然，但有时又因充满生气而略显俗气。色彩运用上秉承元代的染色技术，因此诞生出绚烂夺目的五彩陶瓷（彩瓷）。

文物的艺术造诣可以让我们察知当时政治上的腐败程度。到了政治混乱的明末，文物也开始落寞凋零。这种连锁反应在制作工艺品中尤为突出，如明末景德镇陶瓷的颓败之象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清代作为前明的继承者勉强地维持着传统，又因政治稳定呈现一副复兴者的姿态。景德镇也得以再兴，藏应选、年羹尧、唐英这些优秀的督陶官受皇帝委派制造出了出类拔萃的官窑作品。

处于黄金期的清王朝不惜重金制造名器，不仅是景德镇的官窑，紫禁城内还设置了制作漆器、玻璃器、珐琅器、家具、玉器等的工房。虽然是制造宫廷生活所需之物，但这一小撮宫廷人竟是如此奢华，不禁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抵触感。这些高超的技艺逐渐渗透到宫廷之外，给民间匠人带来积极影响。因此不要把宫廷完全看作另一世界，毕竟制作器物的主要还是那些生活在宫廷外的匠人。为匠人们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时间让他们在创意上下功夫，我们窥视到故宫文物背后的当时社会的富裕。清代文物的特点是追求顶级精致，前代单纯明快、倜傥的特点逐渐黯淡失色，过于追求工艺化，虽精巧却欠缺力量，不久便隐现颓败之色。

接触故宫文物可以让我们遥想当时宫廷生活的神秘与特殊，还能够领略历史巨涛，感受那个时代匠人的气息，俯首便能聆听到文物对我们的无言诉说。

## 2.东之桃源乡——有关徐福

桃源乡是中式乌托邦。说的是成功逃出秦朝暴政的一群人隐匿在人迹罕至的武陵，秦亡汉兴、三国兴亡与魏晋交替都全然不知。陶渊明（365—427）的《桃花源诗》中说的便是此事，闻听太元年间（376—396）有人曾前往此处而后不能复去，六百年间与世隔绝。

桃源乡故事讲述了老百姓对秦的暴政苦不堪言。尽管秦实现全国大一统后实行专制，但对于险峻的偏远地方却也鞭长莫及，那些逃到深山老林里的人经历的都是亡命之旅。谁都想逃出秦之暴政却又怯于令人绝望的亡命之苦，多数人不得已只能向秦低头。

不难想象沿海地区想要逃到海外的大有人在。遥想当年一定有许多渡海人出现在黄海和东海之上。危险自不必说，若想安全则需投入巨资准备大船。私以为徐福应该是头脑聪明打算亡命之人。为逃脱秦的虐政谎称知晓长生不老药的仙人居于东方海上三神山上，以此骗得秦始皇出巨资建大船，待一切准备就绪就“好，再见”扬长而去。徐福要求秦始皇派童男童女三千人、五谷种子、百工（技师、工匠等），这难道不是做集体移居的准备吗？

日本把徐福看作一个传说，但徐福出航东海三神山也不过是司马迁出生七十年前的事，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代。换作现在就好像三十多岁的史家记述日清、日俄时的事一样，并不是记载神话和传说。司马迁也不是喜欢怪谈的性格。通常说中国历史始于三皇五帝，但司马迁认为三皇时代不过是个神话，断然从五帝开始记述《史记》。而始皇帝的故事中最精彩的，当属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失败一事。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撰述始皇虽很危险但连轻伤都未负。据说当时因偏袒荆轲，坊间才有传始皇受伤的说法。司马迁认为这一说法是谬传，他经过调查使得真相大白于天下。

站在始皇宝座周围的侍卫禁止身带寸铁。荆轲献上地图时图穷匕见，除了佩剑的始皇外无一人携带武器。侍医夏无且急中生智，将手中的药箱扔向刺客。夏无且因为是御医所以在场，他很长寿，还把当时的情况对公孙季功和董生二人做了详细的说明。司马迁又拜访公孙和董生二人，终于澄清了始皇受伤一说。

徐福东渡时间上比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要晚一些。司马迁对徐福一定做了详细调查，与徐福同时代以及亲耳听过此事的人都是司马迁走访的对象。《史记》里不仅《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中也提到过徐福。徐福既非传说亦非虚构之人，是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物。我综合多方说法认为他就是集体亡命移民的首领。

时期上看那刚好是日本从绳文向弥生的过渡期，也可以把徐福东渡看作文化转换的一个诱因。窃以为徐福背后还有无数个想要逃走的人，只是那些人都没有他那样的才华，也没有始皇帝资助。乘小船东渡成功的“徐福”即少数渡海者的不断到来，开启了日本的弥生时代。

## 3.牧歌期的终焉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无疑是无电报时代的最后一场大战。1837年莫尔斯发明电报机，虽然鸦片战争中还未使用电报，但接下来1853年打响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即1851年英国就已在多佛海峡铺设了海底电缆。拿破仑揭开十九世纪之幕，他也是无电报即牧歌时代的战争英雄。

产业革命促使西方各国迅速发展，尤其是英国取得飞跃性发展。快速发展促使英国向东拓展，从而加速东西方融合，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主导向东扩张。鸦片商人是先头部队，苏格兰人渣甸、马地臣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派到广州进行禁烟的林则徐接触的就是这些人。说是接触，但是清朝的大官不能随便接见外国商人，朝廷也不允许随意接触，英方为打破这一禁令做出多方努力。清朝的大官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与受到户部海关监督的中国特许商人（行商）做生意。外国商人如有要沟通的事需要通过特许商人传达给户部。这是中华思想的一种体现。

林则徐与其他前任官员相比要开明得多。他的老家在福州，那里有琉球馆，以朝贡的方式与清朝进行贸易。附近的泉州自古便是繁荣的贸易港，那里有几万阿拉伯裔的穆斯林。林则徐的开明可能是受到这样的成长环境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其自身人格优秀。

一旦接到任务便迅速收集相关信息从而了解对手，这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情，对于身受中华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却并非易事。林则徐就是一个与众不同之人，他命人翻译驻华外国人办的杂志《中国从报》（Chinese Repository），还组织译员翻译穆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分别命名为《澳门月报》和《四洲志》。不仅如此，他还委托广州医疗传道会的美国医生伯驾翻译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著作《国际法》（Law of Nations）的主要部分，命名为《各国律例》。他在拼命努力地研究对手。

清代的学术主流是考证学，从追求严谨考证的科研态度中可以窥视到科学的萌芽。步入十九世纪后，除了伦理道德，重视政治经济的公羊学也十分盛行。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等都热衷于公羊学，东亚并非远远落后于时代主流。

遭到革职的林则徐赴新疆上任前，把《四洲志》等资料交给当时住在扬州的魏源。魏源根据这些资料写作了介绍外国历史和地理的《海国图志》。此书由中国船运至长崎，在日本翻印成多个版本，给幕府末期的知识分子带来巨大影响。吉田松阴（1830—1859）、桥本左内（1834—1859）都是此书的忠实读者。中国的初版时间是1842年，日本昌平坂学问所的翻印时间是1854年。

与西方冒险商人有过交锋的林则徐开明而优秀，《海国图志》把林则徐和日本的维新派联系到一起，这还是一种相对平缓、明了的关联。

开篇说了一些电报方面的事，尽管如此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信息传递还没那么迅速。苏伊士运河开通于1869年，鸦片战争时英国舰队就已经能从遥远的非洲南端绕到东亚。

十九世纪后半期，通信和交通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发展。到了现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不由得跟着变复杂起来。

## 4.关帝庙的由来

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人。因犯事逃离家乡到涿郡。《三国志》的《关羽传》中如上记述。所谓亡命就是出逃，那他究竟为何事出逃，《三国志》中并没有说明。河东郡的解县就是现在山西省运城，那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优质盐产地。中国各朝各代都严禁私盐，一旦朝廷财政吃紧便增加盐税。又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论怎么涨价，老百姓都不得不买。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涨盐税而更加贫苦。盐的价格原本很便宜，而盐税却极其高。所谓的私盐指那些没有课税，价格便宜的盐。贩卖私盐对于朝廷来说是逃税行为，但对老百姓却是一种难得的救济。朝廷对私盐管制的严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一旦触犯恐怕会是极刑吧。在史家中有人推测关羽可能因贩卖私盐被朝廷追究而亡命。贩卖私盐是让老百姓高兴的举动，但也是掉脑袋的事，可以说是一种侠义行为。在三国演义里关羽便是除暴安良而亡命他乡。

投奔刘备后关羽的经历便众所周知了。三国演义的开篇就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正史中也记载三人情同手足、同吃同睡。公开场合下关羽始终立在刘备身旁雷打不动，始终坚持“义便是君臣之道”。对于关羽而言，“义”便是最高道德。

建安五年（200），刘备在小沛兵败曹操逃至袁绍处，驻守下邳城的关羽被曹操擒获。当时刘备的妻儿也在下邳城。曹操厚遇关羽，拜其为偏将军。重视人才的曹操十分赏识关羽，但关羽却对刘备忠心耿耿曾立誓要生死与共，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因此执意要回到刘备身边，可是又不得不报曹操的知遇之恩。这便是关羽重情义的地方。不久袁绍让颜良率军万余攻打白马城时，关羽策马千万众之中杀颜良，解了曹军的白马之围，立下大功。关羽报了曹操的恩情，带着刘备妻儿成功离开。曹操因白马一役更加喜爱关羽，还封他为侯，无奈关羽去意已决而拜书告辞曹操。手下要去追击关羽时，曹操说“不要追杀他了”。真可谓英雄惺惺相惜。

赤壁之战后，关羽任襄阳太守，又为荆州的军政总督。刘备自立汉中王后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委以重任。《三国志》中评价关羽“刚而自矜”。刚强的另一面便是欠缺柔韧性。虽说关羽是战场上的猛将，却不擅长外交斡旋。那时曹魏为破坏蜀吴同盟可是费尽心机，最终蜀吴同盟因此打破。

关羽曾擒获魏的左将军于禁并俘获数万之兵。他为解决俘虏的粮食问题擅自挪借吴国在湘关粮仓的粮食。因为是同盟国，关羽本打算临时拜借后再去道谢，不料却惹怒了孙权。对于重义的关羽而言，“同盟”就是在困难时刻能够相互融通。但实际上乱世中的同盟关系并没有如此稳固，终究会因为势力和利益而动摇。

魏和吴为了打败关羽而结盟，情势对蜀变得不利。孙权命吕蒙为大督、孙皎为副将攻打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而走麦城。后虽成功脱身，最终还是被吴军擒获，和儿子关平一同在漳乡被斩首。

关羽是弱者的朋友，因怜惜下属而被部下所仰慕，但是对上却刚正不阿。粮食不足时关羽让南郡太守麋芳送大米万石，还补充说“少一石都不行”。这种命令语气惹怒南郡太守并停止军粮供应。关羽也大怒说：“这边的仗打完了就回去砍你们的头。”麋芳闻此后便向吴投了降，因此粮食和援军都没有了下文。离襄阳最近的上庸有友军派来了一小股援军，不料却因关羽的一句“不要做得太过”便再无援军来。孤立无援的关羽最终被斩杀。

世人都怜惜关羽。关羽的首级送到曹操那儿，曹操以安葬侯的规格厚葬。大概曹操也为这样一位耿直侠义人物的死感到惋惜吧。连一向冷静的刘备也为关羽的死而激愤不已，发动复仇战大败孙吴。

进攻关羽的孙吴名将吕蒙之后病死，副将孙皎也几乎是同一时间死亡。葬了关羽首级的曹操后来也病死洛阳。大家都认为这是关羽对他们的报应。《三国演义》里说吕蒙被关羽的冤魂附体而闷死。

关羽死时，刘备已是汉中王，但是成为蜀汉帝则是两年后的事。关羽虽然是在主君还没成为皇帝时便死去，却仍被称为“关帝”。而如此受到世人景仰的诸葛亮，为拜祭他所建的还只是“武侯祠”，既不是王也不是帝之称谓。有说法说人们害怕抱憾而死的关羽之魂来报应才赠与帝位镇他的魂。吕蒙、孙皎、曹操相继而死更加让世人心惊胆战。不仅是这些理由，还有世人对他孤立无援的遭遇表以同情。《三国志》中评价说他不得不为“刚而自矜”这个缺点而死。有长有短，这样作为人不才更真实吗？比起几乎没有缺点的诸葛亮，人们觉得关羽更接地气吧。

报恩曹操后拜书辞别，这种耿直堪称后人典范。年轻时誓死忠心的关羽还象征“守约”。据说现在有些高端商务人士希望彼此像关羽那样重信任，这成为大家信仰关帝的理由。

## 5.气之运行

《三国志》的亮点之一便是五丈原之战。魏的司马懿问蜀来使“诸葛公近来可好？”蜀来使回答说：“诸葛公朝起晚睡。打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是诸葛公自己阅批。”过后司马懿便对亲近的人说：“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

果然没过多久诸葛孔明便死了，享年五十四岁。军使回答的原话是“夙兴夜寐”。据说孔明从早到晚忙于军务。小事委托给别人就好，但是孔明却连罚二十军棍这样的事都要亲自过问，这样的话身体自然吃不消。

孔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操办。也许有人会说比起魏、吴，蜀的人才匮乏，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也有人反驳说既然人才匮乏就应该大力培养人才。实际上在丞相府中，孔明一直在努力培养人才，无奈还没有培养成才。

《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记载他身高八尺，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东汉时期一尺是23.04厘米，这样算来诸葛亮是一米八五的身高。他年轻时便被称为“卧龙”，不仅是身材高大还十分魁梧。可是总是“夙兴夜寐”的话难免会损耗体力，久而久之便会生病。

在中国，诸葛孔明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了。他在北伐途中死去，他本人定是因遗志未完成而感到遗憾。偏爱他的人不无惋惜地说：“要是有良医在身边给他些保健建议就好了。”

相传名医华佗活到近百岁被曹操所杀，当时应该确实已死。但是华佗的弟子尚在，蜀应该聘请一位为孔明医治。《东汉书》中记载了华佗的两位高徒吴普和樊阿，华佗教吴普五禽戏，教樊阿《漆叶青黏散》的方子。

华佗说，人活动身体十分重要但不能过度运动。五禽戏就是将虎、鹿、熊、猿、鸟的动作纳入体操之中。禽兽会本能地采取自己最舒服的姿势来运动。华佗应该是充分观察禽兽们的动作后编成健身体操。比如说熊拽着树枝而悬垂，把此动作称为“熊经”。还有猫头鹰身子不动只是脑袋左右摇摆，“鸠顾”说的就是猫头鹰回头这个动作。

在五丈原和孔明对峙的魏已经到了曹操孙子明帝的时代。明帝召来吴普命他把华佗教的五禽戏实际演练一遍。无奈那时候吴普已经九十高龄，“年迈到手脚都不能相配合”。因此吴普拒绝实际演练，只是向明帝的御医们口述了五禽戏。这个故事出自《佗别传》，里面还记载说九十岁的吴普依然耳聪目明牙齿完好，吃饭也没有一丝不便。

华佗告诉吴普说此法可以通血脉不生病。“借助此法便可以实现古代仙人做的‘导引’”。“五禽戏”便相当于“导引”。根据华佗说的可以推测出往昔的仙人做的“导引”只是被记载了名字，不知道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所以华佗说“五禽戏”相当于以前的“导引”。

日本历史小说的舞台或是战国时代或是幕府末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时期或那之前的楚汉（项羽和刘邦）争霸的时代。而三国时代的头号英雄当属诸葛孔明，楚汉争霸时代恐怕当属张良了。与诸葛孔明那绝对压倒性的受欢迎度相比，张良要逊色不少。这是因为张良功成名就享尽天年，不像诸葛孔明那样壮志未酬充满悲剧性。日本也是时运不济的悲剧英雄更受崇拜，如源义经、楠木正成或西乡隆盛。

张良生于战国时韩的宰相之家。韩被秦始皇灭了后，张良为了复家国之仇可谓鞠躬尽瘁。秦灭亡后，张良追随刘邦成为其谋士，为灭项羽立下汗马功劳。孔明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张良却帮助刘邦成功实现天下一统。工于智谋这一点上，张良或许在孔明之上。

主君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封张良为留侯。让人意外的是尚未老矣的张良选择功成身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良多病”，而且容貌如美女，就是通常说的温文儒雅的男人。他在体格上恐怕难以企及大丈夫诸葛孔明吧。

天下一统后选择立刻从第一线引退也许是因为身体原因，但是纵观全局，引退不失为明智之举。王朝建立后，功臣们逐个被肃清。因为刘邦的妻子吕后是猜疑心十分强的人。刘邦的同乡萧何和曹参得以幸免，中途侍主的韩信、黥布、臧荼、彭越等均以谋反罪被处决。张良虽然也是中途侍主，但因为及时引退又表现得“无欲”而免于被肃清。引退后的张良，《史记》中这样记载：乃学辟谷，导引轻身。“辟谷”也说“避谷”，就是不吃谷类。而且这里出现了“导引”和“轻身”。总括这三点就是“避开谷物、进行导引、使身体轻快”。无论是不吃谷物还是导引和轻身，都是通过这些手段使身体健康。

张良卒于公元前168年，比诸葛孔明早死402年。张良那时候说起“导引”不需要任何说明就知道是什么。可是四百年后连神医华佗都要去推测自己创制的“五禽戏”怎样才能和导引对上。《史记》中的《龟策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这里能推测出导引能致气，将大气导入体内。只是具体方法在文献中没有记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华佗那个时代。要赘述的是“导引”这个词早在《庄子》中就已经出现，从时间上说要比《史记》早三百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袓寿考者之所好也。”这里说的熊经鸟申与华佗说熊经、鸠顾是同样的作用吧。调节呼吸、想要促进新陈代谢的导引之士注重通过身形进行锻炼，如彭祖（传说中的寿星）这样的长寿者都喜欢这种方式。庄子批判说“不导引就能长寿”不过是个梦。现在已经不能详细探究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了，但是从诸多文献中可以推测出那个时代，导引已经是极为普及的健身法。

1971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的一号墓中发掘出的一具“栩栩如生的贵妇人”，成为轰动世界的大新闻。之后出土的三号墓主人据说是一号墓贵妇人的儿子，从他的墓里发掘出四张帛画，其中就有一幅“导引图”。不仅有文字记载，图也终于现身了。

将气导入体内就是“导引”，从这点上看呼吸比什么都重要，是根本的根本。三国时代华佗用“五禽戏”把这种健身法延续了下来。那之后的中国，以呼吸法为中心、对“气”的导入成为健身法的主流。但是三国之后佛教在中国得到普及，印度的瑜伽也随之引进来。Pranayam译为“调息”，指在体内蓄积气并将它转化为能量用来消灭“业”。虽然宗教修行与健身在目的上有着显著的差别，但是重视能量这点上倒是很相似。因为有这样的共通之处所以引进时没什么阻碍。

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话题“气功”，从广义上讲就是从导引到瑜伽修行的一个综合体现。不论走到中国哪儿，早晨在公园和广场上都能看到练气功或太极拳的景象。气功与太极拳在境界上有种说不出的相似，因此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哪个是气功哪个是太极拳，都体现“静”，没有激烈的动作。正如太极拳术语所说“用意不用力”，表面上看没有激烈的动作，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做舒缓心情的动作，强调随意，因此老人也能练。体弱多病的人也能根据自己的体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

诸葛孔明肯定读过《史记》，对于同样做谋士的张良一定抱有亲近感。但是他却没有像张良那样“辟谷、导引、轻身”。

## 6.二羊图

十二生肖的贺卡中，“未”字图像是相对易懂的。因为“羊”这个汉字本身就展现了羊头生角、留着山羊胡的形象。说起有关羊的画，我首先会想到美国佛利尔美术馆馆藏的赵孟頫的《二羊图》。我在执笔《中国画家传》（日本《艺术新潮》上连载）时写赵孟頫的部分就列举了这幅画。画的题目是《二羊图》，如题所示画的是两匹羊。一匹体态肥硕，用润笔画法所画；另一匹则用渴笔画法画了一只低着头的安哥拉山羊。润笔画的羊昂首望向右侧的山羊。

赵孟頫另一幅名作是《苏李泣别图》。“苏”指的是因拒绝投降被匈奴扣留，在贝加尔湖畔牧羊十九年的苏武。“李”无疑是指与匈奴交战，最后刀折箭尽成为俘虏却被匈奴厚遇的李陵。匈奴首领命令李陵劝降苏武。这幅画就是苏武拒绝李陵的劝降，二人哭泣分别的场面。

现在《苏李泣别图》已经失传。据记载，画中羊披着苏武的衣裳。我想《二羊图》是不是这幅充满梦幻色彩的名画的副产品呢？低头那只羊象征着降服匈奴的李陵，昂首的那只象征着坚持拒降保全气节的苏武。但是看了实物后，我推翻了这种想法。

因为那只低着头的安哥拉山羊看上去是伺机而动准备战斗的状态。另一只昂首的羊则一副十分满足的样子，就好像酒足饭饱拿着牙签的神态。如果硬让我说，我觉得渴笔画的山羊是苏武，润笔画的是李陵。因为怎么想苏武都不会是那么一副肥硕的样子。

画这幅画的赵孟頫是南宋的皇族。他是北宋太祖的四子赵德芳的第十代孙子，却投降了蒙古族人。普通汉人向蒙古族人投降是无可奈何之事。身为宋的皇族却投降，难免招致批判。

他通过这两匹羊要表现的，既不是投降的李陵，也不是保全气节的苏武。或许赵孟頫想要表述的是心里既住着苏武也住着李陵吧。每每看到这幅画我都更坚定这种推测。李陵孤军奋战到最后却没等来汉武帝的援兵。因为李陵的投降，他在长安的家人不分老幼全被武帝诛杀。至此李陵与汉朝恩断义绝。人都有各自的苦衷，李陵和苏武各有各的立场。同样赵孟頫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他觉得自己既能理解苏武，也能理解李陵。

体型丰满、长着算不上武器的涡形羊角的羊可能体现的是晋升为元朝正二品翰林学士承旨的赵孟頫。但在元朝仕途坦荡却成为他的痛苦之处，这种屈辱通过低头的山羊来表现。即便都是羊也是什么类型的都有。长角的动物要攻击时会先低头，因此这种姿势或许表现的并不是屈辱而是一种反抗。同一姿势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赵孟頫在画中题诗道：“余尝画马未尝画羊。”非常棒的说法。由此句也可知他以画马而闻名，因为过于有名而出现了大量的赝品，所以能鉴定为是他真迹的画反倒已经没有了。不得不说是个很讽刺的事。

成语“以羊易牛”出自《孟子·梁惠王上》，讲的是齐宣王看到祭钟用的牛从堂前经过时惊恐万分的样子，便让人将其换成羊。新钟做成后为了让其声音更洪亮，要杀动物用其血来祭钟，宣王说如果需要血，他有。这种祭典称为“落”，与落成、落庆一类词是同一系列。用羊换牛这一典故让齐宣王落得个吝啬鬼的称呼。孟子对此评价“见牛未见羊也”。齐宣王亲眼看到牵走的牛，觉得很可怜，便命人救它，而那只替代牛被宰的羊，宣王没有亲眼所见。之后便有了孟子的名句“君子远庖厨”，说的是君子，即绅士不进厨房，理由并不是会成为蟑螂主人这样的事，而是君子听到动物被杀的悲鸣会无法咽下那些肉，如果听不到悲鸣声就能心安理得地吃肉。据说以前是在厨房里屠宰动物，为了能享受美味的牛排要远离厨房，才会有好心情。

泷泽马琴对于齐宣王的以羊易牛做出这样一种解释，说是牛在死前会很恐惧而羊却完全没有恐惧之色。此观点受到志村知孝的反驳，真正被推翻则是大正八年（1919）一月号的《太阳》上南方熊楠的随笔《有关羊的民俗与传说》。据说羊十分温和，即便是死前也不会哭叫，在人看来是能够下得了手的动物。有“替罪羊”一词，指对于人们的憎恶或不满，作为替罪的牺牲品，只有羊被认为是合适的。

而中国古代镜子铭文中“羊”字屡见不鲜。羊通“祥”，后来象征着吉祥，“祥”“美”“義”“善”等字都是由“羊”衍生而来，都有“好”这层意思。而羊又被看作恶，需要宰杀动物时便把羊作为替罪品带走。古时候请求神灵给出旨意时，需要把羊作为贡品贡献给神，后来人们就把贡献羊看成将有好事发生，便衍生出“美”“義”“善”这样的汉字。

赵孟頫画的马已经成为梦幻般的名画，由他的《二羊图》也会想到马。晋朝的武帝（265—290年在位）就真的用羊来替代马拉车，他坐着羊车在后宫里到处逛。吞并吴之后，后宫美女的人数竟达到了两万。女人们都各自有局（房间）。武帝也是个懒家伙，羊车停在哪儿，他便在就近的局过夜。羊喜欢盐，聪明的宫女便在自己的局前撒上盐，羊车便停在那里。日本接待客人的服务场所也会在店门口盛放盐，据说就是源自这个典故。

## 7.青瓷色

——类玉，类冰

被誉为茶神的唐朝人陆羽（733—约804）在《茶经》中用开篇这句话来形容越州的青瓷是饮茶最好的器具。用玉作比喻是因为中国人把玉看作最宝贵的东西。下功夫把陶瓷做得像玉，是烧陶师傅们的奋斗目标。用冰做比喻是追求冰清般的品质。

越州青瓷被誉为“秘色”，在日本读作“ひそく”（HISOKU）。因为冠上了“秘”字自然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对于神秘感有诸多解释，如研制出这种颜色的技术是秘密级别、平常人没机会看到藏纳在深宫之中的最高级宝物之类的说法众说纷坛。而“美轮美奂之色”恐怕是最为恰当的形容吧。

一个世纪后，与陆羽同姓的诗人陆龟蒙的诗作《秘色越器》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成就了越州青瓷另一称呼“千峰翠色器”。秘色虽然是理想的颜色，但是每个人心仪的理想颜色又是千差万别的。上万人都喜欢的颜色，反倒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吧。严格说，哪怕是同一人，受心理状态、氛围、身体状况的影响，喜好也会有微妙差别。

后周世宗柴荣（921—959）是出了名的明君。他的部将赵匡胤建立了宋王朝。后周世宗在京城开封开窑烧青瓷，当时家臣问世宗：“您要烧制什么颜色的瓷器？”世宗答道：“雨过天青云破处。”意为刚下过雨之后的那种青色天空。要破云而出开始放晴时刻的青色，就是这样一种难以实现的要求。每当想起这段插曲，便想亲眼看看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青色。世宗开办的官窑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柴窑”，出自柴窑的瓷器取名“雨过天青瓷”，其壁薄如纸，叩一叩便发出磬般清脆之声。

虽说文献上这样记载，但真正的雨过天青瓷一件也没发现，柴窑的窑址也未发现。也有人认为压根儿就没有柴窑。梦幻般的窑，梦幻般的名品，一切都只能依托人们的想象，这是种快乐的想象。想象虽然因人而异但绝不会差距太大。雨水洗刷过的清新的草木绿色，再映衬着雨过天晴后的青色天空，这种伴着湿润气息的理想中的青色难道不是大家都能够想象到的美吗？

陆羽用玉来形容一定是要强调玉的润。陆龟蒙的《九秋风露》也是润意盎然。古越州大概是现在浙江绍兴一带，其中余姚窑址尤其多。因为是官窑，有很多出色的陶工，烧陶的精湛技术传到民间，在龙泉窑开花结果。龙泉窑烧制了大量青瓷，有很多还流传到了日本。那些青瓷有的是淡青色，还有暗青色。暗青色实际上要表现的是浓重的润色。可能是龙泉窑的陶工们分两派，一派认为“雨后的天空”是理想之色，另一派把“雨后的山”当作理想之色。两方都费尽心力要呈现那种润的情趣。暗青便是山派的力作，淡青则是天空派的力作吧。

韩国新安海域打捞上来的沉船上发现的大量青瓷都出自元代的龙泉窑。在光州博物馆看到这些瓷器时，我觉察除了山派和天空派外，可能还有海派的存在。可能是从海中打捞上来的缘故让我产生这样的联想，表现海的青色也让人十分沉醉。

“青”字多用于表现青年、青春这样极富生命力的事物。我们青睐各种青色，透过青瓷色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其实是热爱生命的表现。润泽生命之源的是水，水以各种形态充满海、山、天空。仔细一想，作为矿物质的玉、烈焰淬过的陶瓷其实都暗藏着人们对于润物情怀的一种浓浓的憧憬。唐代白居易（772—846）有诗云“楚山插云青”，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这与后周柴宗试图要准确表现的“雨过天青云破处”有着共通的审美情趣。

青色既表现生命力，还是某种遥远的象征，这种遥远又与我们的憧憬相连。宋代的苏东坡（1037—1101）被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得以赦免，从海南岛北岸渡海回中原前作即兴诗一首，诗收尾句中有“青山一发是中原”。遥望对岸的中原大地，远远望去青山仿佛一根发丝。苏东坡眼中的发丝像是一条发黑的线吧，这便是映在他心中的“青山”。鲜艳的青色让他感动不已。

## 8.曲笔史官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是高祖的二皇子。当时年长他九岁的兄长建成理所应当成为太子。李世民身为次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父亲高祖也欲重立太子。长子建成深感危机，企图杀掉弟弟，不料世民却制造了“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兄长。这是记入唐朝正史的大事件。

唐朝初年有个叫许敬宗的好色贪婪的史官，拿到贿赂便替人篡改史录，因此读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例如远征高句丽战败而归的将军贿赂他便被写成勇猛之将。皇太子建成嫉妒弟弟的功勋，那皇太子就没有功勋了吗？

从山西起兵征战的高祖李渊长驱南下攻进长安，由此建立唐王朝。攻长安城时表现最出色的是名叫雷永吉的猛将，他是建成的部将。但是史录中只写了雷永吉最骁勇善战却没写他是谁的手下。弟弟世民的部将一旦立战功便定会明示是他麾下之将。西河诸郡不归顺，高祖便起兵征讨。唐《实录》中记载的是高祖命世民前去讨伐。可是高祖的文书记录官温大雅在《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的是命建成、世民兄弟二人去讨伐。宋代史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对照这两种史料，采用的二人同去征讨的观点，他认为“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另外根据《实录》撰写《旧唐书》的殷峤在传记中也记载了他跟随建成远征河西这段经历。

如果记载长兄有战功的话，就无法使太宗弑兄这段历史正当化，因此史官蓄意曲笔将建成的名字除去。自以为已成功将建成的功绩抹杀，始料未及的是这段历史还出现在他人的个人传记当中。许敬宗这个史官怕是没有仔细检查过吧。自己受皇帝之托将建成太子的功绩从历史上抹杀掉，连这种尺度的事情都做了，许敬宗定是觉得收取贿赂曲笔历史这点儿事情不必介意吧。对于书写历史的人来说，这种人永远都是反面教材。

## 9.埋头

万历朝鲜战争时，宁远侯、名将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率四万援军入朝。《明史·李成梁传》中这样记载：“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所谓高祖指祖父的祖父，从朝鲜归附来的李英是李成梁上三代的祖先，也是李如松上四代祖先，因此李如松义不容辞率援军赶赴朝鲜。铁岭在沈阳（旧名奉天）的北面，现在已经成为市。李英被任命为指挥佥事或许是因为内附之功，还是世袭官职。卫的长官是指挥使，副长官是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是再下一级的官职，就相当于中级将校。

虽说是世袭但并不是无条件地继承父亲的官职，只是有这个资格，必须赴京办理相关手续，按规矩还要向各处送礼打点。据说李成梁因贫穷一直没能办理世袭手续，到四十岁还只是生员（非正规官职的属吏）。幸得有看中他才能的人，为其提供赴京和办理袭职手续的费用，使得他终于获得正规军职。虽说大器晚成，但任正规官职后如坐火箭，四十五岁便升到师团长级别。他军事才能、政治手腕兼备，升迁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时归顺明朝的建州女真族首长王杲偷袭抚顺，杀害明军官，李成梁率领六万明军进行镇压。王杲逃到另一女真族部落哈达部，海西部首领万汗却将他交给明朝。王杲被斩杀，其子阿台伺机复仇。而哈达部的万汗，听命于李成梁攻打阿台。

后来建立清王朝的太祖努尔哈赤一家此时在李成梁处。他们是建州女真的一个部族，后来称姓爱新觉罗。爱新意为“金”，觉罗意为“部族”，自称黄金部族。现在在中国爱新觉罗家族人数虽不少，但也有因为四字姓比较麻烦而改姓“金”的。川岛芳子原名叫爱新觉罗·显玗，平时用金璧辉这个名字。爱新觉罗一族归顺出身朝鲜的李成梁将军，攻打阿台。那是1583年的事，李如松出任山西总兵（连队长），不在父亲军营中。而敌人阿台的妻子却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妹。努尔哈赤的祖父为救出自己的孙女和儿子一起前往古勒城。也有说是去做劝降工作。可是二人还未到古勒城，李成梁便已发动进攻，二人因此而死。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同时失去了祖父和父亲。也许李成梁并不知道他们二人在古勒城。他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头马作为抚恤金。

明朝对女真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为防止他们联合起来产生有威胁的势力，便采取这种方针政策。女真族同明朝主要交易药用人参和珍珠。做交易必须有敕书，而敕书只有三百份。尽可能地把这三百份敕书按人头分发给三百个首领级的人，让他们利益均分不相上下。可是这项政策的执行者李成梁早已对这些首领频繁不断的纷争厌烦不已。确实，比起团结，纷争不断的局面自然是对明朝更有利的情势。可是这也有个程度的问题，到处都是争斗，辽东地区骚乱不断，作为当地的第一责任人确实会感到头疼。李成梁扶持中等实力的女真族势力，与其密切接触合作来谋求当地和平。基于此种想法，他努力培养努尔哈赤成为“中等力量”，也是对努尔哈赤有愧疚之心才这么做的吧。

没承想努尔哈赤不仅发展成“中等势力”，而且壮大到“超大势力”，最终取代明朝。这是李成梁失策之处。之后努尔哈赤与明朝交战时列举出七条开战理由，其中二祖（祖父和父亲）之死就是这“七大恨”之首——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努尔哈赤在眼看就要夺取山海关时愤愤而死，这已经是二祖死后第四十三年的事了。

努尔哈赤未立储而死，经部族会议商议决定拥立八子皇太极为王。皇太极时年三十五岁，正值壮年。还有说努尔哈赤最中意的继承人是十五岁的十四子多尔衮。私以为所谓“正史”都由胜者所写，因此读时多要批判地去读。继承王位的皇太极史称清太宗，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虽未立储，据说努尔哈赤留有遗言命大妃那拉氏殉葬，而她正是多尔衮的生母。努尔哈赤想让多尔衮继承王位，那少皇帝背后有这样一位年轻美貌的母亲（那拉氏时年三十七岁），恐生乱政之事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需要留殉葬的遗言。努尔哈赤的殉葬要求在乾隆时代便从《实录》中删除，而这百年之中一直遭人诟病。

据朝鲜的记载，努尔哈赤临死时把次子（长子已死）代善（时年四十四岁）叫到身边说：“想立多尔衮为王，只是他尚年幼，你先摄政之后再将政权交给他。”谨小慎微的代善把如此重大的使命让给了更加积极有实力的皇太极。《李朝实录》中明确记载太宗（皇太极）是“夺位而上”。

而太宗皇太极于1643年因为猝死也未立储。长子豪格固辞皇位，九皇子福临六岁登基，即后来的顺治帝。努尔哈赤中意的继承人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实力不可小觑。豪格固辞的原因恐怕与这位叔父有关吧。

难道多尔衮没有觊觎帝位吗？他将顺治帝的生母也是他的嫂子娶为妻，于是成了皇帝的继父。满族人娶已是寡妇的嫂子为妻原是很平常的事，但他们经过儒教化后便十分忌讳这种“野蛮习俗”，便把皇太后再婚这段历史也从《实录》中删除了。但是据《李朝实录》记载的仁祖（李倧）二十七年的史料来看，虽然清朝文书记载摄政王多尔衮是“皇叔”，仁祖却怀疑他才是名副其实的“皇父”。血缘关系上看是“叔父”，但是和自己的母亲结婚不就成了“父亲”了嘛。不论删除多少内容，事实总是在不经意之处显露真颜。

勿歪曲历史，记载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听着这样的呼声不由得想起清初那些篡改历史的插曲来，于是便有了今天的这篇。

## 10.吴越

说起吴、越便有种很强的宿命之敌的感觉，还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而且吴和越距离非常近。赖山阳**[[1]](#_1__Jiang_Hu_Hou_Qi_De_Li_Shi_Xu)**《泊天草洋》一诗的开篇便是“云耶山耶吴耶越耶”。彼岸朦胧可见的是云还是山？是吴还是越？不能确定。诗中也表述了吴越两地离得近。吴具体指今天的江苏省，越指今天的浙江省，两省有时也总括起来称为“江南”。

相邻自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反过来也会相互排斥，有利害冲突时便成为宿敌。例如以色列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是诺亚儿子含的后裔，语言上同属闪—含语系。可是现今双方却相互憎恨好像宿敌一样，吴、越的情况与之类似。追溯历史会发现吴、越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比起中原要晚得多，但这种滞后不是文化方面的滞后，即使是文化领域也不过是“记录”这方面有些滞后。文字由黄河文化圈即中原的殷所造，于是中原地区很早便开始使用文字进行记录。而造铜冶铁乃至制造锋利的刀剑技术方面吴、越就远超中原，吴有名工匠干将和莫邪夫妇，越有欧冶这样的铸剑名人。

越王勾践的铜剑还曾在日本展出，只见剑身布满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即使历经两千四百余年两从刃依然锋利。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据展览会的图录记载，剑身上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用何种方法雕刻上去的，现在的工艺家们依然没弄明白，如此高超的技术怕是不逊色于中原吧。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一直想把吴越的名剑弄到手。据说吴王阖闾是名剑收藏家，将三千把名剑作为陪葬品纳于自己的墓穴。始皇在二百七十年后打开阖闾墓，自然是奔着那三千把名剑而去。传说挖掘途中因猛虎现身而不得不停止，虎丘这个地名便由此而来。盗掘形成的大水泡里积满了水，据说此处就是埋剑之地，人称此地为“剑池”。附近的大石头上碑刻“虎丘剑池”四字，传说是唐朝颜真卿（709—784）的真迹。

铸剑技术留下确凿的物证，而造船技术也超越中原的说法却没有留下相应的佐证。自古便有“南船北马”一说，中国南方以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因此造船技术水平先进则不言而喻。

吴西面的“楚”日益强盛给中原各国带来威胁，中原强国“晋”便向吴传授了各种先进技术。晋这样扶持吴，是想万一楚北上进攻中原，楚总要防着东面的吴从背后偷袭，从而达到牵制楚的目的。晋把车辆的用法、造法或是与马有关的技术都传给了吴，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如前所述，个别领域可能吴要更胜中原一筹。历史记载方面出现北高南低的原因恐怕和吴越背负着文化滞后地区的恶名有关。“卧薪尝胆”说的就是春秋末期吴越之争，因此这个地区一跃登上历史舞台。《史记》中有关吴、越世家都只是列述了王的名字，有关两国争斗的内容几乎是空白。由此也可以推断吴越地区在春秋末期才开始进入中原人的视野。无论如何中原人才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也终于开始写有关吴、越的事了。

吴、越虽说是兄弟部族却也有不同之处，吴靠近大江和太湖，因此更倾向于关心上流的内陆地区，而越面朝大海，拥有渔民性格。吴越之争六百多年后的“三国时代”，天下三分，其中一个称为“吴”政权，越也在其版图内。日本摇篮期（1967—1970）称为吴的地方包含吴、越两地。

春秋时代的吴、越都曾是名门。吴的始祖太伯是周太王长子，将王位禅让给弟弟后移居吴。越自称是夏王朝始祖禹的嫡系，会稽（现在的绍兴）还留存着禹王庙。禹因治理黄河而闻名于世，但是祭祀之地却在长江之南的会稽，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里一直被中原人看作遥远荒芜的蛮夷之地，受到中原人的蔑视，没承想祖先竟是最受中原人尊敬的人。

春秋时代，吴的实力能够威胁到西楚这样的大国，而越则是一击便倒。即使如此吴也曾因为越的奇策而马失前蹄、一败涂地。吴王阖闾因伤而死，他儿子夫差“卧薪”三年后发起复仇之战。如果不是大意，吴定是超过越的强国。在会稽围困而降的越王则发誓要“尝胆”复仇，历时二十年越王勾践受到名臣范蠡的辅佐终于吞并吴，一雪会稽之耻。吴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频繁发动北伐致使国力大损，越借机大举进攻灭了吴。那之后越便没再留下什么值得记录的大事件，也可能是不像中原国家那样有强烈的记录意识，以至于连西楚灭越的时间都尚未有定论。《史记》记载的时间是楚威王时期的前334年，据说更确凿的年代要再往后些。总之在秦始皇实现天下大一统时，越这个国家就已不存在。

吴北伐向中原各国示威，向鲁国索要百牢（猪牛羊若干）。按周的礼节标准，给天子不过十二牢、公九牢、伯七牢。因此作为鲁国使节的孔子弟子子贡拒绝了这一要求。吴王夫差撤回了要求却这样回复：“我文身，不足礼责。”吴国人都有文身习惯。意思说你拿周的礼节要求我，有文身的我并不适用中原之礼，用不着你们非难我。当时东周王室衰弱、名存实亡，但中原诸侯如文公、桓公还是都称“公”而没有敢称“王”。吴、越和也不是中原政权的楚都毫无顾虑地自称“王”。楚的国君熊渠甚至让自己的三个儿子都称“王”，他的理论是“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里说的中国指中原。如此一来就可以理解蛮夷、文身一类的词并没有卑下的语意，就是表明自己不向中原天子低头。

除了中原文化还有吴越文化、楚文化，这些文化互为补充相互激励，从而加速了中国文化的整合。这其中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越文化，《三国志》中的《魏书·倭人传》记载倭国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谁都知道会稽是越的国都，举出这个地名便能看出倭与越之间的渊源了。《后汉书·东夷传》中“人民时至会稽市”，记载了当时在会稽市进行贸易往来的史实。到了有遣唐使的时代，使节奔明州而来，回去时再从那里乘船而归。明州就是现在宁波，当时乃越之属地，到会稽不足百千米。德川时代到达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就是从宁波港出发。宁波港面朝甬江，越王勾践灭吴时最后特赦吴王夫差做“甬东百家之君”。甬东是宁波向东出外海口处，就是今天的舟山列岛，相当于让夫差做舟山小岛上百户居民村长之类的官。夫差自刎婉辞。

越过舟山列岛再往东就是五岛，倭人自太古时代就有此路径。说的净是些古代的事儿，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实现进一步大融合则是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士大批南下使六朝文化开出璀璨绚丽之花。北宋灭亡时文化又得到进一步融合，南宋之后南方文化水平就开始普遍超过北方。清代举行过一百二十次科举会试（科举的最高等级考试），出了一百二十个状元。当时全国十八省中江苏省状元拔头筹有四十九人，浙江省有二十人。光吴越一带出的状元人数就已经超过六成。“江南才子”一说早已证明吴越是人才辈出之地。

注解：

**[[1]](#_1_110)　江户后期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汉诗人。**

# 第二部分

## 1.十八世纪的酒馆、茶馆、客栈

老百姓生活中最让人高兴的要数神社和寺庙里举办庙会的日子了。可是庙会只在固定日子举行，于是人们便想找到一个平时也能像庙会时那样愉快相聚交谈的地方。但是专制主义者不喜欢人们聚集到一起，害怕大家互相倾诉不满、商量如何谋反之类。例如唐朝的长安就只在东西设“市”，除此之外禁止商业买卖。长安的“市”上不光有卖东西的，还有魔术和杂技表演。但是执政者们严格管制人们集会的场所、时间（日落的鼓声一响就关市门），以方便监视和统治。可是再苛刻的限制也会被现实打破。到了宋代，工商业飞速发展，首都汴京（今开封）对进行商业活动的场所的管制便有所缓和，有的饮食店可以二十四小时营业。明清时候山西和新安的商人开始有组织地活动，因此为客商（旅居式经商）提供住宿和饮食的环境也多了起来。

欧洲也是如此，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Inn”（小旅馆、客栈）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Inn”逐渐高档化，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Hotel”（酒店）一词随之诞生，语源是意为公共设施、大宅邸的“Hostel”，去掉S就有了“Hotel”这个词。这和“Public house”省略成“Pub”很相似。此处可以喝酒、聊天、赌博，还可以玩音乐。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为游客提供就餐住宿的地方也随之增加。而十九世纪之前，马车盛行，旅行时还要顾及马。日语中“旅笼”一词本来指装马饲料的筐，后来旅店把这个词当作招牌，慢慢地就成了旅店的称呼，就是说我们旅店连马的饲料也顺带给您预备好的意思。这样的旅店多是沿街而建，除了旅人，当地人还经常光顾里面的小酒馆儿。

因邯郸梦而闻名的《枕中记》的故事背景就是邸舍。唐代的邸舍就是客店。故事设定的人物分别是带着神奇枕头的道士吕翁和出现在邸舍借枕头的村里年轻人卢生。和现今的酒店一样，旅人和当地人都会聚集在此。古代为什么当地人会去客店呢？因为那里是信息量最丰富的地方。没有报纸的年代，旅人是宝贵的信息源。要想知道信息光有好奇心不行。例如农民一定十分关心自己种的东西的市场行情。为了掌握真正的市场行情以防被收购商贩欺骗，询问没有利益关系的旅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不仅仅是利害关系。人们更基本的需求是去客店寻找快乐。想象一下李白诗中说的“胡姬酒肆”，波斯美女作陪喝酒该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啊。话说汉代时四川成都有一位巨商的女儿叫卓文君，她因为倾慕司马相如便与他私奔，甚至在娘家附近开了一间酒馆，让她父亲十分着慌。《史记》称为“文君当垆”，垆就是吧台，卓文君站在里面卖酒。美国西部剧中出现的牛仔总是侧肩抵在吧台上喝着波本威士忌与泼辣的老板娘调情。这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人类从太古时代便开始群居。群居对于人类来说是种本能。老百姓的能量爆发时这种本能便越发强烈。产业革命的出现让更多人背井离乡去工作，独在异乡的他们更加渴求一个聚集在一起娱乐的场所。而且那样的地方还可以获取信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离不开信息了。现在我们稍环视一下周围，便会发现以小酒馆、茶馆、旅笼为原型衍生而来的娱乐场所已经多到让人吃惊。

## 2.茶馆和茶文化

唐代陆羽撰写《茶经》的时候，茶还只是士大夫们的专属乐趣。作为地方官重要的公务，要在清明前贡献给宫廷太湖畔最高级的阳羡茶“紫筍”。湖州刺史（知事）杜牧留有《题茶山》一诗，诗中便言及采摘贡茶时，知事要亲自到当地监督。因为那里是湖、常两州交界处，两州的知事都要出差参与这项盛大活动。

到了宋代就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进献给皇帝的名茶贵重到用金钱都换不到。据说有种叫“小龙团”的名茶，皇帝十分珍惜，连宰相这样的重臣都得不到赏赐。这就是所谓的抹茶，因为呈球状故用“团”来命名。为了生产这种茶，人民付出艰辛劳动。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对奢侈的东西十分憎恨，夺天下后下令进献茶时只需贡献茶叶。因此后来就有了天子不饮抹茶一说，臣民们不得不遵从。于是抹茶就从中国销声匿迹。需补充说明的是南宋作为抹茶的全盛时期，从日本留学而来的荣西将抹茶带回日本，此后以抹茶为主题的茶道便在日本流行开来。

茶是种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既是日常必需品，又可能成为奢侈品。如上述的“小龙团”，一颗就可以买几栋楼。而从明清到现在，茶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平民化。说起茶的渊源便会想到《茶经》开篇：“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原本出自南方，据说原产地是云南或四川。喝茶的习惯也是源自南方。茶传到北方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北方人称其为“酪奴”。酪就是像酸奶一样的一种饮品，与其相比茶就如同奴隶一样，“酪奴”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虽说茶如此被看轻，北方人却慢慢地迷恋上茶。十二、十三世纪时，正是南宋和金以淮河为界激烈对峙时期，南北贸易中北方赤字严重。金甚至规定七品以下官员不得饮茶，可见茶在北方的受欢迎程度。

曾经将茶蔑称为酪奴的北方人那时已经到了没有茶就受不了的程度。气候上看，北方较之南方地处干燥地带，而且北方游牧民又喜食肉，自然对茶的需求就更大了。在那之前北方游牧民都是以奶为主要饮品，茶到来后就诞生了一种新饮品“奶茶”，现在它仍然是游牧民生活中的主要饮品。

我曾受邀到访过新疆哈萨克族的蒙古包中，主人热情地拿出大碗奶茶进行招待，喝一点儿就赶紧给添满。游牧民族热情好客，住在周围蒙古包中的人们也过来凑热闹，气氛十分热烈。

——来杯茶？

这无疑是邀请人来喝茶谈天最常见的方式，也是一种信息交换手段。虽然有时要忍受一些坊间闲话，即便如此也有很多新信息呢。

到了清代，茶馆遍地开花，最为盛行之处当属北京了。嘉庆年间（1796—1820）得硕亭在《京都竹枝词》中写了这样一首诗：“小帽长衫着体新，纷纷街巷步芬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三五个人坐在茶坊里消磨时间，这其中多半是官差之人。“仕版”指官吏名簿。这首诗的原注是：“内城旗员（满族官吏）差使（勤务）结束后，便着私服，约上几个哥儿们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就是说这些官差摘掉工作时戴的大帽子，脱下讲究的官服，换上平时穿的衣裳，头上扣着小瓜皮帽，约上几个好友到茶馆闲聊。

茶馆又名茶社、茶坊、茶楼、茶店等，规模大小、风格都形色各异。大多数茶馆不光卖茶，还卖各式点心。当时的菜单上有西瓜籽、干果、饺子、春卷、肉包子、水晶糕、汤馄饨、三鲜面等，因为价格公道，很多人会在钱包瘪了时选择去茶馆解决温饱。

大的茶馆儿里把拎着热水壶到处添茶的伙计称作“提壶”。他们为客人买茶叶、放茶、往提壶里添热水，服务周到不限次数。茶叶泡没味儿了再拜托他买就是了。现在中国火车上还有这样的服务。列车员先是过来卖那种小袋装的茶，如果您买茶，一会儿他会送来深口杯，再过一会儿就有“提壶”列车员过来给加水。

据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可知，京师茶馆儿中的客人多是八旗人士，即满族官吏，人数上比汉人多得多。他们多是官居三品（相当于各省副省长级别）的大人物，进了茶馆儿便能坐上一天。店里放的都是长桌长椅，不知道旁边坐的会是谁。

——八旗人士虽说官至三四品却躬身拎着鸟笼，掀开长衣摆坐在大茶间和车夫马差们喝茶瞎掰，不以为忤。当然这其中也绝对没有什么权贵显要之人。

据徐珂记载，那是幅十分恬适的情景。北京人喜好提笼架鸟，他们甚至要提着鸟笼子去茶馆儿。“副省长”的旁边坐着的是一马夫，互相打招呼什么的，这在等级严格的清代是道别样的风景。虽说不拿酒出来，但意气风发地谈笑风生，偶尔还会愤慨时局，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原本在茶馆儿说那种话题就是不明之举。

“莫谈国事”，有的店会直接贴出这样的张贴来。

伊朗、土耳其的茶馆儿多在贸易市场里。在贸易市场买东西的话，店老板会点茶馆儿的外卖招待客人喝茶。中国的茶馆儿也多临近商店街或市场。北京的东安市场里就有德昌、沁芳、玉泉这样有字号的茶馆儿；劝业场里还有荔香、玉楼春；其他的还有像碧岩轩、畅怀春、绿香园、玉壶春这样一些名字文雅的茶馆儿。

老舍（1899—1966）创作的戏剧《茶馆》描述的就是名叫裕泰的茶馆儿。第一幕说的是1898年的事，第二幕则是二十年后，第三幕是又一个三十年后即抗日战争结束不久。第二幕中茶馆儿生意不景气，开始向大学生出租后院。第三幕时茶馆已经变成美式饮食店。茶馆儿的风格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但不变的是“边喝茶边聊天”这一基本形式。

某某搬家了，谁谁生病了，谁的儿子考试中了，谁家的女儿要出嫁了——这些消息在茶馆儿里飞来飞去，给大家的心带来一丝暖意。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生活本身，那茶馆儿则是人所必需的场所。

清代的大家族式生活，条件比较差，居住空间狭小，家庭成员如因私事请朋友到家里做客会不方便，茶馆儿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个叫自怡自愚的人在《时尚新谈》中题了这么一首诗：“肉包大嚼饮鸡面，并坐横肱杂流品，不似邀客但烹茶，人声唱声众甚喧。”虽说一幅喧嚣嘈杂之场面，却也是开放的场所。那里是百姓能量的旋涡所在，他们把许多的苦恼、烦恼一股脑儿地扔在茶馆儿，在那里喝茶、吃东西、补充精神能量。能量的源泉就是彼此间贴肤般温暖的关怀。

## 3.茶故事——茶的礼节

客人造访，主人都会用茶来招待，在日本如此，在中国亦如此。中国喝茶的茶杯多是高圆筒式带盖子那种。喝茶时往杯中放茶叶再倒入热水，刚泡上时茶叶都浮在水上面不方便喝。把杯盖儿盖上稍等一会儿，等到茶叶差不多沉底就可以喝了。也有一直浮在水面上的茶叶，这时用茶杯盖儿轻轻撇一下再小心喝即可。

窃以为这种喝茶方法不太斯文。可是在鸦片战争的影片中出演林则徐的著名演员赵丹就是这种喝法，而且还被画成了画儿，赵丹看了那幅画后赞不绝口。只见他双手环绕杯子，一只手的手指轻轻地挑起杯盖尖儿。那举止特别有味道，略为严肃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顿时显得特别柔和。

在火车上如果买了一小包茶，列车员会一次又一次地来添热水。热水是免费的，列车员每次都拿着大暖壶过来，打开暖瓶塞爽快地为乘客添热水。

嗜好名茶的话，茶壶和杯子都用小巧的，喝的时候则要爽快地一饮而尽。要是拿着大茶杯喝就要柔和一些，这何尝不是种平衡美呢。

过去中国也有一套麻烦的饮茶礼仪，不知道什么时候便被废弃了。明太祖出身贫苦，憎恨那种没用的形式主义，把进贡抹茶的惯例都给废除了。别说喝茶的礼仪，连抹茶都在中国销声匿迹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没有条条框框就能随性地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件好事。

## 4.茶故事——水和茶

为何在英国喝红茶好喝呢？忘记在哪里看到的，据说英国的水适合泡红茶。泡茶用的水，日本称“茶汤”，中国称“茶水”。光说“茶”，不知道说的是茶叶还是茶水，因此要加上汤或水这样的字眼。往深了说，茶和水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

我居住的神户有六甲连山，那里挖了好几条隧道。新干线那一站的出入隧道“新神户隧道”里就有一个从岩石缝里渗出的清水泉。嗜好喝茶的人专门开车来接水，可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造成了交通拥挤。防患于未然，相关人员将出水处围起来不让人随便进入。那里离布引瀑布很近，被誉为“神户之水”。外航船补给水时经常选择到神户港来，“神户之水”就是这么个由来。而神户居民喝的多是和淀川水混合在一起的水。布引蓄水池里的神户之水通过大管子引到神户港，相关区域的居民可以喝到布引水。交着同样市民税却喝不到神户之水，有的人会为此愤愤不平。

可是有人会把神户之水和宫水混同，但这完全是两种水。和海水同源的宫水在临近海岸的地方有个主井，那里的水多少都含有些盐分。宫水适合造酒但是不适合烹茶。宫水泡咖啡也好喝。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东京“御茶水”这个地方据说也是出泡茶好水的地方。和新神户隧道的岩清泉一样，喜欢喝茶的人会专门去接水。

## 5.茶故事——英国茶

从拉塞尔酒店可以步行到大英博物馆，十分方便。我在那儿的大厅里喝的茶至今难以忘怀，不由得要感叹英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喝茶大国。下午茶的习俗就是始于英国。不光是品茶，还能品味那种心灵的充盈和美妙的气氛。当然茶具也要赏心悦目。

中国的景德镇制作的纸瓷或称“卵幕”，薄如纸、蛋壳般，无疑是高级中的高级品。清代皇帝放在身边把玩的纤细小巧的陶瓷器称作“古月轩”。在英国喝茶时最奢侈的事情莫过于把有故事的古月轩茶碗摆在身旁了，就那么摆着就很满足，仿佛心灵都丰富了。因为如此昂贵至极的东西并不是谁都拥有。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也可以制作高级的瓷器。“英国陶瓷之父”乔赛亚·韦奇伍德（1730—1795）研制改良的米色铅釉陶器被英国夏洛蒂王后选用，韦奇伍德制作的陶瓷因此获准称为“王后御用陶瓷”（Queen’s Ware），现在已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英国主要喝奶茶。如果放入柠檬之类的会破坏茶本身的味道。奶茶则要先放牛奶再倒茶。这样做是因为茶具太薄，如果先倒入热水会使茶具炸裂，所以要先放牛奶。但是景德镇的纸瓷和卵幕杯倒入多热的水都不会炸裂。“王后御用陶瓷”亦是如此。毕竟是高贵的东西，如果破碎了很可惜，因此先放牛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慢慢地则演变成一种优雅美观的仪式。除了制作“王后御用陶瓷”这样的高级品外，韦奇伍德还大量生产便宜的茶杯和茶壶，这也为英国普及茶做出了很大贡献。

## 6.茶故事——茶里加冰

英国称茶为“tea”，是福建话的音译。但是受英国殖民多年的印度称茶为“cha”，是中国北方及广东话的音译。翻看印度词典，“cha”的语源是波斯语。英国殖民之前，茶就已经传入印度，中国茶通过中亚传入印度。但是阿萨姆（印度北部的一个邦）和斯里兰卡种茶则是英国人努力的结果。后起之秀的印度茶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印度茶的茶商上演了如火如荼的大规模宣传。可是那一年美国遇上酷暑天气，就那么坐着都呼呼冒汗，谁又会去喝热腾腾的茶呢，免费品尝都无人问津。负责宣传的人气急败坏地往茶里倒满冰，这种加冰的茶却出乎意料地受到欢迎。于是冰红茶便横空出世，红茶产自阿萨姆和斯里兰卡。现在也是，大量喝冰红茶的还是美国南部各个州，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地方的人除了夏天几乎不喝茶。

往咖啡里放冰则是日本人发明的，据说一次夏季国际论坛上，茶歇时端出的冰咖啡受到了外国学者们的欢迎。他们没有往咖啡里加冰的习惯，一定是觉得这种喝法很新鲜吧。无论是红茶还是咖啡，要是加冰的话，比起咖啡杯，玻璃杯看上去更搭。冰红茶远观清凉，冰咖啡则是喝着爽快。

喝茶还是要喝热的，这已经成了我的固有观念。

## 7.茶故事——乌龙茶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回台湾归省时我住在名叫新庄的地方。我的故乡平顶就在那儿附近。如名所示，那是个地势相当高的地方，地形平坦。原本是乌龙茶的产地，战争期间日军曾想在那里建设机场。一到采茶季节这里可以听到舒缓的摘茶歌。

乌龙茶从对岸的福建传入台湾的时间大概在1885年，没想象的那么久远。“乌龙茶”一词最早出现在雍正十三年（1735）编纂完成的《安溪县志》中。将上好的乌龙茶放入拳头大小的茶壶中泡，用小酒盅大小的茶碗喝，好像在过家家似的。小茶壶和茶碗都是用朱泥烧制的，其中尤以宜兴（江苏省）窑的为佳。放茶前朱泥托盘、小茶壶、茶碗都要用热水烫一下。儿时看到祖父他们那样喝茶，暗自想那是不是在行什么巫术。然后看到他们喝茶时的礼仪又以为像刚刚那样在做法术呢。

半发酵的乌龙茶介于不发酵的绿茶和充分发酵的红茶之间，内含两种茶的味道。因此要细细地品尝，就是慢慢喝，把罐装乌龙茶一口气喝完总感觉不是地道的喝法。最近乌龙茶在日本慢慢普及开来。都知道乌龙茶的酵素可以有效分解脂肪，日本人饮食中的脂肪含量多恐怕是乌龙茶受到青睐的一个原因吧。

前几年我去乌龙茶的发源地福建安溪县访问，原以为那里和我的故乡平顶地形相似，不承想那里山峦起伏，在坡股地形上开垦梯田式茶田，虽地形迥异但风土相似。

## 8.茶故事——俄式茶壶

我第一次看到俄式茶壶是在新剧的舞台上，记不太清是《樱花园》还是《三姐妹》，当时东山千荣子出演的契诃夫作品。室外圆桌上放着一把圆筒形俄式茶壶，不确定是实物还是模型，只记得是金铜色的。

当时和一位曾在苏联居住过的朋友一起看剧，剧间休息的时候朋友介绍说：“家庭用的俄式茶壶还有更小的。”还不无遗憾地说刚才那个场面要是真的能流出茶香就更有气氛了。煮茶时，茶的芳香四溢。和日本的地炉有些相似，人们也会围坐在俄式茶壶四周。茶的芳香和人的气息混合在一起，那也是让人沉醉之处。经过的人也不由得凑了过来。

欧洲就只有东西两端的俄罗斯和英国喝红茶，其他地方都是喝咖啡的习惯。英国“tea”由福建话的音译而来，由海路传过来。而俄语的“чай”可能是由部分游牧民经由陆路从中国传到欧洲东部的。现在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还喝着马奶茶。

围着俄式茶壶喝茶既有大陆也有游牧民的气息。哪里降雨了牧草绿油油的，哪里的草吃光了，边喝茶边互相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看似平平常常的闲聊，细一想其中都是很重要的信息。聊天很开心，偶尔还能知道些有益的消息，俄式茶壶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茶香。

## 9.话说麹子

东京有麹町这么个地方，使得“麹”这个难度高的非常用汉字为大家所熟知。因为字难写，日本另造一个“糀”来代替，读音也是“kouji”。通常所说的“国字”，即日本制汉字，不是从中国引进的，是中国没有的汉字。“糀”这个字定源自日本，理由虽然不明确，但这其中的原委大概能明白。

“kouji”指谷物上生出的霉菌，可用于酿造酒、豆酱、酱油，有“麹子饼”和“麹子渣”两种。“麹子饼”就是把谷物用水浸泡后做成饼状或团子形状再发酵出菌。汉字是象形文字，造字时多受到物体具体形态的启发。“菊”字就是从菊花花瓣锦簇的花形而来，仿佛用手捧起满满一捧的动作就有了“掬”这个字。“麹”字左半部分的“麦”字代表谷物，是会意部分，右侧的“匊”是表音部分。但日本的清酒、酱油、豆酱多用“麹子渣”酿造，原理就是把谷物蒸熟让其发霉生菌。做好的米饭放时间长了就会出霉菌，表面布满霉菌好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根据这一现象造出的象形文字就是“糀”，这个字十分形象。而“麹”字却没能体现霉菌好像在大米上开花的那种美妙感。东京那个麹町原来是“国府路”的借字，不是说那里有好多酿造店。

近世时日本各地有好多麹座行会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京都北野天满宫领地的西京麹座，他们掌控着麹子制造。对于酒坊来说最重要的酒曲掌握在别人手中自然是不好的，于是酒坊纷纷建造自己的酒曲间，这是对麹座垄断的无奈应付之举。而麹座仗着当时室町幕府的旨意，唆使幕府的衙役监督将所有酒坊的酒曲间都毁掉了。但是争斗并没有因此消亡。文安元年（1444），各酒坊跑到比叡山延历寺寻求援助。从财力上说酒坊自然比麹座要雄厚得多，一定向寺里贡献了大量黄金和酒。话说酒坊的人为什么会跑到延历寺去求救呢？延历寺设僧兵，哪怕是对朝廷也不畏惧，不满时便抬出日吉社的神轿集体强行上告。麹子纠纷最终演变成延历寺和北野天满宫之间的斗争，神轿出场致使天满宫烧毁，以酒坊合法造麹子而胜利告终。

不起眼的麹子，就是这麹子。这场麹子骚乱让我们看到不论得到什么政府文件承认，没有雄厚实力支撑的垄断注定要失败。因为实力决定力量、决定胜负。现在也如此，相当有实力的对手嘶喊着“排他性垄断结构行不通！”即使这边也有一定实力，最终也逃不出重蹈北野天满宫烧毁的命运。

使用麹子是东亚独有的技术，据说酱油出口到欧美得到很高评价。麹子也默默地为促进国际化、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质量发挥着自身作用。由此想到两千年前汉王朝时为了维持和平曾向匈奴赠与各种各样的东西。据《史记·匈奴传》记载，赠物单子中按糯米、麹子、黄金、丝绸、线、棉排列。这样说来麹子也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 10.待春

称家常菜为“惣菜”是日本独有的说法，同属汉字圈的中国就不这样用。查字典可知“惣”字是通用字，“揔”字的通假字，与“総”（综）同义。原本没有这样的字，但是“物”的下面添一个“心”顿然觉得深奥许多，给人好印象。一说惣菜便会给人饱含心意的感觉，至少我这么觉得。本来是“所有”“总括”之意，用于吃的方面恐怕不是纯粹的偶然吧。

延历寺第三代座主慈觉大师圆仁（794—864）为求道朝圣来大唐十年，留下丰富的旅行日记。来大唐第一年，圆仁在扬州过的冬至。阳历冬至基本在十二月二十二前后，阴历却不固定，这一年冬至是阴历十一月二十七。不论僧俗，这一天都要设祝膳品尝美味。圆仁在日记中如此记述：“百味、惣集（众多佳肴荟萃）。”圆仁日记全部都用汉文书写。圆仁当时住宿扬州开元寺，开元寺足足摆了三天祝膳。圆仁记载道：“有种惣集（有各色佳肴）。”“惣集”在他笔下大概是招待之意。说“百味”自然是各种款待，遗憾的是圆仁的日记中没有记录当时的菜单。

以前冬至几乎是匹敌过年的重要日子，有时甚至比过年还受重视。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那之后白昼开始逐渐变长。那时人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因此白昼长是件高兴事儿。古代人觉得这是来自神的馈赠，圣诞节赠送礼物的习俗多半与冬至相关。与此相对的是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之后白昼则逐渐变短，这就不是什么值得祝贺的事了。还是冬至让人觉得高兴，逢人便想道声贺。扬州人一定对圆仁说：“冬至，和尚万福！”如此值得庆贺的日子受到丰盛的款待是自然的事了。

大概三十年前我受报社委托写过一篇有关冬至的随笔，说到“中国冬至时会做汤圆吃”。现在每年冬至我家还保持着做汤圆的习俗。我以为中国哪里都是这个风俗，不承想读了那篇随笔的中国朋友说“我家就不吃汤圆哦”，让我顿觉慌乱。吃汤圆只是台湾和一部分福建地区的习惯，北方要吃饺子。此后我再写“中国”如何时就变得谨慎起来。吃汤圆也好饺子也好，这和过年吃年糕、端午吃粽子一样都是一种“象征”，当然祝贺冬至还要吃很多别的佳肴。

查了一下唐朝时的节假日休息，元旦放假是元旦当日加上前后各三天总共七天休假。冬至也如此，前后各三天加上冬至当天共七天。其他除了清明之外基本是一两天的样子，最多也不过三天。从假期长短看，元旦和冬至算是双璧了。元旦前夜称为除夕，冬至前夜也称为除夕。这在诸桥的《大汉和辞典》上也有所记载。圆仁在冬至前一日的日记上这样记载：“夜，人咸未睡。与本国（日本）正月、庚申夜同。”

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馄饨就是云吞。日本把“乌冬”写成“饂飩”，“饂”是日本创造的就是所谓的国字。“面”呈线形，就是乌冬或素面一类。于是日本便有“冬至云吞夏至素面”的说法。六世纪据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记：“冬至日，量日影，作赤豆粥，以禳疫。”说是宫中庭院里立八尺木棒，根据冬至正午时的影长画红线，用红线记录每天影子的缩短情况。

冬至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要画红线。到了清代，冬至时人们会像元旦赠送贺年卡似的拿着红色贺帖互相拜访，还要把红布挂到门上。总之“赤”便是冬至的象征色，做赤豆饭也寓意吉祥。我想就是熬红豆粥吧，说是还能消灾。

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冬至风俗是“九九消寒图”。从阳历十二月二十二起，天逐渐变冷。圆仁的旅行记中记载冬至时僧人们会互相问候“严寒！”九九八十一，所谓九九消寒图就是从冬至这天起，画一枝素梅，枝上画梅花九朵，每朵梅花九个花瓣，共八十一瓣，代表“数九天”的八十一天，每朵花代表一个“九”，每瓣代表一天，每过一天就用颜色染上一瓣，染完九瓣，就过了一个“九”，九朵染完，就到阳历三月十二前后，便出了“九”，九尽春深。

九九消寒图有多种样式。有的像棋盘似的，将纸横竖等分九格，共计八十一格。从冬至开始每天填充一格，填充的方法是上涂晴下涂阴，左风右雨雪当中，据说这是原型。大概是缺乏风雅才改成后来的梅花图吧。无论哪种都体现出人们熬冬盼春的急切心情。

阳历冬至和元旦之间只相差十余日，阴历大概要差上一个多月。冬至和元旦之间还有“腊”这个时节，因此阴历十二月称为“腊月”。日本的季节问候语中有“去年腊月……”但是没有与“腊”相关的仪式活动。窃以为这是一个感谢节。春天有祭祀土地神的“社”，年末时各路神仙一起祭祀便有了这个“腊”。起源倒是说法众多，“社”是播种前的节，也是祈求丰收的仪式活动；而“腊”则是收获后表示感谢的仪式活动。孔子时代称“腊”为“蜡”。有一年耿直的子贡陪着孔子去观看蜡的仪式，人们喝美酒吃佳肴，满足而酒醉。孔子问子贡：“快乐吗？”子贡则回答说：“全国的人都好像疯狂了，有什么好快乐的呀。”孔子责备说，劳作百日就快乐这么一天的心情你不懂吧。子贡是孔子门下最有钱的弟子，孔子周游列国是子贡资助。不用劳作的子贡怎能体会到农民日夜辛苦劳作终于有一天可以从中解放出来的快乐呢？这是孔子对子贡的狂态流露不满吧。由此可见，腊的仪式活动是不分座次不讲虚礼大家开怀畅饮的那种宴会。唐朝时腊日会赐群臣“口脂面乐”，杜甫诗中也有相关描述。唐朝腊时当日和前后两日加一起可以休三天。古代把冬至后第三个戊日（也有戌说）作为腊日，考虑阴历的日子不太固定就把十二月初八定为腊日。后世在这一天用多种谷物煮粥，取名“腊八粥”，取了十二月初八的“八”字音，还取意“各种各样的食材”，也叫“八宝粥”。清代朝廷会赐予大臣们腊八粥，各家各户也做粥馈赠亲朋好友，还会举办八宝粥大赛。

腊八粥中会放菱角、栗子、纳豆、枣、杏仁、瓜籽、花生、榛子、葡萄干等食材，再加入砂糖做成甜口。绝不能放的是莲子、芸豆、薏苡、肉桂这类食材。馈赠腊八粥时一定要带上“大白菜”就是腌白菜，而且必须是自己家做的。虽说就是腌菜，但是可不能小瞧这里面的说道。据《燕京岁时记》记，大白菜的好坏“可占卜其家的盛衰”。

清道光帝在一首题为《腊八粥》的诗中如此结尾：“童稚饱腹庆州平，还向街头击腊鼓。”可以想见十九世纪的腊日孩子们在街头，锣鼓喧天、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

冬至、腊日、元旦相互间隔很短，吃美味佳肴的日子挨着来可以说充满生活智慧。为何这么说呢？严冬时节，老百姓清贫的日子更需要靠吃来积蓄体力。而大陆气候干燥很容易感冒，再加上天冷外出的机会变少很容易缺乏运动，为提高免疫力首先要做的就是吃，接着要充分休息好。冬至、腊日、元旦连续过节，如果在唐朝那就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加起来可以休十七天。

# 第三部分

## 1.桥的故事

二十七年前我写了本名为《神户这座城》的书，内容分为十章，最后一章的题目是“梦想的桥梁”，涉及未来的神户。谈有关未来的话题都不过是种“设想”。赛马和赛自行车都有专门的预测师，股市也有类似的人，经常猜中的人被捧成神。谁都受到神眷顾的话，那大家都成富豪了。神也不可能百发百中。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被誉为股神的人破产的消息。如同八卦，中了是种猜测，不中也是种猜测。

二十七年前我的猜测有一部分没有中，所以现在叙述会感到不好意思。二十七年前我看了神户市总规划案，其中对三十年后的神户市这样畅想：“我们立足三十年后制定这个规划案，努力将城市建设成为充满绿色和阳光，能呼吸新鲜干净的空气，拥有广阔土地和干净水资源的地方，让市民们能够活得更加有质量。”其中提到景观岛、西神卫星城、明石海峡的跨海大桥建设。我在拙作中介绍了规划案，又补充说明道：“用不着三十年，不久的将来明石跨海大桥就能建成。”西神卫星城和景观岛都要凿几座山才可能建成，比起这些我想架设去往淡路岛的跨海大桥可能最快实现吧。我预想的建设顺序被彻底推翻，以为跨海大桥会最先建成，不承想景观岛和西神卫星城都争先完成了，而跨海大桥还没有实现（1998年4月5日终于开通），绝不是可以预想的程度啊。其实预想中都饱含一种下意识的“希望”。我预想大桥首先建成是把自己的期望放了进去。

桥发挥着联结两地的重要作用，桥附近地带也会因此变繁华。伦敦作为交通要冲而繁荣，就是源于架在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桥。泰晤士河上不知道何时架的桥，却是古代人费尽心血建造的。十三世纪初才出现石质桥墩，那之前都是木造桥墩。因为支撑力不够就尽量密集地建造多个桥墩。桥上不光有路，还建了不少店铺和宅院。木材经年失修便会腐蚀折断。有时甚至还会塌陷，桥上的建筑物就跌进泰晤士河里。于是便有了“伦敦桥塌啦”这样的童谣。在那样一个缺乏娱乐的年代里，很多人把崩塌事故当成热闹看。

看十七世纪的版画会发现当时的伦敦桥已经拥有九个石质拱桥，桥上五层高的建筑罗列成一排。道路穿插在建筑之间仿佛走在拱廊下的感觉。楼下是店铺，楼上是高层公寓，日本称这种为“木屐型住宅”，伦敦桥上的建筑就可以说成“桥上楼”。直到1755年法令的颁布才真正拆掉桥上建筑物，成为道路专用桥。1831年重建伦敦大桥，建成五个石质大型拱桥，这样船舶的通行也变得方便。最近（1968）将此桥拆毁，作为第二代石桥完成了其130多年的光荣使命。泰晤士河上有好多桥，十九世纪初建造了南华克桥，处于上流河域，几乎与伦敦桥相平行，即便出现这样的竞争对手，伦敦桥安然如故，持续繁荣。主要原因在于南华克桥是收费的，而伦敦桥同大英博物馆一样，坚持不收费的传统。

再说几句多余的话，今年三月初到访伦敦时，大英博物馆虽然还是免费，但门口处放着大而透明的塑料盒，上面留有五厘米左右宽的孔并写着“自愿付费”的字眼。免费参观似乎难以维持了。

近世日本也有收过桥费的制度，江户的永代桥收一文钱，新大桥收两文。大阪的戎桥也征收过费用。收费或许是修缮费用的储备金，但桥梁工事都是大规模工程，靠收过桥费肯定不够，修缮费多是由当地有实力的大户负担。

为纪念鲜花博览会，以最新技术将名画用陶版复原。试想几百、几千年前，无论什么样的名画，其材质和颜料都难免变质及发生化学变化。本着要保存上千年的想法还是及早刻成陶版的好。听堺屋太一说，选出西洋画代表里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中国画代表张择端（十一世纪前后的人）的《清明上河图》进行复原。《清明上河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名品，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尤以横亘在汴河之上的红桥一带十分出名。红桥是拱桥，伦敦桥的桥墩是拱形，而红桥是桥身为拱形。可以看到红桥上有个卖遮阳席子的店，但只在桥头附近，不像伦敦桥那样整座桥上都布满店铺。光看着画仿佛都能感受到那里热闹无比的气息，根本不像千年前的景象。将这种描绘百姓生机勃勃的名画制成陶版，我由衷地赞成。《清明上河图》被末代皇帝溥仪恩赐给其弟溥杰而流出紫禁城外，转手多人最终重新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是相当有说道的名品。仔细用放大镜看桥头的临时店铺，好像是卖小刀之类的杂货店。再拿放大镜看十七世纪伦敦桥的铜版画，能看到用竿挑起的造反派人头好像旗子一样罗列在桥门上。

## 2.威尼斯和桥

大阪被誉为水都，有“808座桥之城”的美誉。但让人意外的是，大阪街上很少会看到有水的地方。而同样是水城，威尼斯却随处都能看到水。

据旅游手册介绍，威尼斯约有四百座桥，为了方便水上公交和凤尾船的通行，均以拱形建造，别说汽车甚至自行车都无法通行。无法使用汽车便要经常走路，能锻炼腿脚，于是威尼斯的老人与其他地区的同龄人相比也要更有活力一些。凤尾船主要用于观光，当地人除了坐水上公交外还喜欢用小艇。乘水上公交要预先买票，也没遇见过查票的。虽然鲜有查票，但如果不自觉买票，一旦被发现就会处以重罚。票价也便宜，所以没人故意逃票，大家都老老实实买票乘船，当地人则基本使用月票。

前年因参加研讨会去了威尼斯。我住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的丹尼尔酒店，坐水上公交去研讨会现场的圣乔治·马焦雷岛。从酒店能够远眺到的地方特别近，以为坐水上公交会免费。一般城市只要走路就可以去的地方，领队却认真为我们一行买好票乘船前往。

圣乔治·马焦雷岛还曾是高峰论坛的举办地，那里四面环海便于安保。全岛都是教堂区域，研讨会租借了部分场地。我以为只有与会人员坐水上公交，不承想还有不少游客。好像去京都的寺庙参观似的，来参观威尼斯教堂的也大有人在。当时那里正好还有画家拉斐尔的作品展。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旅行与文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笔友会及意大利CINI财团组织赞助。日方出席人员有森本哲郎、盐野七生和我。站在圣乔治·马焦雷岛上，我想要是在日本，会在圣马可广场和这儿之间架桥，虽然便利但是会煞不少风景。

威尼斯哪里都看得见水，虽然有桥但是哪里都很相像。白天还好，到了晚上灯一亮，看哪儿都一样，特别容易迷路，越是着慌快走越容易绕远（大多数情况是回酒店）。不论去哪儿或买什么东西都会主动说出酒店名，比如我去书店买明信片都要问“圣马可广场在哪个方向？”那样就能知道酒店的位置了。如果常来即便在晚上都不会迷路。参加完NHK电视台《丝绸之路》节目在罗马的庆功会后，我和妻子一起去了威尼斯。当时陪同我们的石坂浩二先生，在威尼斯就轻车熟路。《丝绸之路》节目的看点是从长安到罗马的全路程，我做最开始“长安”一期，想有始有终，于是决定参加最后一期。石坂是《丝绸之路》的解说，每次都说“我们摄制组……”却一次也没参加摄制，最后“罗马”这一期他终于来参加了。石坂来过很多次威尼斯，驾轻就熟地给我们做向导。大概是有切实的记号吧，拐弯儿转角的丝毫没有犹豫，还能清楚地说出“拐过下个转角有一家好吃的意大利面店”。大家公认罗马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但也有说法说丝绸之路真正的终点是威尼斯。威尼斯还享有“亚得利亚女王”之称，是欧洲重要的东方贸易中心。如果把丝绸之路视为交易之路的话，那终点（西面的起点）可能不是罗马，而是威尼斯。

马可·波罗1270年从威尼斯出发，历经二十五载岁月，终于在1295年回到欧洲，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上的男人”。我正亲眼所见NHK摄制组拍摄马可·波罗留下的遗书。虽然赶来得有些迟，还是有幸在威尼斯资料馆一睹那遗书的真颜。研究专家对遗书内容做了相关介绍，而我就想着用手摸摸那份遗书。

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桥当属大石拱桥里亚尔托桥了。它原本是木桥，到十五世纪时改建为石桥，所以马可·波罗当年看到的是木桥。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定是看过不少桥。那个时代只要稍微有点儿距离就会有渡船，他所见的桥应该都不是什么大桥。马可·波罗回去的路上还顺便去了趟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金角湾那时还没有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建造了加拉塔大桥。他的《东方见闻录》第四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离干巴鲁克（北京的音译）十英里远处是普里桑各河……这条河上横跨一座非常雄伟的大桥。寻遍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更壮美的大桥了。”普里桑各是波斯语中“石桥”的意思，当时蒙古人政权下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得势，很多地名之类的都用他们的语言重新命名。实际上说的是卢沟河，沿势东流最后从天津入海，下游称作永定河。西域人叫不来汉语名称，于是取名石桥河，足见当时这座石桥是多么让人印象深刻。

马可·波罗如此说明：“桥上可以横列十匹马并行，有三十二座桥墩，二十四个拱形，桥梁全部用大理石建造，两侧石雕护栏上均雕有狮子，其形态各异。护栏之间镶嵌着各色雕刻。”其实就是卢沟桥，该桥重建于1698年，与马可·波罗属同一时代。外国人又称其“马可·波罗桥”，还有误传说这座桥是马可·波罗设计的，怎么可能呢？要知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时，里亚尔托桥还是木质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因此这还是一座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大桥。

## 3.鹊桥

喜鹊主要栖息在以佐贺平原为中心的北九州一带，日本已经将喜鹊列为自然保护动物。据说喜鹊原本并不栖息日本，据《日本书记》载，推古天皇六年（598）四月，新罗向日本进献两只喜鹊。当时进献时须贡献珍禽异兽。同年八月新罗又进献孔雀一只，十月越（北陆）进献白鹿一头，翌年九月百济进献骆驼一匹。

据说进献的喜鹊没能繁殖后代，到了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佐贺藩主锅岛直茂又从朝鲜带回喜鹊。喜鹊别名“胜鸦”，有传说加藤清正听到喜鹊鸣叫认为是胜利的吉兆，由此便有了这个别名。朝鲜称喜鹊为“卡契”（日文音译）。

喜鹊身形比乌鸦略小，除了肩和腹部是白色外，其他部位都是油亮的黑色。叫声比乌鸦清脆，寓意吉祥。战争胜利的吉兆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加藤清正首创，在东方“鹊音”或“鹊声”本来就寓意有好消息传来或是有好事的吉兆。正在流浪的杜甫听到舍弟的音信时，咏颂说喜鹊带来喜悦。旧时用作喜庆的祝词还有如“鹊笑鸠舞”。

日本把喜鹊列为自然保护动物，韩国把喜鹊视为“国鸟”，中国一直把喜鹊看作象征吉祥之鸟。但是欧洲却把喜鹊看作象征不祥的鸟。传说魔女外出时会变身喜鹊，喜鹊在空中冷笑那些没有乘上挪亚方舟而在洪水中挣扎的人，拒绝为耶稣哀悼。喜鹊给西方人的都是这般形象。像喜鹊这样在东西方文化中象征吉凶两个极端的鸟十分少见。

传说牛郎织女只有在七夕才能相会。牛郎星和织女星隔着天河遥遥相望若即若离的景象才产生此传说。两颗星无论怎样接近都隔着天河，被称为灵鸟的喜鹊奋力相助，用翅膀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他们相会。极富侠义心肠的喜鹊用翅膀搭成的桥被誉为“鹊桥”。喜欢成群结伴飞翔的喜鹊有时看起来像在空中架桥一样，因此就有了这个传说吧。用翅膀搭成像彩虹般的拱桥比较困难，织女也会心惊胆战不敢上去。古文献中如此解释：“鹊，填河。”就是说搭成浮桥一般要紧密地排列才行。

填，不免让人联想到精卫鸟。精卫是人们想象的一种鸟，实际并不存在。《山海经》中这样描写精卫：它的形状像乌鸦，头部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据说炎帝（传说中的帝王）的女儿在东海溺水而亡化成精卫鸟。因为恨恶浪，精卫鸟决心要把东海填了，于是一刻不停地从西山衔来石子和树枝，往东海扔。无奈东海太大，一只小鸟的力量无法带来任何改变，有后人用“精卫填海”这个成语来形容欠斟酌、无法成功实现的事情。

《山海经》中除了精卫的故事，还有“邢天”这个神话。天帝打败邢天，砍掉其脑袋。邢天只好乳目脐口，化作怪物拿着矛和盾战斗不止。诗人陶渊明（365—427）读《山海经》还曾为精卫作诗一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邢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大意为邢天改变身姿失去身体也不后悔。由此看来，陶渊明似乎对他们的意志持肯定态度。

再把话题转回喜鹊那里，喜鹊只有肩和腹部是白色，其他部分都是漆黑的。这种斑驳的图案好像也是在欧洲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喜鹊的英文名叫“magpie”，意为带斑点的雏菊。中国传统诗歌讲究押韵，而且最好两个字相和。因此也称喜鹊为“乌鹊”，“乌”除了是乌鸦的意思外也作黑色的形容词。乌鹊就是黑喜鹊，喜鹊已经被定格为黑色。《三国志》中曹操有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描绘的是喜鹊在月夜南飞，四处寻找却又不知在哪儿做巢好，比喻天下英才尚不知自己该辅佐哪位英雄的踌躇。乱世之中选好主君十分重要。《三国志》还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不论山多高海多深，我如同山海不论多少英才都不嫌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用喜鹊选枝做巢的困惑来比喻英才的迷茫。喜鹊做巢是件十分慎重的事情，先要选枝，还必须是粗壮一些的树枝。我就是粗壮有力的树枝——曹操在昭告天下英才。

## 4.查理大桥

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桥总是熙熙攘攘。参观完布拉格城的人穿过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走到河岸右侧的街区，这几乎是标准观光线路。此桥是遵照捷克国王查理四世之命而建，因此得名查理大桥。查理四世还是波希米亚王，当时称为查理一世，历史稍微有些复杂。伏尔塔瓦河上有好多座桥，而历史最悠久的便是查理大桥。

布拉格地处欧洲中心，因“布拉格之春”而受到世人瞩目。我隐约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的是“Prague”，英语中这样叫。我还看过一部电影《布拉格的大学生》。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历史教科书上称呼查理四世的说法都使用英语发音，那时候英语发音占据绝对优势。

相对来说我们对伏尔塔瓦河的德语说法“Moldau”要更亲切些。斯美塔那（1824—1884）是捷克著名作曲家，由他创作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第二曲给我深刻印象，特别是“Moldau”。连地图上伏尔塔瓦河的德语标记也会出现在括号中。

开头我写的是“捷克首都”，严格来说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首都。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正在闹分裂，很有可能将来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斯洛伐克首都则是布拉迪斯拉发。**[[1]](#_1__1993Nian_1Yue_1Ri_Qi__Jie_Ke)**我为何对地名如此敏感，是因为已发表的文章如果出版、增印或是出版文库本时，地名的这种历史变迁需要多加注意。还比如丝绸之路相关的内容中不能使用“苏联”这个叫法，因为苏联已经瓦解不存在，有段时间改成“前苏联”的说法，但总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于是我文章中“苏联”这个名词便不再出现。斯大林格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战地，这段记忆几乎是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1961年斯大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河沿岸城市）。相比之下，直到最近各地的列宁像才终于拆掉，以他名字命名的列宁格勒近来才改回圣彼得堡。原来的名字有些像德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又是俄国的敌国，用敌国语言表示地名自然会不自在，于是就改成俄式的“什么格勒”，还没等到大家习惯新名字就发生了革命，于是列宁格勒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再回到查理大桥的话题，桥上的步行区域很宽，两侧排列着铜像，基本上都是源自圣经故事做的雕刻。还有很多面向游客的露天小店。有画肖像画的，有耍蛇的，一片热闹景象。耍蛇人要把蛇缠绕在身上，所以不能从容地面对镜头。和耍蛇人一起照相要收费，他们就靠这个维持生活，所以不允许免费拍照。当然游客在桥上观光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导游解释说奥运会刚结束，小偷团伙从巴塞罗那流窜到了欧洲其他旅游城市。

现在桥上走的大多是游客，但过去这里飘荡着布拉格市民浓厚的生活气息。查理四世在伏尔塔瓦河右岸的旧城区南新建了一个街区，桥附近停泊着来自各地的货船，卸货装货来来往往。周围还有好多商店和仓库，人们聚集之处建了一座广场，查理四世的铜像就建在右河岸桥旁。

看着查理大桥的热闹景象，不由得想到中国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的这幅画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汴京的状况，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桥上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两侧撑着大伞的露天小店一字排开。查理大桥现在虽然已经完全用作观光，但近世以前一定也如《清明上河图》般热闹吧。日本的话就是日本桥一带的热闹景象，日本桥既是连接东海道的起点，也是五条街道的起点。有鱼交易河岸、米交易河岸汇聚各类交易市场，还连着金座和银座。桥头上的广场，是立布告牌的地方，也是挂罪犯脑袋的地方。

石造和木造的桥尽管有些差别，氛围却比较相似。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完全不是一种感觉。最有名的当属保田与重郎（1910—1981）的评论《日本之桥》。他认为日本的桥尽可能与自然融合，尽量不给人人工制造的感觉，接着他便引出日本人论来。但是日本过去禁止建造大型人工桥，德川幕府以守卫江户为由禁止在东海道的大河上建造大桥。旅行者要靠人或坐莲花轿子过河，大井河的河水若是二尺五寸深的话就禁止过河，有时旅行者要住下来等上一个月。大井河上架桥是明治十五年（1882）的事了。

查理大桥上的人行道平坦，几乎没有上桥的感觉，仿佛与周围浑然一体。站在查理大桥中央，想到保田与重郎的评论，感到有些难以理解。

## 5.首里城的故事

“火事是江户之花”，说得很优哉游哉的一句话。遇到过火灾的人非常遭罪，如果这样形容肯定会遭到训斥。江户有一半人是工商手工业者，他们住的市井之处称为“町地”，占江户市区面积的两成不到。狭窄的街区里挤挤巴巴地住着一群没啥文化的善良人。

明历三年（1657）的“振袖火灾”（又称明历大火）、《蔬菜店御七》的故事线索、天和二年（1682）发生的驹入大火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神田一带从明历大火到幕府末期的二百多年里着了三十多回大火。可能是地方到东京打工的人很多，又没有京都、大阪那么团结有力的民间组织，因此很容易出现火灾等问题，与东京人没什么关联。

用木材和纸建造的日式房屋极易燃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袭就将东京多处夷为平地。再加上江户时代多是通长简陋的屋子，并用木板葺屋顶，如果有火星飞来会立刻从屋顶着起来。町奉行大冈越前守忠相是位名判官，不仅如此，他还鼓励用瓦葺顶、用土坯建墙。但是不论怎么鼓励都不太奏效，瓦葺屋顶造价高，只有有钱人家才建得起。如果看到瓦式屋顶，土坯墙的房子，那定是有钱人家。

为纪念冲绳回归二十周年，重建竣工的首里城于1992年11月3日对外开放。我曾经创作大河剧《琉球之风》时多次到访冲绳，还特意参观了当时正在重建的首里城。从初建到最后竣工，一路看来不禁感慨万千。《琉球之风》的外景地正是刚竣工的首里城。首里城创建的具体时间不详。据说是中山王察度（1350—1395年在位）建造的首里城。据朝鲜《李朝实录》1450年的记事，首里城建有三层正殿。正殿前的基坛处围着石栏和石龙柱，十分壮观，屋顶是木板葺屋顶。尚质王十三年（1660）正殿失火，首里城被烧毁。十二年后得以重建，当时首次使用瓦葺屋顶。好不容易修建的首里城却在三十七年又被烧毁，三年后又重新修建完工。第三代首里城正殿经多次修缮，持续使用了二百三十余年。

明治时代废除琉球王国变成冲绳县，从此那里便不再是皇居，一会儿成为兵舍，一会儿又移交给行政部门，老朽得很严重，面临拆掉的命运。闻知此事的建筑史家伊藤忠太博士急忙给文部省发电报阻止，这件事当时引起极大轰动。

首里城正殿融合了琉球、日本和中国宫殿的建筑特色，是极具价值的建筑物。遗憾的是当时这一价值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伊藤博士尽力修缮的正殿在大正十五年（1926）时被指定为国宝，但还是因年久失修于昭和九年（1934）被拆掉重修，后成为冲绳神社的拜殿。昭和二十年（1945）四月的冲绳战役中被彻底摧毁。消失了四十七年的首里城诸宫殿终于重现优雅身姿，这得益于之前拆掉时设计图纸保存完好，还留有很多照片，如此重建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首里城对外开放前再次拍摄了大河剧《琉球之风》，我也稍微看了一些拍摄，主角东山纪之、江守徹等人聚集在崭新的朱红色庭院里，但是导演烦恼于建筑太新而没有历史感。电视剧的时代背景是1609年萨摩进攻前后，还拍摄了三年前迎接明国册封使的镜头。当时拍的应该是1712年竣工的第三代正殿，本应是木板葺屋顶，无奈现在已是瓦葺屋顶。

电视剧的时代考证也没有那么严格，本来江户时代已婚女性都剃掉眉毛，把牙齿染黑的，但是这种装扮与现代审美大相径庭，不得已就都以现在的装束出镜。语言也成了问题，因为是全国播出，如果用冲绳方言的话观众都听不懂，也只好说现在的普通话。

首里城正殿的正面，过去曾挂着一口大钟，乃“万国津梁钟”，现在存放在冲绳县立博物馆里。这口钟的铸造时间是尚泰久五年（1458），口径约九十四厘米，重六百千克。上面刻有铭文：“琉球国位于南海宝地，与三韩（朝鲜）、大明（中国）、日域（日本）有着深厚关系，借助船舶成为万国津梁（发挥世界桥梁的作用）。”这时琉球国在高声宣告要以贸易立国，到十五世纪中叶借助船舶成为沟通世界的桥梁，我们为当时琉球国的雄心壮志深深感动。拍摄电视剧时有幸到县厅政府拜访，在知事办公室旁边的待客室墙壁上镌刻着万国津梁钟上的铭文，冲绳人每每看到这铭文定会感知祖先之恩德，为祖先们曾经的雄心壮志感到自豪。

说到首里城，不得不提的是“守礼门”，冲绳战役时烧毁，昭和三十三年（1958）时重建，成为著名观光景点。它也是首里城的城门之一，好像中国的“牌楼”，与其说是门不如说是一座纪念碑一样的建筑。中国牌楼意为挂匾的建筑，“守礼门”最初挂有“待贤”（等待贤能之士到来）的牌匾，后来挂的是“首里”二字。

汉语中“首里”和“守礼”是同一发音。中国的册封使来时，换下“首里”换上“守礼之邦”的四字牌匾。比起“首的故乡”，“守礼之邦”的字面意思要更加文雅。册封使基本上会停留一百五十天左右，他们走后再重新换上“首里”的牌匾。到了尚质王时就一直挂着“守礼之邦”，门名也改成“守礼门”。所以大河剧最初镜头上看到的还是额匾换成“守礼之邦”的时候。

注解：

**[[1]](#_1_111)　1993年1月1日起，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成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编者注**

# 第四部分

## 1.驴的价钱

丝绸之路上的沙漠绿洲里一棵大核桃树下，几个男人盘腿而坐似乎在愉快地聊着什么。看他们聊得那么开心，我便问翻译他们在说什么，翻译回答说：“那几个人在聊驴的价钱呢。”

驴在沙漠绿洲中相当于人们的脚，哪怕到邻近的绿洲也隔着好几十千米，只好跨着驴去。让驴拉货时人可以在货架上稳稳地睡一觉，驴在心里一定不满地说：“实在太重了。”由此我一下想到日本的酒吧里一群男人单手托着加水的威士忌，一边聊着车的话题。例如：“我这车已经开两年了，打算把这个车卖了凑钱买个二手的进口车呢。”因为太喜欢车了，一聊到车就眉飞色舞的。丝绸之路上的男人们有喜欢驴的，一说驴的话题脸就放光。我问翻译：“他们说没说小麦粉的价格啊？”因为丝绸之路的各地区主要以馕为主食，用小麦粉做馕，所以小麦粉理应也受人关注吧。不料翻译考虑了一会儿后说：“男人们一般不聊这种话题的。”现如今的日本也如此，根本没几个男人知道大米、小麦粉的价格。和水、空气同样重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无奈并没有多少人在意，这能说是“主食”应有的存在感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十几岁的我一度十分关心黑市上的大米行情。虽然自己没去买过，但是黑市上大米的行情成了所到之处人人关心的话题，那不能说是个幸福的时代。可是现在我已经许久都没有注意大米的价格了，也许有人要说我无耻，但这不正说明现今是个幸福社会吗？

翻译又补充了一句：“要是羊肉价格，就能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丝绸之路上的居民几乎全是穆斯林，猪肉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的禁忌，而羊肉便受到大家的重视。而且大部分家庭都以养羊为副业，对羊肉行情的关心不必赘言。

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在挨饿，希望越来越多的地区不再把主食的行情当成重要话题。希望整个社会无论到何时，男人们都能愉快地谈论驴和车。

## 2.金钱之恨

中国把贿赂肆意横行的时代称为“铜臭时代”。似乎说的是铜钱的味道，实际上大规模行贿时根本不用铜钱吧，多是银块儿、金砖之类。批判这些的老百姓多么可悲啊，百姓能想到的就只有铜钱。

《三国志》开篇说到东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时卖官鬻爵成风，悄悄积攒资金买取官位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公然开店——开鸿都门竞价买卖官爵。这在正史中亦有记载。“榜”就是立牌子之意，“榜卖”就是立牌价贩卖之意。

有个叫崔烈的男人用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之位，司徒是丞相级别的官位，与副丞相“司空”、最高军事统帅“太尉”合称“三公”，是顶级官位。成为三公之一的崔烈得意地问儿子崔钧“世间怎么说”，他本希望听到祝贺他功成名就、了不起之类的评价，可是他儿子崔钧却比他父亲要有骨气得多，回答说：“世间都讨厌这铜臭味儿。”这就是“铜臭”的典故。

其实铜钱本身并没有任何罪过，其为物资流通做出了极大贡献。即使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断然没有令人讨厌之处。让人讨厌实在是铜钱万万想不到的事。

## 3.陪购随想

人体模型虽然只是模子，那身姿却比人还有模样。我在美国百货店里看到一个穿着最新款服饰、倚靠在中国罐子旁一米高的可爱模型。我不禁“哎呀”一声。说是中国罐子实在不是什么上等货，还是战争时的图案。绿色旗子上可以看到“三军司令”的字样，旁边小旗子上的圆圈里写着“岳”字。怎么看都像是南宋忠臣岳飞的奋战场景。这图案、瓶塞松动的木桶般的罐子，还有那个倚靠在上面的人体模型，怎么看都觉得不和谐。

后来察觉到，让人一惊随后去回味才是这种展示的目的。现在都用出人意料的宣传手法，至于稍微令人吃惊一点儿的做法都不会让人留有印象。现在已经步入一个很难引起大家注意的时代。到卖女性服装的地方走一圈，会发现类似的流行服装。黑白花图案的中国罐子摆在身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的模型旁，还有把双耳细颈椭圆土罐放倒摆一排在模型旁。

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和鸭梨的形状相似，粗的部分上面是罐口，单靠纤细的下部分无法支撑整个罐身，因此不能立着只能放倒摆着。这种罐子以前是地中海地区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时的容器。装船时把罐子放倒在地，卸货时码头工人再把罐子扛着运走。这就是下半身纤细的原因，扛着比较方便。人把罐子扛在肩上，下半部分就朝前，用两手握着罐子双耳。半消遣地看这罐子会发现它的形状和人的形体很相像。丰满的上半身，苗条的下半身——充分展现这种人体美的模型就立在旁边，这回不再吃惊而能理解这其中的用意了。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上下一般粗的中国罐子是用来衬托身材匀称标准而可爱的模型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则是一种美学变形，摆在模型旁是为了烘托理想的人体曲线。

女人们逛街的时间很长，为了消磨陪女伴购物的漫长时间，男人们只好边瞎转边像现在这样“胡思乱想”。

## 4.汽车社会

汽车普及后，哪儿都为车位问题头疼。停车场也建成多层立体的了。

有一次在旧金山听音乐会，开演时间是晚上八点，结束时间为十一点十五分。剧场旁边有一座九层高的停车场，傍晚时分观众的车如洪水般涌入。十一点半左右所有的车又一齐涌向出口。通往出口的路形成一条线，各层的车在这个通道上合流。一眼望去车辆井然有序，各层的车辆依次谦让、配合地涌向出口，我看的时候没有一辆车打乱这一顺序。这要是日本肯定有不让加塞车而紧跟前车的司机。大家只要想象一下高速入口的情况便知道。

要论汽车普及度，日本还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平。听说美国一般工人也开车上班。现在日本虽然进入汽车社会，但时间还没那么长。让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的疾驰的出租车也不过是三十年前的事。“借过，借过，车要过一下”，尚处于这样阶段的日本，还不能被称为汽车社会。

十年前去伊朗首都德黑兰时有一次惊恐的坐车经历。那里虽然有交通法规，但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行车秩序混乱，不知道什么是守法开车。问当地人才知道，车的层次和司机的威严决定行车待遇。要是成色新的好车，司机遇到别的车不让就会瞪眼，别的车就会乖乖地给让路。现在台北和汉城也处于汽车社会的初始阶段，在台湾即便是再稳重的一个人也有“惊险”的驾车经历，这时若表扬他的车技好，他会无奈苦笑着说“哪里哪里，在这儿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胆量”。

汽车增多会导致交通混乱，市民都希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而做点什么。于是出台各种新交规，使行车变得规范起来。日本还不及美国，但是与其他刚步入汽车社会的地方相比要先进不少，只有真切感受才会明白。接下来我们要力争交通文明的先进。

## 5.同名同姓

去年直木奖**[[1]](#_1__Ri_Ben_De_Wen_Xue_Jiang_Xian)**的选评会后，平岩弓枝问我：“最近去前桥了吗？”十几年前巡回演讲时去过群马县，那时去的是高崎，去没去过前桥就记不太清了。还记得演讲结束后急匆匆地返回东京参加梶山季之的告别会。而梶山都已经去世十三年了。

我肯定地回答道：“没，最近没去过。”平岩回答说：“对吧，就是没去呀。”原来几天前平岩去前桥坐出租车时，司机说最近拉过陈舜臣，说是和一位年轻女性一起，还向他打听哪里的宾馆好。平岩立刻断然地说：“那肯定不是陈舜臣。”听到此我很欣慰。有人调侃：“你被人鄙视了啊。”还有人戏弄说：“正因为冒名顶替的出来了，才说明你是货真价实的啊。”上面说的前桥的出租车司机坚持说没看错，他还拿到了陈舜臣的手写名片，那人和我年纪相仿。我突然意识到可能人家并不是冒名，虽然没见过但据说叫陈舜臣的人有三个。A市某中华餐馆的董事有叫陈舜臣的，甚至有朋友热心地帮我做过调查，一查才知道人家确实就叫陈舜臣。我自己还见过一位中学时和别的陈舜臣是同学的朋友。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气球失败的新闻，当事人居然和丹羽文雄同名。我还认识一位会计师也叫丹羽文雄。看到病房门口的病号牌大家都以为是作家丹羽住院了，还引起一阵骚动，给大家带来不小的麻烦。

我是不是也给其他叫陈舜臣的人添了不少麻烦呢。四十年前台湾报纸上出来这样一则悲愤的告示：“陈舜臣干尽坏事，我与他从此断绝父子关系。此后对于他的事概不负责！”有朋友特意问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但别人给我带来麻烦就只有这一次。三十年前第一次上电视时，原本要拒绝的我最终决定出镜的理由是，如果这张脸得以“公开”，对于其他陈舜臣来说就不再有麻烦了。

## 6.海尔比

听说海尔比在圣诞节早上去世了。前年一起去芬兰旅行时还好好的，还是到岁数了呀。没问过她确切的年龄，估计有八十了吧。海尔比是可以回忆前世的超能力人，被人称为“魔女”，赫尔辛基的某一杂志把其写成魔术师，她知道后很生气。让她生气可不是件美妙的事，编辑和主编都生病，险些丢了性命，闹得沸沸扬扬的。杂志社的老板着了慌，赶紧找海尔比赔罪，这样那两个人才免于一死。杂志社为了赔不是送了海尔比去意大利旅行的通票，她也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意大利之旅。她说自己是两千年前罗马时代的女奴，对那片土地抱有深深的眷恋。托杂志社的福，海尔比“回到”曾经住过的地方，说是还找到了自己的坟墓，但没能找到遗骨。

日本、中国、韩国等所谓的儒教圈听到海尔比这些话会觉得难以置信。半信半疑就算是好的了，完全不相信的也大有人在。

而印度至今还有轮回转世一说，不少人也对此持怀疑态度。诞生于印度的佛教试图切断轮回从而获得解脱。看来轮回是个大前提，印度教思想的核心也是轮回。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提倡的灵魂不灭论也是轮回说的一种，如此看来轮回转世是世界主流性常识。

这世上有各种常识，这片土地的常识未必与其他土地的常识完全一致。现如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美国常识和伊拉克常识（即西欧常识和伊斯兰常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在充分掌握自身世界的常识基础上再去理解其他常识，这才是现在的“常识”吧。

我们共通的朋友马提是个身高近两米的年轻医生，对东方医学和气功很关心。他听说海尔比去世的消息后赶忙跑去医院看望。海尔比笑眯眯地坐起来：“那边非常的漂亮，听说你来看我，我就又回来一会儿。”两个人一直说到拂晓，海尔比才又闭上眼睛。

## 7.羊

今年春节是2月15日。干支要以阴历为准，即使同样是1991年出生，这一天之前出生的人就属马。羊被看作吉祥之物，由“羊”字衍生出“美、善、義、祥”这样寓意美好的汉字。但羊作为动物却似乎并不被看作吉祥之物。

发明创造汉字的殷人干什么之前都要先占卜。没有免费的占卜，于是羊便作为供品充当占卜费。

但是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把羊作为供品呢？

以前有个故事说齐宣王看到作为牺牲供品的牛时突发善心，便命令“以羊易牛”。因此人们说宣王是个吝啬鬼，孟子则为他辩护说：“见牛未见羊也。”解释说，宣王眼瞅着牛被杀觉得可怜才说换成羊，并不是什么吝啬鬼。也许对孔孟有不敬之处，但还是不禁要说难道眼不见的羊就该杀吗？就不可怜吗？那句有名的成语“君子远庖厨”也是出自这个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听到厨房里杀鸡的声音就无法下咽烤鸡，那么要想吃烤鸡就不要接近厨房。“君子”也就那么回事儿。

泷泽马琴对用羊换牛给出这样的说法：“牛死前害怕疼，羊不恐惧还不叫，所以容易杀。”大博学者南方熊楠也赞成这种说法。牛会横冲直撞，所以换成老实的羊。

古代犹太人会把羊放逐到荒野来代人受过，就是《圣经》上说的替罪羊。为什么必须让羊来替罪呢？难道是因为可以任意踢打？羊绝不是可以随便乱杀的，谁愿意被放逐到荒凉的野外呢？

用熊公八公的想法说就是牛好像大企业，羊不过是小老百姓。攫取税金自然要从顺从的一方下手。

站起来吧，全世界的羊们！如果遭受欺侮那就勇敢地叫出来吧，你的角难道是装饰品吗？挑起你的羊角！替罪羊，抱歉！

## 8.女性的名字

写历史小说时总是发愁女人的名字。日本和中国女性的名字一般都不太出现，都是某某女儿、某某妻子或是像《蜻蜓日记》的作者那样称呼成藤原道纲的妈妈之类，基本不出现女性的名字。并不是没名字，只不过是作者们都不愿意写出来而已。

诸葛孔明的妻子是黄承彦的女儿，蔡讽的外甥女，在文献中却找不到她的名字。诸葛孔明的姐姐与庞德公结婚，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我创作小说时更是常常为此发愁，只好硬想一个名字。我给孔明的妻子取名“绶”，他姐姐取名“铃”，不知道她们会不会满意。《三国志》中有吕布因女人杀董卓这一段，那位美女就是“貂婵”。而正史中只是写作“（董）卓的侍婢”，还是无名。后世的作家为其取名貂婵。据说当时朝廷官员的冠上都镶嵌貂尾和蝉羽。貂虽然价格昂贵但外表并不那么灿烂夺目，蝉只在高处喝露水，给人以非常清廉的感觉。是不是要借用这种深厚寓意来给美女取名呢。可是这位美女却挑拨了吕布，这样的做法好像也不是什么寓意深厚的行为。这种设计很有意思。

封建时代是男权社会，女人的名字遭到轻视，称谓都以男人视角，如某某女儿、妻子、母亲之类。《三国志》中，有个叫乔玄的人有两个极为美貌的女儿，姐姐嫁给吴的孙策，妹妹嫁给赤壁之战中的英雄周瑜。即使如此，她们二人也只是合称“二乔”，连名字都没有留于后世。

在中国，取名时忌讳使用同一家族中上一代人名的字。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时要先翻翻“族谱”，查一下至少上五代直系亲属的名字，以免会重字或重名。而日本给孩子取名时却经常会用父母名字中的一个字。

女性的话不知道将来会嫁到哪儿去，如果她的名字和婆家族谱中的人名犯忌讳时就不得不改名字。例如我母亲的名字本来与婆家人名没什么冲突，仅仅觉得是“不好喊的名字”，便另外取名称呼。

考虑将来可能会被改名字，女孩子出生时大多随便给取个名字。所以说本名不那么理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 9.夫妇别姓

要求夫妇别姓，还有人为此进行诉讼。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而且应该积极支持更多的人这样做。刚说出这话便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我们知道中国是夫妇别姓，蒋介石的夫人叫宋美龄，周恩来夫人叫邓颖超，但那是中国的传统，不应该强加给日本，纯属多余。日本有日本的传统，我们要守护自己的传统。”

竟然到了此等地步。据说认定夫妇同姓是日本的传统，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这种错觉还渗透得很广泛。实际上夫妇同姓是从明治三十一年（1898）《民法》颁布以来开始的，不过才百年的历史。当时民法的具体内容是：“户主及其家人称其家姓氏。”昭和二十二年（1947）颁布的《新民法》的第705条及户籍法第14条规定：“夫妇必须姓其中一方的姓。”《新民法》基于新宪法提倡的维护个人尊严和男女平等精神而制定。

的确，旧民法规定除过继之外，如结婚女方要随男方姓，并不是男女平等。新民法虽然明确可以男方随女方姓，但新旧民法都规定要夫妇同姓，这一点是相同的。制定法律的人希望夫妇同姓，关系和谐，但是否也属多余的关照呢？如果从新宪法倡导的个人尊严角度看又如何呢？

执迷于百年短暂的夫妇同姓历史，却遗忘历经千年的日本夫妇别姓历史，真的是愚蠢至极。

到了明治时期，日本老百姓才开始有自己的姓，因为不习惯，所以夫妇同姓的情况很多。当时的明治政府为此还鼓励“尽量夫妇别姓”。称作尼将军的北条政子是源赖朝的妻子，源实朝的母亲。但是谁也不称她为源政子，源赖朝和北条政子沿袭夫妇别姓的传统。日野富子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妻子，她也没有叫足利富子。有朋友怀疑地问我说：“这两个人是不是与众不同啊？”其实这两对夫妻不同姓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况。

普通女性很难在史上留下名字，北条政子和日野富子是了不起的女杰才得以名垂青史。藤原不比等和橘三千代也是夫妇别姓，三千代更是为了藤原家的兴旺付出极大努力，夫妇关系也一定十分融洽。

## 10.白菜

日本南瓜皮上会有一些凸起部分，而韩国产的南瓜表皮就很光滑。把表皮光滑的韩国南瓜种在日本的话，一年两年还是光滑的，那之后即使不与其他品种杂交，表皮也会变得凹凸不平。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对土地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人也是如此吧”，说这话的金达寿可以说饱含深意。

同是蔬菜也各有个性，这与人很相似。白菜原产中国北部，是吃火锅时受到人们青睐的一种蔬菜。大家都以为日本吃白菜的历史很长，其实非也。明治八年（1875）经明治政府扶植，由内藤新宿试验基地进行试种，但是取种失败，种白菜试验以失败告终。

后来经历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的日本士兵就想着能不能把在当地吃到的好吃的白菜带回日本呢，于是把白菜种子带回日本努力栽培。说是士兵大多也是农民，种菜也与生活息息相关，与政府主导的种植试验相比要成功得多，主要还是干劲不同吧。白菜要适应日本的土质，除了人为的努力外，还需要历经岁月。一直到明治末期，每年都要进口白菜种子进行栽培。经过各种试验终于研制出适应日本土壤的白菜品种，现在白菜已经成为日本代表性的蔬菜。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白菜是进口时间不长的蔬菜，听说江户时代还没有白菜的说法时，都会吃惊地说“撒谎吧”。

白菜还是辣白菜的重要原料。辣白菜现在也成为日本人青睐的食物之一。是不是再过不久，如果说日本以前没有辣白菜，大家也会吃惊地说：“撒谎吧。”英语白菜的写法是Chinese Cabbage，美国西海岸的超市把白菜写成Napa Cabbage。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有温泉、葡萄园。葡萄园和造葡萄酒的劳动者曾经主要是华人。据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建造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时大量华人劳工涌入美国，当时葡萄园劳工的九成以上都是华人。我想象着当时华人劳工为雇主种植葡萄，为自己种植白菜。不承想当地人告诉我说：“日本人叫这个Napa，白菜因此得名。”如果真是如此，这种取名有点儿横刀夺爱的味道。

## 11.义战

“春秋无义战”一语出自《孟子》。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从鲁隐公初年（前722）记述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3），计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事。其间数度发生战争，没有一场称得上是“义战”。每每谈及《春秋》中所记战争时都会加上批判：“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出自《孟子》）其中也有相对好一些的战争，但是即使有好的一面也绝对不是什么“义战”。战争本身就包含不义的因素。没有努力说服对方呀，没有为对方做出充分让步呀，总之一般所说的战争很少有一方绝对占“义”的情况。个别的如不打招呼直接侵略人家，受侵略一方进行抵抗可以称为“义战”。

这次海湾战争中科威特的抵抗算是义战。多国军队为正义进行援助也许能看作义战。但不是所有情况都如此，为何以色列侵略近邻时，虽然联合国做出决议，但没有国家向受侵略一方派出援军呢。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为什么各国只有口头支援呢。怎么说都觉得蹊跷。

日本没有深入参与海湾战争是明智的抉择。考虑国际交往，出钱摆出一副发愁的面孔即可。首相的表情与这种情况相匹配即可。出钱进行支援可能会招致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怨恨，但也属无奈之举。不仅是阿拉伯国家，甚至会招致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印尼也产生了一定的反日情绪，报纸报道说已经出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印尼也是产油国，科威特总是破坏协定使石油价格崩盘，对此印尼早就心生不快了。有报道说伊拉克攻打科威特时，印尼一副冷眼观望的态度。真没想到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虽然科威特的抵抗称得上是义战，但是以本应做指挥的埃米尔贾比尔为首的萨巴赫王室弃国民慌忙逃走又是怎么回事呢？

科威特的将来由那些真正进行抵抗的人来担负。我们根本不需要介意临阵脱逃的政府的感谢状上没有日本国名这样的事。

## 12.常识

常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哪怕是打了胜仗的将军也不能随便谈兵论战。战争中不论胜负都会有很多牺牲。为将者遵从命令指挥士兵如摆棋子。

最近多国部队的司令官上电视谈论军事，原本以为作为获胜方的将领是不是要扬扬得意地说一番，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司令官一直用低沉的语气说话，可能是顾及那些为战争牺牲的人吧。由此我想到《孟子》中的一句：“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如有人说自己擅长布阵，善于作战，这是大罪过。牺牲无数生命的战争没什么值得骄傲得意的。电视上的司令官估计没读过《孟子》，但是无论东西方，人心都是一样的。那顺便把《孟子》这一章的前面部分也一并读一下。主要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内容，意思说老百姓最重要，其次是土神和五谷之神，最不重要的是国君。

这是一种革命思想。君主可以轻易换掉，从君主角度来看，这是种危险思想。上田秋成（1734—1809）在《雨月物语》中说：“汉土的书中经典史策诗文都悉数传到日本，唯有孟子的书还没传过来。装孟子书的船怕是会遇上暴风雨而沉没吧。”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事，《日本书记》中便有引用孟子言论的内容。本居宣长的《玉胜间》中还以谴责的语气说：“实在是过于口无遮拦的恶言，此书不是人臣要看的书，竟教臣子们一些不忠不义之事，竟是犯上的话，可怕可怕……”

而现在“民贵”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常识了。因此我们无法体会孟子说此话时的悲愤。常识有随着时代变迁的部分，也有亘古不变之处。“民贵”是前者，自大妄为的战争罪一说则是后者。

## 13.袈裟

波及想象不到的地方了。最近看新闻说海湾战争竟然波及京都的金丝线纺织业。要这么一说，想起每次看到旅行宣传册上阿拉伯酋长的照片，从领子披到肩膀用的都是金线织花的锦缎。战争打响后订单一下就没了，给这一行业带来巨大打击，突然得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说起西阵的金线织花锦缎，不由得让人想起袈裟。“袈裟”是梵语的汉语音译，原本意为黄褐色，是猎人衣服的总称。在山野里奔跑的猎人的衣服自然容易破损、晒褪色。动物对颜色很敏感，因此要避讳鲜艳的颜色，这也算是职业需要吧。

出家人原则上要靠走路化缘获取食物，法衣也不能穿正色。所谓正色指鲜艳颜色，就是原色。袈裟是汉语音译，在汉译佛教文献中还有译成“坏色”的，日语中读成“ejiki”，所谓坏色就是中间色。袈裟的样式现在依旧是把布裁成小块儿缝制。佛教初期就是用废弃的扔到垃圾堆里的褴褛布缝制袈裟。虽然样式留存至今，现在的袈裟却早已不是按最初的精神剪裁，甚至是相去甚远。一般都配上华美的纽扣和环作装饰，袈裟也用颜色鲜艳的上等丝绸制作。

《西游记》中出现各种妖魔鬼怪，孙悟空是三藏法师的徒弟，他们最初遇见的妖怪是黑风山黑风洞的黑大王，是熊化身的妖怪。这个黑大王的好朋友观音禅院的大和尚是个袈裟收藏家，这和尚瞄上三藏法师穿的那件美轮美奂的袈裟，硬要横刀夺爱。原本“美轮美奂的袈裟”就是个矛盾的说法。袈裟原本就不华美，不，不能是美的东西。

不论东西方，宗教都把仪式看得很重，都要显示出“庄严”的感觉，于是变得华丽起来。海湾战争结束后金线织花锦缎的订单又会源源不断吧。还是和平好啊！

## 14.红白

“你喜欢什么颜色？”据说通过这种问卷调查能知道回答人的性格。与此相似的问题还有“你喜欢海还是喜欢山？”我很不擅长回答这类问题。如果回答说“既喜欢海也喜欢山”，那问问题的人会追问说：“不要回避问题。”

《论语》中孔子如此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喜欢海的是知识分子，喜欢山的是道德家吗？也有人既是知识分子也是道德家吧。知者更是仁者，这难道不是大家的理想吗？如果如此，那既喜欢山也喜欢海的回答就是正确的。依此类推，回答颜色的问卷时也可以回答：“红色、蓝色、绿色、黄色都喜欢，白色也不讨厌。”但如果这样回答，那问问题的人就会生气地追着问：“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色？”

映照红叶的红色、燃烧般的夕阳红都极美。蔚蓝的天空也很美，嫩叶的翠绿色也很清新。敦煌鸣沙山的黄色也很震撼，帕米尔高原上慕士塔格峰那银白色的山峰美得令人难以忘怀。如果硬逼着我回答最喜欢的颜色，优柔寡断的我便会迷茫，而且我觉得这种问题有些无厘头。受当天心情、天气、季节、时间等因素影响，同一个人的喜好也会有微妙变化。源氏和平家各自选择白旗和红旗不过是为了避免同室操戈，而不是平家人全都喜欢红色。

《史记》记载殷王朝尊“白色”，消灭殷的周王朝则尊“红”。周为攻打殷渡黄河时，武王的船上跳上来一条白鱼，人们高兴地认为这是吉兆，因为白色是殷的象征颜色。后来下流燃起火逆流而上，到武王兵营前时变成一只鲜红的鸟，叫声动听。看到充满生机的红色，全军奋勇而起，于是红色便成了周的象征色。

可是武王命令部队撤退，因为他不相信什么吉兆，他仔细斟酌情势后觉得时机尚早。这是公元前1050年左右发生的事。到了公元前220年前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时尊“黑”色，衣服和旗帜都是黑色，宫廷里也有些阴森森的感觉。

## 15.升田氏的木屐

和将棋名宿升田幸三氏一起巡回演讲是昭和四十八年（1973）三月的事。那是在山阴地区住了三晚的一次旅行。每当说起这个事便会有人安慰说：“那一定很辛苦吧。”我自己倒一点儿都不觉得不轻松。

旅馆觉得升田是个没有礼貌的人，这缘于他放弃对局导致“不战而败”的“阵屋事件”，那之后世人都以为升田是个极为任性的麻烦人物。他对第一次见面的我说：“我很任性哦。”我回答道：“人性是相互的。”

最后一天晚上，大家都喝得差不多时，升田装着不满的样子冲我说：“你一点儿都不任性嘛。”我回他说：“你不也是嘛。”他很吃惊似的大声笑，我也随着他笑起来。

都说升田嘴很损，那三天我一次都没听到他说什么损话。坐伯备线电车时他开始炫耀起自己的家乡广岛来，说广岛是个富庶之地，所以大家不论做什么都是从容悠闲的样子。电车进入冈山县时，“冈山这地方穷啊，这儿的地主催年租催得紧，大家便一副小里小气的样子，将棋也是那么个风格。”说完他就爽朗地笑起来。虽然没说出冈山的名宿大山的名字，可是就连我这对将棋界完全不知晓的人都知道他在说谁。这算是他唯一一次说损话的时候。

回去时要在冈山车站换乘，不凑巧的是山阴方面的电车晚点很多。在冈山会合的时间本应该很充分的，最后竟然不跑就赶不上。而且那天整个时刻表都打乱了，好多没预约车上座位的乘客涌进我们车厢，预约座位也没了，谁抢着谁算。

随行人员拿着升田的行李，升田紧紧握着脱下的木屐，掀起裤裙在站台上跑，我也紧随其后。随行人员边跑边对我们说道：“哪个车厢都行，先钻进去再说。”电车眼瞅着就要开了，升田跑到车厢门口没上车，直到看我上了后面一个车厢才喊道：“我们总算赶上啦！”我也兴奋地举出“V”字手形。只见升田高举双手，晃着手里的木屐钻进车厢。

车厢里人满满的，连挪动的空间都没有。我在神户站下车，后来听随行人员说，升田把木屐一直别在腰上直到大阪站。那之后没有机会再见面，前些天突然收到讣告，眼前又浮现出他本能地拿着木屐招手的样子。

## 16.典礼问题

所谓“典礼问题”是指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到中国传教时，承认中国典礼仪式是否要被看作异端邪说，这个事件几乎撼动了罗马教皇厅宗教法院的权威。

所谓的承认中国典礼仪式具体是指向祖先和孔子的牌位行礼一事。作为一神教基督教的教徒，这就是个大问题。反过来说，如果不承认这一典礼，那实际上在中国传教活动就无法开展。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祭祀祖先的人会遭到蔑视，会被从大家族中驱逐出去。

中国政府要求官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到孔子庙进行礼拜。新任官员必须先到孔子庙进行礼拜。参拜即意味着政令生效。

耶稣会允许中国基督徒参加典礼从而使他们的传教活动顺利展开。对此加尔默罗会向罗马告发说耶稣会的做法是异端行为。这个加尔默罗会就是将哥白尼和伽利略斥为异端邪说的组织。受理告发的宗教法庭驳斥了这一说法，教皇英诺森十世遵从此裁决发布敕书。这是发生于1645年的事。

耶稣会认为参加故人和孔子的典礼仅是作为市民的一种行为。所谓市民行为指作为市民应当履行的一种道德性“追忆”行为。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承认耶稣会的主张，颁布了允许中国基督徒祭拜祖先和孔子的敕书。

而下一个教皇克雷芒九世偏向加尔默罗会，颁布敕书称前教皇对中国典礼问题处理的敕书无效。随后教皇厅就典礼问题进行调查，由此引发各类事件。1715年根据克雷芒十一世的教皇令，通过否定中国典礼的决案。中国方面也对此采取禁止传教措施，直到鸦片战争后解禁，禁令整整持续一百二十年。解禁后教皇厅还是禁止教徒参加典礼。

看似已经解决的典礼问题在教皇令颁布的二百二十四年后，即1939年由教皇庇护十一世改判为不是异端邪说。1939年正是英法对德宣战那一年，侵华战争已打响，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教皇厅重新讨论向中国传教问题。

缅怀是一种市民行为，祈愿不能单纯理解为宗教性行为。如果缅怀战争牺牲者时一并祈祷世界和平会怎么样呢？谁又能真的看透人心呢？

## 17.文字

最近要去访问蒙古，现在正为此调查相关资料。听说蒙古要在三年后重新恢复“蒙古文字”。现在蒙古语用俄国文字表记。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24年，采用俄国文字则是两年后的1926年。使用俄国文字的时间长度几乎与整个昭和时代（1926—1989）相当。知道那之前的“蒙古文字”的人少之又少。我对于这场文字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有些担忧，因为文字改革本应历时长久，必须重新修改所有文件。闻知蒙古政府已向联合国某机构申请相关的资金援助。

六十年前能进行文字改革在于“蒙古文字”和俄国文字同是表音文字。两年后即1928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次年开始改原来的阿拉伯文字为罗马字。阿拉伯文字和罗马字母也都是表音文字。仅仅使用罗马字母无法完全表示土耳其语言，为此又增加六个字母（上面或下面增加标记），这样除去Q、W、X三个字母外将二十九个字母称为“新土耳其字母”。这比起阿拉伯文字要方便得多。

蒙古采用俄国文字时是为了方便，那现在要改回是因为不方便了吗？

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后，蒙古民族主义盛行，也由此迎来重新恢复“蒙古文字”的机运。但是我加引号的蒙古文字并不是蒙古的传统文字。成吉思汗那个年代蒙古没有文字。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部时发现维吾尔的音标文字，“哎呀，这个方便！”便采用此种文字。后来满族又同样以方便为由采用“蒙古文字”来表示满语。

觉得好就立即采用。蒙古族和满族都在各自的黄金时代豁达地采用其他文字。如果把现行的俄国文字改成“蒙古文字”，就要把横写改为竖写，这样真的是更方便吗？原先不是因为俄语方便才改用的吗？如果真是为了民族尊严，那也是采用其他文字而形成的“蒙古文字”，和俄国文字又有什么区别吗？

要说文字，同是库尔德民族，同样的库尔德语，伊拉克境内的人们使用阿拉伯文字，土耳其和叙利亚境内的人们使用罗马字，亚美尼亚境内的人则用俄国文字。

## 18.萨拉丁

忘记名字了，好像是以十字军为主题的一个好莱坞电影。三十年前的电影，故事内容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一个黑衣人单骑飞跑在沙漠上，与十字军的英雄告别后重返沙场。黑衣人（这个也记不太清了）是伊斯兰军领袖萨拉丁。因为是萨拉丁，所以我极为有印象。

就像美国的印第安人总是愤慨的那样，西部片中印第安人总是坏人角色，十字军题材中伊斯兰一方总是坏人，电影的立场似乎总站在十字军一方。

不了解十字军题材的电影究竟有多少，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萨拉丁出场。这部电影中，虽说是十字军的敌人，但是萨拉丁并没有被描写成坏人。萨拉丁受到十字军即基督徒的尊敬。

萨拉丁原名尤素福·伊本·阿尤布，由于名字过长，欧洲人便缩念成萨拉丁。1187年萨拉丁在哈丁大破十字军，俘虏耶路撒冷国王，时隔八十年终于将耶路撒冷从基督教手中夺回。虽然十字军十分憎恨他，却也不得不佩服。他究竟为何赢得敌人如此尊敬呢？

宣布圣战后，他完全按照《古兰经》要求去做。他的部队从不滥杀无辜，也不乱抢夺。俘虏只要交纳赎金就释放。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萨拉丁虽然大胜却让出阿克海岸线，签订停战协定，并允许基督徒自由出入耶路撒冷进行朝拜。

在斯科特的《护身符》、莱辛的《智者纳坦》等欧洲文艺作品中，萨拉丁都以英雄角色出现。萨达姆·侯赛因与萨拉丁来自同一地方，他想做第二个萨拉丁。（我自己本想写《斥说》，后来放弃了）

萨拉丁创建的阿尤布王朝（1169—1259）曾统治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美索布达米亚等地区。萨拉丁是库尔德人，当时也许正是库尔德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绝好机会。但萨拉丁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他卓越的精神超越了民族。而今陷入悲惨境地的库尔德人不怨恨萨拉丁。要恨就恨那些没理解他的精神却妄图效仿他并自诩为领袖的人吧。

## 19.命名

虽未曾亲见，但在卧床看电视时目睹了六甲山森林植物园里喜马拉雅产的石楠花盛开的景象，不由想起少年时远足去石楠山的事。此花学名“石楠花”，不知道石楠山是那座山的真名还是俗称。还有一座“光头山”，我想这一定是昵称了，没承想在正规地图上一找还真就叫此名。去Touenthikurosu（神户地名）野炊时要途经石楠山。

Touenthikurosu这名字是在日外国人起的吧。是溪流经过二十个弯儿弯曲交叉在一起的意思。战争时期用敌国语言起的地名被视为无耻下流，于是改称“二十渡”。这不算是改名，战争前也有叫这个名字的，想来也有人觉得外国名字叫着绕嘴吧。

那时候我还为自己无法区别石楠花和杜鹃花而烦恼。杜鹃在中国除了叫“映山红”外，还有个足字旁的奇妙名字“踯躅”，日本也用这个名字。“踯躅”原本意为“顿足不前”“徘徊不进”“跳起”，多少与足相关。据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羊吃这个后会死，所以一看到这种花羊儿们便“踯躅”逃散，于是就用“踯躅”给这种花命名。本来叫“羊踯躅”，省略羊字就有了这个名字。其他别名还有“羊不食草”“惊羊花”等，这样的名字通俗易懂。“皋月杜鹃”在杜鹃鸣叫时开放，说是杜鹃鸟吐出的血将花染红，因此也称作“杜鹃”。杜鹃和子规一样都是布谷鸟的别称。

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一诗中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将杜鹃花的命名由来简洁地诵咏出来。李白在“白发三千丈”的秋浦还曾写下“千千石楠树，万万女贞林”。女贞为木犀科，属常绿灌木或乔木。天宝十四载（755）春，五十五岁的李白来到秋浦，正是石楠花、春鹃、皋月杜鹃盛开的时节。

## 20.乌鸦

每当写“乌”字，我都多少有些许不安，生怕被错看成别的字。写别的字时粗糙一些还尚可，就是写乌鸦的“乌”字时会特别小心。报社和杂志社校阅工作都很严谨，完全不必担心什么，即便如此我又会担心读者是不是不把“乌”看成“乌”字。净干些杞人忧天的事儿。

现代中国“乌”字一般用于“黑色”的意思，乌鸦使用“鸦”字，这或许是为了避免混淆。用毛笔写字时若是不小心滴上一滴墨就麻烦了，“月落乌啼”与“月落鸟啼”的意韵天壤之别。清代的文学泰斗段玉裁（1735—1815）解释说“乌”字少一点是因为乌鸦浑身都黑，连眼睛都看不清，所以少一个点。也有说里面空着是因为乌鸦在张嘴叫。“呜呼”一词就是乌鸦的“乌”字加上一个口字旁。

非也，非也，也有说乌鸦少一个点表明鸟没有朝气。糟蹋庄稼最厉害的就属乌鸦，为预防乌鸦糟蹋，人们常常会把死的乌鸦打开翅膀挂起来来恐吓它们。还有其他怪说，如头上少一点是变成一只脚了。自古便传说太阳里住着长三只脚的乌鸦。古代人发现太阳黑子，就把黑子和乌鸦联系起来了。

乌鸦栖息在村落近处，属杂食性动物，吃人的残羹剩饭，还掠夺人种植的作物。虽然不受人的待见，但还是和人类纠缠着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万年。它们一直观察人类活到今天。听栽培果树的朋友说，乌鸦成群来偷吃果子时会有侦察兵侦察，还有专门放风的。

拜访住在山里的朋友，主人却不在家，正要悻悻而归时主人沿着山路回来了。主人说：“想是有客人来，我就急忙赶回来了。”问怎么知道的消息，朋友回答说：“乌鸦飞过来哇啊哇啊地叫来着。”

## 21.俘虏的命运

西亚曾经出现一个帕提亚帝国，由原来住在里海东南角的伊朗民族的古中亚部落酋长阿尔沙克于公元前250年建立。《史记》和《汉书》中对此国均有记载，称为“安息”国，此名是他们的开国君主阿尔沙克的汉译。

《汉书》记载，安息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大的国家，都城在番兜城。番兜是帕尔提的音译。汉武帝曾向安息派出使节，安息两万骑兵出迎并进献鸵鸟蛋和奇术使。安息后来在227年为萨珊王朝取代，拥有长达480年的长命政权。安息与罗马通商，双方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战争。安息是有胜有负，公元前53年借安息内讧之机，罗马派出大军进攻安息，最终以安息的奥罗德斯二世大胜告终。罗马的执政者克拉苏在卡雷战死，罗马将士牺牲两万五千人，被俘一万人，那些俘虏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安息和罗马之间并不是只有战争，也一定有相当长的和平友好时期。安息的王子们都曾留学罗马。是不是有过遣返战俘呢？安息历史上没有相关记载，罗马的文献中也没有相关记载，仿佛这一万名罗马战俘就那么消失在中亚的沙漠中一般。

1281年，元朝第二次向日本派出远征军。不料东路军的九百艘和江南军的三千五百艘战船组成的大舰队受神风影响而全军覆没。因为杜撰而饱受非议的《元史》记载日本的部分中写着生还者仅三人。而《世祖本纪》中则记载“十人中有一两人生还”。总共有约二十万人的军队，如此算来大概有三四万人生还，这样就有两到三万人的俘虏，而带到博多的蒙古、高丽、女真、汉人（华北地区）俘虏都被杀害，只有原来的南宋即江南将士未被杀而被分配给武士们。

南宋灭亡时元朝水军毫发未伤得以保存下来。水军中南宋将士最多，俘虏肯定超过一万人。幕府没有土地能够作为奖赏，只好把能干活的俘虏赏赐给打胜仗的人。他们后来的命运也不得而知。

终于知道叙利亚俘虏的死伤者名单等情况，这算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吗？

## 22.伸缩

坐过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是一次要坐七十八个小时的长途之旅，整整三天时间自然会无聊。火车一过甘肃车窗外便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躺一小时再起来还是沙漠。包头来的火车晚点，为了等那趟车上换乘过来的乘客，在甘肃等了很久。一天就一趟车，赶不上就要等上一天，所以大家都只好苦苦等着。我从来没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不由得有些焦躁。当时我把一小时当成一分钟去想。

七十八分钟就是坐快速电车从神户到京都的时间，再加上晚点三分钟。要是晚点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那乘客就该生气要求退票了。但是就迟到三分钟一般不会有人抱怨。不看手表大概不会察觉到晚点的程度。“迟到一会儿没办法啊”，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圣武天皇到河内国知识寺行幸是天平十二年（740）的事。那时候很多人从百济过来，很有国际化氛围。知识寺作为那些人信仰的圣地，他们自己捐款铸造昆卢舍那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天皇礼拜佛像后说：“朕也想奉造一个（礼佛敬白文）。”

寺名“知识”源自与佛陀的教诲有缘之人一意。还有一层意思是有缘人出财物、人力建寺。为此，圣武天皇十分感动，才说出自己也想这样建造一尊佛像。

但是知识寺终究只是外来人自力更生建立的一座小寺。如果汇集全日本有缘人的力量基于同样理念建造寺院的话，那必须把知识寺这个样本扩大规模来想。我在乌鲁木齐把小时缩成分，与此相反知识寺的尺寸则要放大无数倍。虽然不知道知识寺中昆卢舍那佛的具体尺寸，扩大规模的话需要的铜和锡的数量要以数百倍来计算。

天平时代建立东大寺就是基于此建造而成。造佛像的诏书这样写道：“若有人愿意贡献一枝草、一把土来造佛像，那就顺着这样的意愿来。”圣武天皇的脑子里一定是把知识寺的尺寸无限放大了。

## 23.云仙

远古时超大级的火山喷发反复出现。不能用“喷出”，要用“喷飞”更恰当。熔岩、火山灰、尘埃大面积覆盖，沉积数十米高。经历漫长岁月，风雨带走火山灰和尘埃，熔岩坚硬的部分裸露出来。

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耸立着竹笋状、蘑菇状的巨大岩石柱。五月下旬去土耳其旅行时，导游为我们介绍了这一奇观的形成过程，据说是人类诞生之前便已形成。来自安卡拉的司机师傅边说着“火山”边比画着火山喷发时的样子，还说到了“日本的云仙”。说起火山就自然说出日本的火山名，更令人吃惊的是云仙这个地方竟然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更意外的是，回酒店一打开电视就看到了云仙惨案。刚刚那位司机不是早就知道云仙，怕是昨晚看电视才知道的吧。重大新闻，不久影像就会传遍世界。实际上去土耳其之前，我在维也纳待了几天，在那儿听到印度首相英迪拉·甘地遭到暗杀的消息。不是电视报道，而是从酒店大厅那儿拿的卫星版日语报纸得知这个消息的。现在影像也好，铅字也好，新闻迅速就传遍世界。海湾战争时甚至有人批评说报道就好像电视游戏似的。

但是云仙惨案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惨烈。英迪拉·甘地首相遭暗杀也是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会对恐怖主义愤恨，对牺牲者寄予深切的同情。

悲切的新闻能如此迅速、广泛地传向各处，让更多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不由得要感慨诞生“世界人”的土壤环境终于开始萌发。

回过头来想安卡拉的司机师傅比画着火山喷发的动作，双手张开、耸着双肩是在向我表达慰问之意吧。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他那含混不清的云仙的发音。

## 24.信息化社会

迈入信息化社会给我们带来极大希望。准确、迅速且广泛传播的信息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从而使人们萌生世界人意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世界国”或是“地球国”诞生的希望，不是没根没梢的渺茫希望。

海湾战争、英迪拉·甘地遭暗杀、云仙火山大喷发，这些大事件通过影像等媒介迅速传向全世界。而二百年前即1792年发生的“宽政岛原大事变”即使是日本国内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即便知道的人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也不得而知。那一年，比起岛原大事变江户地区似乎更关心将军家观看大相扑谷风和小野川之间的比赛情况。

织田信长1582年横死在本能寺一事可能全日本都知道。即使这样的消息也没能飘洋过海传到其他地方。本能寺事变的十年后即1592年，文禄之战（秀吉出兵朝鲜）打响，朝鲜和中国因此不得不开始关注日本。战争也能够促进信息交流，如成为战俘的日本士兵提供的消息之类。

中国正史《明史》的日本传中如此描述信长，山城州首领权势很大。《明史》是秀吉出兵朝鲜一百多年后清朝初年编纂的。记录了信长为明智所杀，当时秀吉正讨伐参谋阿奇支，听到事变后迅速返回诛杀明智。但是年代记载有出入，弄错四年。参照的基本史料是朝鲜柳成龙编写的《惩毙录》，上面还记载说“秀吉涌入日本的华人”，即秀吉是中国人。这个柳成龙是秀吉征朝时期的朝鲜宰相。这些信息的考据性太差。

萨摩的蕃医许仪后本来是供职岛津的名医，后被倭寇拐走。他给蕃主把脉时事前得知秀吉的出兵计划，写密信向祖国告急，传达了十分准确的情报。他千辛万苦找到往返琉球的商人帮忙传送情报。据说这封急信到达明朝中枢部门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今年（1991）是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一百五十年，鸦片战争是无电报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我想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迎接信息化社会到来，准确快捷的信息定可以拯救我们人类。

注解：

**[[1]](#_1_112)　日本的文学奖项之一。——译者注**

# 第五部分

## 1.关于二十年

俗话说，十年一个往昔。这里的“一个”给人不那么厚重的轻快感。确实，往昔是往昔，但是并不给人岁月如此厚重的感觉。

俗话说，一世三十年。据说“世”字就表示三十年。总之，过去人最富精力的时间大约就是三十年。成人、结婚，中国称之为“成家”。成家、生子、育儿、参与社会活动（工作），直到孩子结婚时就算完成任务，可以退场了。一般就是三十年时间。

算世代也可以以三十年为基准。现居台湾的孔子嫡系孔德成是第七十七代。孔氏已属高龄，已经是有孙子的年纪了。大致算一下现在孔氏已经有第八十代后人了，再乘以三十那就是两千四百年，也正好是孔子距今的时间。孔子故于公元前479年。

这三十年和十年之间是二十年，英语用“score”一词来体现。对岁月的感觉因人而异。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那这一年对于当事人来说便是有岁月感的一年。战争结束那一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1945年我刚好满二十一岁。二十一年里有不懂事的青葱岁月，不知不觉地开始养成一个习惯，以二十年为一个阶段来感受岁月。回顾我出生以来的二十年，其间发生了日俄战争。再往前追溯二十年是明治时期著名的鹿鸣馆时代。以二十年为一阶段总结过去使我们对历史的感觉更加敏锐。

二十年前迎来冲绳回归，那一年我两次去冲绳。七月同前卫俳句诗人赤尾兜子一起转了下冲绳本岛和石垣岛。赤尾以“每天周日”的记者身份去冲绳。这是我第一次去冲绳。十一月以文艺春秋的文艺讲演会讲师身份同山冈庄八、开高健两人一起去的，当时在那霸住了一晚上。

赤尾、山冈、开高都没了。年事已高的山冈暂且不论，赤尾和开高二位都比我年轻。这也有二十年了，我也因此感伤不已。用岁月来衡量过去如何评价好呢？同样也可以这样衡量未来。

已经回归二十年的冲绳，二十年后会怎样呢？不仅要回顾过去，更要展望未来。再有二十年，我就八十多岁了。二十年后希望能看到一个光芒万丈的冲绳。

## 2.改变视角

今年成人节时在冲绳演讲，还顺便赏了樱花。那时突然想起几年前和一位韩国朋友关于樱花和木槿花的争论。日本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国花和国歌，但作为常识都认为“樱花”和《君之代》分别为国花和国歌。而韩国则是法律上明确规定“木槿”为国花。虽然我们很不适应用法律手段来规定国花，但翻翻百科辞典会发现超过五十个国家都用法律规定国花。

我问道：“木槿花，寓意一朝之梦的木槿花，难道不是无常的代名词吗？”朋友这样回答：“木槿花早上开放晚上凋谢指的是每一朵小花，但木槿接连不断地开花，持续不懈地开花，整棵树从夏天一直能开到秋天，花期长。反倒是日本的国花樱花才短暂开放，这才是无常吧。”还告诉我说木槿花的发音对应的汉字是“无穷花”，寓意吉祥。

如此说来，樱花从冲绳一直延续开放到北海道，能开近半年时间呢。

除了国花，韩国还把“喜鹊”定为国鸟。中国用“鹊报”“鹊声”“鹊音”等词表达好事来临，喜鹊的啼声预示着好人好事到来。韩国把这样寓意吉祥的鸟定为国鸟，那日本的国鸟呢？

思来想去也没想到一种鸟，让人觉得国鸟就非它莫属。《日本书纪》中记载救过神武天皇的“金色灵鸠”指的是鸢，那这么说来，鸢就是国鸟了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有过“金鸠勋章”，但是好像把鸢比喻成小鹰，不是特别了不起的鸟。

韩国国鸟喜鹊在欧洲则被视为不吉之鸟。传说它在空中冷冷地嘲笑那些没有登上诺亚方舟而淹没在洪水中的人。北欧还传说魔女外出时会变成喜鹊模样。同样的花有说是无常之花，也有说是充满韧劲的花；同样的鸟有说是吉祥之鸟，也有说是魔女的化身。人若改变视角，阐释也随之不同。这个毛病不改，无厘头的扩大解释会肆意横行。

## 3.船之眼

听NHK电视台的朋友说，琉球朝贡的船只在福建复原并顺利举行下水仪式。船头上刻有大眼睛，象征雕或游隼的锋利之眼。雕和鹰从门类上无法进行区别。鹰科中大型的称为雕，小型的称为鹰。

古代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老普林尼卒于79年，据他介绍成年雕会啄幼年雕让其直视太阳。如果小鸟眨眼或是流出眼泪，大鸟就会把它赶出巢穴。这和狮子把幼狮推下悬崖的方法相似。适者生存！视力弱的雕、骨折的狮子无法生存。人亦如此，敦促孩子学习的妈妈有很多，但是人类社会中即使不学习也能够生存下去。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也常遭人诟病说其不具科学性，但是前述的大雕育儿不是更让人产生疑问吗？

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死在叙利亚的革拉城。据老普林尼的记述，一只乌龟从空中落下击中埃斯库罗斯头部，导致其身亡。据说雕喜欢吃乌龟肉，但是乌龟壳太过坚硬，它脑袋一缩雕便无可奈何。于是雕抓住乌龟后把其从高空中扔下，让其撞击地面摔碎后再吃。埃斯库罗斯比老普林尼要早上五百年，老普林尼的这种说法不由得让人产生怀疑。

暂且不论事情真伪，单看雕和鹰的眼睛就知道它们绝非等闲之辈。高空飞翔的老鹰一旦发现隐匿在树叶下的蛇，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目标，不得不感慨它的眼力之好。游隼也是如此，为了一个小小的目标收紧翅膀俯身一冲，那速度竟然可以达到四百千米每小时，比新干线还要快。

这样一说我们便不难理解古人设计海船时希望给船安上如猛禽般锐利之目的初衷了。要是有雕那双眼睛，不论多远多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鸬鹚眼睛、鹰眼睛”这个俗语听起来让人不舒服。驯化鹰和鸬鹚用来捉鸟捉鱼是人类想出来的坏主意。鹰和鸬鹚不是为人类捕捉猎物才练就如此眼力，那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人类不过是利用了它们的这一特性。

朝贡船上的雕之眼也不是什么卑劣手段，船本就被看作神圣的灵鸟，雕之眼就是我们想倚赖的灵力。海上之国琉球自古便把船看作珍宝。

## 4.琉球馆客商信局

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林则徐是福建省福州人。鸦片战争日益激烈之时，皇帝曾向各地总督、巡抚（相当于省长）询问对策。其中进言最好的人将会被派赴广州解决鸦片问题。就是举行了一个咨文比赛，获得第一名的是湖广（湖南、湖北）总督林则徐。于是林则徐从武昌赶到北京，在紫禁城受到道光帝的接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即奔赴广州。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到达广州。日记中他写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夜，作家书一封托福州琉球馆客商信局。”到达岗位后写信给福州老家告知情况，把信托付给“福州琉球馆客商信局”。“信局”是民间自发经营的递送机关，也是国内兑换机关。主业是运送业务，还兼做邮钱业务。可以邮寄信、物品，还可以存放钱，因此没有相当的信用做不了这些业务。

信局的宗旨是迅速、切实。邮递业务主要依靠水路，运送物品和现金的人会有专人护卫。无法揣测林则徐使用哪种意义的“客商”，依据语境推测不是广州本地商人，应该是福州总部派来广州的人员，频繁来往于福州和广州之间。

初来乍到的林则徐自然要问本地幕僚联系福州的方法。幕僚于是这样回复：“明朝时就有琉球馆雇的船前往福州，您把信托付给他们就行。”我们会觉得琉球馆进行的商业活动受到相当多的限制，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广州有专门的人员，钦差大臣的家书都寄存在他们那儿，其信用度可见一斑。那之后林则徐的日记中多次出现将家书交于谁，还写上“捷足”这样的字眼，有时还会写上“健足”。实际上就是“信使”，说明当时有人做宅急便这种业务。要去几个地方就采用“千里马”，是陆地宅急便。

十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到：把家书写上“捷足”交于蔡美珍，即要在十二月五日之前把信送到福州。林则徐的日记中还详细介绍了运费情况：预付两元，在指定日期时到达再追加两元，如果早到一天要多加一元，晚一天会扣除半元钱。琉球馆客商信局在那么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努力坚持运营。

## 5.紫禁城的甲胄

摄影作品集《爱新觉罗·溥仪画传》于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末代皇帝溥仪1908年三岁时即位，辛亥革命（1911）发生后第二年宣布退位。当时溥仪大约七岁，此后依据中华民国的优待条件允许他住在紫禁城。

1924年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部下鹿钟麟接收紫禁城并将溥仪一众人驱逐出去，溥仪当时十九岁。摄影集中有一张身着日本甲胄的少年照片。那时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是他开心快乐的时光。弟弟溥杰和皇族毓崇是溥仪的“伴读”。所谓“伴读”就是“皇室的学友”，一起听国师讲义。而身穿日本甲胄的少年是伴读毓崇。依据照片说明可知，溥仪很喜欢在广阔的紫禁城里探险，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发现了那副甲胄。好像还附带这副甲胄的来历说明，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狩猎时穿过。溥仪当时正迷恋照相机，于是便让伴读毓崇穿上甲胄照了张相。七十年前的照片竟保存得如此完好。摄影集的说明上写着这副甲胄是“康熙—嘉庆年间由琉球国王进献，与日本甲胄极为相似”。

康熙元年是1662年，嘉庆末年是1820年。一百五十八年听起来不觉有些茫然。嘉庆是乾隆的儿子，因此乾隆不可能穿着儿子执政时期的进献品。细细想来，大概是一百五十余年间先后进献了几次甲胄，无法确定乾隆穿的是哪副，只好写下如此说明。那期间清朝的册封使来琉球六次，甲胄应该是册封使或是谢恩使带回去的吧。写照片说明的人认为是琉球的甲胄，因此觉得与日本甲胄极为相似。外表来看是日本甲胄，琉球没有那样的东西。恐怕是从萨摩或是江户那儿弄到手的漂亮甲胄，作为艺术品一起进献了吧。

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中记载贡品中有一件盔甲，附带手背套、护胫具。看照片发现好像毓崇都穿戴着。乾隆时期的册封使只有1756年去过琉球一次，乾隆帝狩猎时风流倜傥地穿着的那件可能是《中山传信录》里面提到的那件。琉球进献的甲胄一直保存到1920年前后。

这本摄影集中还有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会场上溥仪和鹿钟麟互相拉着手的照片。时光荏苒，三十七年前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的将军也同样上了年纪。

## 6.苦瓜琐记

从冲绳旅行回来，我家饭桌上有段时间一直有墨绿色的苦瓜。一起去冲绳旅行的妻子一有时间就去市场买苦瓜。有的季节神户的市场里也会出现苦瓜，但是总觉得味道和冲绳的不一样。

我曾经因为苦瓜有过苦涩的经历。二十年前我在一篇散文中说“有不少东西中国人经常吃而日本人却不吃，苦瓜就是其中一例”。因为刊登在一本周刊杂志上，于是收到很多反驳的读者来信。后来收进书中时在“不吃”的前面加了个程度副词“不太”，来把这事儿敷衍一下。读者来信主要来自九州地区。而对冲绳来说，改成“不太吃”也行不通，必须改成“吃很多”。因此也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加调查就写。

最近看一本介绍食物的汉语书，其中有这么一段：“广东和福建两地多用苦瓜做菜，江浙一带却连苦瓜是什么都不知道，这里做一下用途介绍……”如果这样，我二十年前写的那段“中国人常吃”就是有问题的。苦瓜也叫蔓荔枝，江户时代将其作为观赏植物进行栽培。苦瓜应该是从中国经由长崎或琉球传入日本的，真正的原产地是印度。

最初出现苦瓜的文章是明代皇族、剧作家周宪王（原名朱有燉，1379—1439）所写的《救荒本草》（可以充饥的植物），当时名为“锦荔枝”。那之前宋和元的植物志之类的书中从未出现。

据说苦瓜是七下南洋的郑和从苏门答腊岛带回来的。他带领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是1405年，第七次南下的结束时间是他辞世前一年1433年。这一时期正好与琉球王国的“大交易时代”重合，从东南亚带回苦瓜的或许是琉球人。但是郑和计划把中国的物产和种子带到西方，再把西方的东西带回东方，据随行者费信所写的《星槎胜览》介绍，苏门答腊岛的一等瓜竟然是苦瓜。因此琉球人带回苦瓜的可能性很小。

前面说到周宪王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锦荔枝即癞葡萄。”估计“癞葡萄”之名可能来自苦瓜的外表形状。剧作家周宪王一定是同情苦瓜才给它起了个美名“锦荔枝”。广东也称苦瓜为“凉瓜”，这可能才是最理想的名字吧。

## 7.奇谈怪论

唐僧法显乘商船从斯里兰卡起航回国是411年的事。这艘载有二百多人的大船为防止意外备了一艘小船。海上刮大风，历经十三个昼夜后，船漂流到一个小岛上，说是尼科巴群岛中的一个。这个岛到耶婆提国需要花费九十天的行程。过去汉语句子不加标点，写得满满当当，读起来也要花上个十天八天的。耶婆提到苏门答腊需要十天左右，到爪哇花的时间更多。如果等风向的话花九十天也不是没可能。

他在耶婆提停留不久便坐上开往广州的船。又是二百人乘坐，准备了五十天干粮的大船。遇暴风雨在海上漂流七十天仍未到达陆地附近，无奈改换路线历经十二昼夜后终于抵达山东半岛的长广郡。不知道这七十天是从耶婆提起航算起，还是遭遇暴风雨后的天数。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一共算起来就超过一百天，再加上那十二天才终于着陆。

不论哪个国家都有说离奇故事的人。几年前有个中国学者说法显乘坐的船当时横贯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后返回。花一百多天能够往复太平洋一次？这个学者想要说明“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中国人”。但遗憾的是至今都没几个人赞成这一观点。因为美国太遥远，如果到冲绳或是日本近海倒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是个无人岛，那船上这二百人或许就能建立一个新国家。船上还有造船专家，再造一个小船与其他岛屿取得联系、通婚生子，倒是可喜可贺的事。

经常有商船从耶婆提到中国，因此法显要借这个路径回国。当然还有其他船只出航，也会出现遇险漂流的事。

有记载说法显回国后的第十年即421年时倭王讃（靠谱的说法指仁德天皇）向南朝刘宋朝廷派出使者。倭王讃派出使者后又经历珍、齐、兴、武四位王，据比较可信的说法，武就是雄略天皇。对方是南朝，从日本出发的船便开往东海，当时的冲绳海域定十分繁荣。

## 8.酒铺泡盛屋

十岁到二十一岁的大约十二年里，我住在神户海岸街五丁目的外大街旁。准确地说是华侨商馆，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写字间，三楼是我们一家人的住处。

现在四丁目东面港塔那里原来叫“中突堤”，那东侧是美利坚埠头，再往东挨着第一、第二突堤。这是专为外国水路船只提供的突堤，我家附近的中突堤是国内航路起航的地方。

战前台湾船只也从国内航路起航处出入。中突堤的前端是“富士丸”“高砂丸”这种一万吨级左右的大船的起航处。突堤的后端就是现在建港塔附近，原来是别府和冲绳航路船只的接岸地带。

去东侧突堤附近玩儿时，偶尔会遭到盘问，但是在中突堤就不存在这样的烦扰。没有海关、检疫，也没有出入境管理部门。我家东边隔着条马路，对面红色砖瓦的是住友仓库，旁边往西是运输公司，再往西是旅馆，那旁边是个卖酒的酒铺。这一带的酒铺现在还残存一些痕迹，还可以在那儿站着小酌一杯。我问爸爸：“为什么不摆些椅子呢？”爸爸回答说：“因为没有营业执照。”我当时还纳闷放椅子为什么需要营业执照。没有餐饮店的经营许可证，客人可以随便在那儿喝酒。那个酒铺挂着深蓝色短门帘，门帘上用白色写着“泡盛”二字。于是我从小学时就知道泡盛是冲绳的一种酒。这不是爸爸告诉我的，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白色字迹的泡盛看上去很有气魄，让人觉得是种豪爽的酒。泡盛卖得好大概是因为那附近住着很多冲绳人，或许就是专门为他们开的这家酒铺。隔着两家的旅馆叫竹中旅馆，也经常住一些冲绳客人。

但是卖泡盛酒的店名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附近的人都称呼“泡盛屋”，说不定这就是酒铺的字号。那样的话估计老板是冲绳人。昭和二十年三月十七日的大空袭将我家附近化为灰烬。当时居民们早就离开城市出去避难，因此那附近没有出现死者。我偶尔会想起泡盛屋，不知道它当时是什么情况。

## 9.新米利特组织

虽然规模庞大的冷战已告一段落，但是民族及宗教中的小纷争仍在四处上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时常会有倒退，好像还是重要的部分在退步。

纵观西亚历史，会发现有一个叫“米利特”的组织经常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例如萨珊帝国时代将琐罗亚斯德教作为国教，聂斯托利派中有基督徒，后者被允许保持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生活。这样的自治团体称为米利特。

不仅限于西亚，东亚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米利特的组织。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曾统治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广大地方，实行二元行政。治理游牧的契丹人的是北院，治理以农耕为生的汉人的是南院。在辽境内契丹族和汉族肯定不是同等待遇，同样萨珊帝国中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基督徒也一定不是同等待遇。难得的是能够允许大家共同生活，没有强迫谁去改宗教。

最大限度发挥米利特组织力量的非奥斯曼帝国莫属。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重兵大举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土耳其人的人口数量锐减到半数以下。而当时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等人口总数过半，他们因为受到米利特组织体系的护佑得以保持自己民族原有的风习和信仰，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帝国主义产生支配殖民地的思想，致使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米利特体系所创造的和谐局面被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土耳其站在德国一方，而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与站在俄方的亚美尼亚准备合力进攻土耳其的谣言四起，最终造成大屠杀。

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米利特组织。为此我们必须先理解并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冲绳有个闽人三十六姓的“久米村”，那里就是采用一种米利特方式。冲绳人没什么民族对立和深刻的信仰纷争，不知不觉间居民们便自然地融合到一起。

我觉得冲绳久米村就是成功的米利特。在这个高歌人类未来的时代，有必要重新建立世界性的米利特，冲绳的经验值得借鉴。十九世纪前半期即日本的锁国时代，来到冲绳的英国人先遣队为何对琉球有如此好的印象，这其中的理由有必要好好思考一下。

## 10.清明

乘坐豪华游轮“飞鸟号”游神户、那霸、基隆，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这是继十年前在香港乘坐法国产中国客船“鼓浪屿号”到厦门旅行后的又一次乘船旅行。当时季风刮得厉害，船身摇来晃去的，妻子一顿饭都没吃，说以后坚决不坐船旅行了。一晃十年过去，妻子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再坐一次。

十年前的那次旅行是四月初，正好赶上很多东南亚华侨从香港上船去清明祭祖。常见说法是“扫墓”，也有说“拜墓”的。这次坐船旅行到基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去扫墓。之前我大多在十一月或一月回台湾，每次和亲戚说想去扫墓时，对方便摇头说：“不是清明不要去。”

现在终于明白亲戚拒绝我的理由了，南方植物生长旺盛，有的杂草都会没过头顶，还会把整个墓地都给覆盖，进都进不去。快到清明时大家把杂草割干净就能进墓地了。“扫墓”不光是清扫墓地的意思，还有打扫出一条扫墓之路的意思。

我去扫墓时已经是清明之后十几天了，好在还能进得去。杂草长到看不见墓的程度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古时称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即要禁火的意思），因此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虽然中国人不喜生冷食物，但是寒食这一风习倒是坚持守下来了。这一说法的由来有好多版本。有一说法是传说春秋时代晋的忠臣介子推在这一天被烧死，为了哀悼他，人们不可以焚火，晋（现在的山西省）在清明时风很大，也有说为了防火才禁止焚火的。

清朝原本与扫墓没有关系，从唐代开始逐渐养成了清明扫墓的习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虽未将清明扫墓列入礼制，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习俗，还颁布了要好好祭祀的诏书。阳历四月初，正如“清明”二字所示是春光明媚的季节。一直憋在家里的人们想着到户外去走一走，因此清明的别名又称“踏青”（漫山遍野地走）。对于很多人来说扫墓也是一种远足方式。

唐代以后清明就成了扫墓日，但是为什么这个风习没有传到冲绳以外的日本呢？是不是彼岸（即秋分）时扫墓在日本已经成为风习的缘故呢。春分、秋分都去扫墓的风习在中国倒是没有，连佛教的本家印度也没有。

## 11.布哈拉的劝酒文化

久违的丝绸之路之旅。

造访了中亚地区苏联的江布尔、希姆肯特、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五个城市。其中前两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后三个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城市。因为刚独立建国，行政方面还百废待兴。如给外国人发放签证竟然要入国后再申请，这样一来特别花费时间。同行的俄罗斯人（当然现在已经成为外国人）翻译竟反过来教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人员如何准备表格，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顺利解决。终于等到按印章这一步，俄罗斯翻译开玩笑说：“一般的文件要用右手按印章，就签证要用左手按。”听到出入境管理局人员要求换成左手拿印章，不禁让人觉得有些奇怪，过一会儿终于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只好抿嘴一笑。不管用右手还是左手按印章，按在纸上的印章是一样的。我也是换手之后才意识到这个。真切感受到了这些刚独立建国的国家的真实状况。

十年前NHK电视台拍摄丝绸之路节目时，一些当地人（主要是广播领域）给了极大的关照。深切感受到能一起共事就是最切实的国际交流，真正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友情依然不变。

最后到访的布拉哈弥漫着神秘气氛，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市。当地广播电视局的领导毛福新还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开宴前毛福新说了几句贺酒词，干了杯伏特加。我也附和着说了感谢的话，也一饮而尽。接着就是从俄罗斯一道来的朋友还有塔什干来的朋友都分别说了些叙酒情的话。每次说完大家都要一饮而尽。“我们乌兹别克人尊敬母亲，爱护女性。那么请您夫人也说几句吧。”毛福新点名要我妻子也说几句，我妻子只好说了几句问候话，然后又是干杯。我苦笑想：“哎呀，这不就是宫古岛式喝酒文化**[[1]](#_1__Yi_Qi_He_Jiu_De_Ren_Du_Yao_F)**嘛！”只是把冲绳烧酒泡盛换成伏特加。

土地不同人情却相似，我莫名地感动。晚宴结束时听毛福新说他今年要去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会颁发一个“哈吉”称号，象征模范穆斯林。伊斯兰戒律中有禁酒一条。哦，原来刚刚毛福新喝的不是伏特加，是伏特加瓶子里灌的水。

注解：

**[[1]](#_1_113)　一起喝酒的人都要分别说个话题，每次大家都要一饮而尽。——译者注**

# 第六部分

## 1.械斗

战后我回台湾待了一阵子，还在故乡的中学做教员。说是故乡，其实我是日本生日本长，只是在暑假时会到亲戚家小住，故乡于我就是如此程度的亲近感。故乡是一个叫新庄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市了。当时是“镇”，人口不过一万多一点儿，现在的中学也是后来建的，我在学校里教英语。

有一天傍晚，正在和朋友聊天时忽然看到一个男的敲着锣四处喊着：“来来，来祭祀啦！”我问朋友是怎么回事儿，朋友回答说：“不知道啊。这种事一年能有个两三次。我妈做了点儿菜，今晚我们去吃吧。”啊，连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人都不知道。我问年长的人才知道那天是械斗纪念日。他又说：“年轻人居然不知道这么重要的日子的来历，真是令人气愤。”

淡水河对岸是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因为大富豪林本源的庭园在此而闻名，当时与新庄规模差不多。隔着河两个镇子的男人之间发生过十分惨烈的事件，还死了不少人。为了祭祀那些死去的人便喊着给他们做吃的。我问老者：“几年前发生的事儿吗？”“嗯，不知道。有一百年了吧。”“为什么打架呢？”“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年代因何种原因发生的。原本械斗就是那样的吧。是不是这个镇子的女孩遭到那边年轻人调戏才发生惨案呢？

诸桥《大汉和辞典》中“械斗”一条做如下解释：“各自纠集党徒，携带凶器等致命性武器进行打斗。明清时代中国南方最为盛行。”我第一次知道“械斗”是学生时读《孙文全集》，那里面写了“台湾械斗等……”，说是中国南方特别是台湾地区尤为盛行。

福佬（福建南部人）与客家人之间常有争斗。同是福佬，泉州府人和漳州府人之间也争斗。异姓之间也如此，比如林姓和李姓之间也争斗。新庄住的多是泉州府人，板桥住的多是漳州府人。板桥大富豪林本源原本住新庄，因为泉州人太多便搬到漳州人多的板桥去。只要聚集一定人数就有可能大打出手。这种械斗称为“泉·漳拼”，“拼”就是豁出命去打斗，其实是很愚蠢的行为。

《清会典》所载，二十人以上的械斗要征收费用、约定日期。如果丧生四人以上，主谋就要立即处以绞刑。走路不小心碰到而发生口角打架的话则罪轻。

我早就觉得“械斗”怪怪的。新庄这样的纪念日一年中有两三次。据老人说本来更多，无奈不能全部都祭祀，只好祭祀死伤最惨烈的械斗事件，而清代时更多。为政者想分裂老百姓，孙文所谓的“散沙”说的就是这个。为了分裂大家，偶尔就要煽动打群架。法律明文规定要禁止，但有时候还会暗自煽动械斗这类事情。

美国和日本都耳闻台湾黑社会势力蔑视法律问题比较严重，这可能跟械斗这个传统有渊源吧。台湾要求全部男子都要服两三年的兵役，他们对武器的熟悉程度是日本黑社会望尘莫及的。这是个令人不安的话题。

## 2.重温旧作

我用三年时间创作完成小说《鸦片战争》，还获得江户川乱步奖，作为推理小说家也已经创作十本作品，绝不是利用闲暇随便写写。做别的工作同时坚持写下三千页稿子，就是因为年轻啊。

二十三年前，我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故去的龚定盦和威利让我跑起来了似的。”我很喜欢龚定盦（本名自珍，1792—1841）的诗，他的诗略带惆怅，弥漫着当时的“哀世”情绪。我老早就琢磨着能不能把那种哀世情怀写进小说。亚瑟·威利因为翻译《源氏物语》而在日本出名，我也喜欢读他的作品。他还把很多中国古典名著译成英文，把他的译文和汉文原文对照着看，能够体会到他的理解视角非常有趣。读他的《敦煌曲子词与变文选集》等译作会为他的翻译风格所倾倒。偶然的机会还读了他根据林则徐日记创作的《中国人看鸦片战争》。对照林则徐日记一看，发现他的创作就是把日记小说化了。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和龚定盦竟然还是宣南诗社中志同道合的好友。定盦的恋爱事件、猝死都成了谜，感觉这些都能成为很好的创作题材。

我想在参考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以小说的方式进行创作。鸦片战争揭开近代之幕，我在创作时也要画上浓重一笔。好多人都问我：查资料一定很辛苦吧？幸运的是拜前人所赐并没有特别辛苦。中国史学会编纂的《鸦片战争》（六卷本）几乎涵盖了当时清朝方面的全部史料。英国方面的主要资料则有幸弄到《中国档案》，是战前丸善复制刻印的版本。

《鸦片战争》出版一年后，我拿到了直木奖。颁奖宴会上评审委员大佛次郎对我说：“有你在实在太好了！”大佛先生曾在战争期间创作有关鸦片战争的大河剧小说，无奈只写完一卷就中断了。他说中断的理由主要是他自己无法阅读汉文资料，必须拜托他人。当时还从大佛先生那儿听到这样感兴趣的话题：战争期间，德国一个无名作家也写了鸦片战争题材的小说。他想弄到一本来参考，于是去寻找。这期间还经历了大空袭，最终还是杳无音信。于是他的小说以流产告终。

我的《鸦片战争》却是幸运的。后记中我写道：“这部小说能够问世，要深深地感谢自始至终给我很多帮助的讲谈社的诸位。”现在依然对他们心存感激。能够反复再版发行到今天，正是因为有很多对亚洲近代充满关心的人。

那之后，我又写了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相关的作品，又追溯历史写下《中国历史》一书。而创作这些的原点就是那部《鸦片战争》。

## 3.落成的来历

横滨的关帝庙建于明治六年（1873），历经关东大地震、横滨大空袭、1986年火灾后又得以重建。今年（1990）8月14日举行落成典礼，我从神户应邀前往。

汉白玉石栏杆、参拜道路、台阶、电龙石、屋顶的琉璃瓦均由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负责，本殿、牌楼的木雕、涂装、龙柱、屋顶装饰、祭坛及室内刻画装饰由台湾挥华石材有限公司负责。大陆和台湾建筑人员在同一工作现场分担完成，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横滨的华侨虽然都各有自己的思想和信条，但对于关帝庙再建却是出奇的团结一致。就这一点我感到特别高兴。我们与会者坐成一排，眼前挂着“祝横滨关帝庙落成”的横幅。坐我旁边的永六辅先生问我：“本来是值得庆贺的落成典礼，为什么会用‘掉下来’这个意思的‘落’字呢？”我一听就慌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好。那么说来，落第、落伍、坠落、堕落、没落等词中的“落”字确实都不是什么好的寓意。我只好回答人家说，回去查查看。回家后我赶紧翻开诸桥《大汉和辞典》找“落”字一项：“宫殿竣工时祭祀此事。”举出的例子是《春秋左氏传》：“楚子建章华之台，与诸侯一同祈愿落成。”好像是“落”字的特殊用法，至于说为何这么用就不得而知了。《大汉和辞典》中在上面的例子下面还有这样一条解释：“新做好的钟上面要涂血。”为了清洁新完工的东西，古代要用神圣的祭祀用的牲畜之血来涂一下。古代字典《尔雅》中解释“落”字为：“死也。始也。”大概是把“死”既看成是一种结束，也看作下一个生的开始。据说中国的挽歌中包含着对复活的祈祷。还有让死者口中含一个蝉形玉的风习，称为“含蝉”。土里的蝉要脱壳而生，用此来象征死者的复苏。让死者口含蝉形玉，祈祷被葬者会像蝉一样重生，如此看来死便是下一个生的开始。那“落”字的意思既是死又是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了。

“落款”是落成款识的略语，完成字画创作时要写上名字，按下自己的印章。我写完稿子时也多会在第一页写上题目和名字。本来是因为写的过程或许会想到更合适的题目，因此题目都是放到最后来写，也说不定是下意识地想到祖先传下来的“落款”之意。

## 4.我未成名时

我决心要做专职作家是获得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发表作品后开始小有名气，当作家之前是我的无名时代。没有志同道合的杂志发表的经历，处女作就拿了如此大奖，一成为作家我便成名。即使之前有一点点名气也基本等同于无名。

成为作家之前，我帮着家里做贸易。说是做贸易，根本没碰过销售业务，主要是事务性工作。父亲已看出我没有什么商业才能。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信，客户多是东南亚华侨，信也多是中文写的。就是所谓的“尺牍”，当成汉文的问候文理解就好。或许有人会说难，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和日本问候差不多，有固定格式，只要写出相应商谈项目就行。

行情报告、装船通知、价格交涉、品质/数量以及索赔/不满等“基本商务应用文”，我的工作就是对这些的具体应用。神官的祝词中用于结婚仪式、奠基仪式、新建房屋、开业、除厄等各种情况，只要换一下相应的名词就可以。我的工作和神官的工作很相似。

实际的业务往来全部用电报（那时候还没有电传、传真之类）进行，尺牍只用作确认或补充内容，没什么重大责任。也有时候需要把电报上表达不了的微妙之处通过尺牍来传达，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有来访的华侨客商见到我会表扬说：“你的尺牍非常易懂。”可是父亲却常说我：“你的尺牍有毛病。”本该用常规表达的地方我会有意识地用其他说法，算是对固定格式的一种抵抗吧。

我有个朋友做神职工作，他擅长写祝词，对写祝词也有热情。虽然他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到极致，但并不给人专心致志的感觉。如今已是故人，无法问知他的工作心境了。我也如此，把尺牍仅当成自己的工作来做，写得略有文采时还会有点儿小得意。也许就是因为每天如此按部就班才激起我创作小说的热情。

在我无名时代的后期，就是成为作家之前的几年，我家开始和中国大陆做贸易。新中国的商务应用文不使用旧“尺牍”格式，就用白话即口语写应用文。有人说：“那就轻松很多吧。”但对我来说不太适应用白话文来写信。尺牍尚有格式，只要把相关内容填进去即可，但是白话文是没有固定格式的，好几次我把白纸蒙在脸上叹气。

从中国进口梧桐木时有河南梧桐和山东梧桐两种，后者单价要高一些。进口原木发给同业者，同业者再根据使用目的用电锯把木头切割成适当大小。有时电锯还会弹飞，原来原木里有子弹。树木生长时会把打在身上的子弹给包进去，从外表却看不出来。即使收到投诉也不能让产地方负责，子弹也许是日本军留下的。看树木年轮也有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即使是做生意也会与“历史”相遇。

我原本就很喜欢读历史，想以某种形式将自己生活的时代真切地表达出来。还经常读一些现在的推理小说。学生时代还把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当成英语学习资料，可谓爱屋及乌，从对作者的关心到后来在研究社小丛书中探寻夏洛克·福尔摩斯侦探集。比起想成为作家，我更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贸易的事务性工作。理由是自己和他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商业才能，兄弟姐妹也多，因此不需要由我来继承家业。我的处女作《枯草之根》中有贸易商人登场，是一部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推理小说。不谦虚地说，我觉得自己是入了适合自己的门儿。时光如梭，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创作初期以贸易为主题和背景，我写了不少小说。因为是自己熟悉的领域，采访调查什么的就没花什么时间。

我现在的作品主题早已远离那个领域，我也不再是通晓内情的人。三十年间贸易形态也发生巨大变化。当年我把淡路和北海道产的圆葱大量出口到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现在日本却开始从台湾进口圆葱。帮家里做贸易生意之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回台湾老家做过一阵子中学英语教师。那段时期也正是竹下原首相在故乡的中学教英语的时间，更巧的是我和竹下氏同岁。在台湾时，我目击那些从大陆败退的军队接踵而来。等着回神户的那当口儿，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想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就是在那时开始萌发的。

这三十年里，我搬了几次家，但基本都是能够看到神户港的地方。神户还填海建立起人工岛，转眼间又建起大楼、酒店和医院。现在从我书房里能够远眺到六甲岛。几年前还是围着海的一条线，而今已经填海建成各类设施。

## 5.三十年

冒昧地说自己的私事实在抱歉，1991年迎来我作家生涯的三十周年。略去练笔期，我的作家生涯是从三十年前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开始的。三十年一张嘴就说得出来，但假设从现在开始重新再来一个三十年，到那时我就是九十七岁高龄。想想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从1924年我出生那一年往前推三十年，应该是1894年，那一年是明治二十七年，说干支是甲午年。这一年的年初，日本和中国之间发生了战争。

再往前推三十年正是幕府末期风云急变的1864年，发生了池田屋事件、佐久间象山暗杀、禁门之变，是充满血腥的一年。任意选择一个历史时间点，往前推三十年和往后推三十年都意味深长。但是真的要说三十年的变化之大，恐怕还是迈入二十世纪后，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后半期。

成为作家一晃已过去三十年——这是我的真切感受。《说文解字》中解释说：“三十年为一世。”原来如此，怪不得有说“卅”是“世”的一种变形，一直以来我深信不疑，每逢去哪里做三十周年致词时我都会说这个由来。但遗憾的是实际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最近的古文字研究表明“世”和“卅”没有关联性，反倒是和“生”字有相近之处，新的生命意味着世代交替。

二十世纪初期或中期时有说法说若仔细打量“葉”字会发现那中间有个“世”字。生长在人的周围，与人有着亲密关系的植物一旦过了最繁盛的时期，就通过新生来进行交替。人类观察植物时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遂把那个交替期命名为“世”。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实际上的始祖。整个唐朝避讳他名中的“世”字，用“代”代替。接替之意的“交代”中“代”与“世”相同，总之，世代是必须交替的事物。

人出生后有二十年时间要做入世准备，过了二十岁就要从年老的父母那里接替工作，干上三十年再交接给孩子，这是正常的位置交替。因此可以把三十年看作一个“世代”。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今已有2542年。居住在台湾的孔德成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后人。用除法算一下孔子的嫡系家谱是每三十三年一个“世代”。

虽然文学领域中“世”与“卅”没什么关系，但基本上也是三十年一个世代。说起作家生涯，三十年绝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意味着已经进入“捶肩”时期。哦，不！有人会安慰说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提高不少，条件也比过去要好得多。那就借这吉言继续搞好创作吧。给自己找个借口说“等到告一段落”，实际上却已经在计划好多工作。说老实话，现在连回顾三十年的空闲都没有。

## 6.重逢之旅

为了一睹台湾四十一年的“沧桑之变”，我踏上归乡之旅。信息化社会的今天，我们通过影像、印刷品或是和朋友谈天说地都可以了解一些“变”化，因此对于“沧桑之变”没有那么“惊魂动魄”。台湾山河的风貌之变可以在日本山河风貌的变化中找到一些影子。最令人担心的则是土地面积狭小。日本还有像北海道那么广阔的原野没有人的痕迹，对马也是没有受到工业化浪潮侵袭之地。日本尚有这样的边缘地带，台湾就很少见那样的地方。没有走遍台湾不敢以偏概全，但隐约觉得台湾的工业化从地域角度来看已经临近极限，而且听说空气污染很厉害。

我感觉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四十一年前我离开台湾时，我的学生们还只是中学刚毕业，十六七岁的青葱时期，现在他们也已经五十过半。一个女学生说自己已经有九个孙子。除了见过个别因为生意到日本的学生外，与大部分人都是四十一年后的重逢。没有比这次重逢更让人有感于岁月了。大家学习完基础课程后走上社会，还有的在更高学府学习专业知识、技术，各自选择工作、结婚、育儿，是充分体验人生过程的四十一载。四十一年绝不是短暂时光，这些岁月中饱含人生的厚重，而且二十世纪后半叶还是充满动荡的时代。

站在我面前的这群学生饱含人生阅历，他们的脸上印着他们各自的历史。虽然无法知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之变”，但是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充满故事的脸，我便开始感动，这些是有别于霜鬓斑白那种外在变化的。这次归乡除了学生，我还想见一见那些好久不见的亲戚、朋友、熟人。除了重逢，还想一睹山河风貌之变，下次有机会要再到各处好好转转。

归乡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博物馆。我虽然不是行家，但是对文物很感兴趣，不论去哪里旅行都会拿出时间找找看看中国文物。大英博物馆还特意允许我看了斯坦因的藏品。在中国大陆接触的上好文物都是新出土的东西，传世文物还属台湾。如果是古玩爱好者一定两种都想一睹风采吧。这次参观博物馆不光大饱眼福，还承蒙秦院长厚意，专门请学识深厚的研究员为我解说。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原本计划参观一天，因为实在太棒了就又专门去了一次。

我不单单把文物当作美术品来欣赏，文物还是我们祖先生活和思考的一种体现，通过追溯那种美的意识让自己由衷地产生共鸣。在故乡台湾，我亲眼看到那些利用精湛技术制作出的、饱含民族悲喜的文物，不禁心潮澎湃。我想这也是一种“重逢”。

此次时隔四十一年的“重逢之旅”是承蒙《中国时报社》邀请而成行，受到相关人士的诸多照顾。回到日本神户市自己家后我又去了趟美国，过完年才又回家。因为这些日程的耽搁直至今日才向大家表达谢意，心里很愧疚。借本文向各位表达深深的感谢！

## 7.又一跋——《中国历史》开笔之时

我原本就有些懒，不大愿意出门，就那么一直待在家里工作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写历史或历史小说时最好能到具体发生历史的地方走一走，司马迁也好赫罗德特斯也好，他们也都是大旅行家。我也极力改造自己，尽量多出去旅行。

种种外在原因使我经常到处走，大家都误以为我特别喜欢旅行，于是我就顺水推舟把这个形象坐实了。开始创作《中国历史》时是1980年夏天。前一年开始我出去旅行的时间就多了起来。先是1979年3月一整个月为创作小说《太平天国》到广东花县、广西金田村和桂林、武汉转了转。9月为录制NHK电视台纪录片《丝绸之路》的第一集《遥远的长安》而飞赴西安。10月为拍摄《天竺之行》沿途走访吐鲁番、库车、克孜尔、大龙池、喀什，后进入帕米尔高原到达塔迪库尔干。12月飞赴印度，参观了纳兰陀、菩提伽耶、瓦拉纳西、埃洛拉、阿旃陀等胜迹。

1980年春天从香港途经海路到达厦门，游历了福建武夷山。又跟随鉴真和尚像回乡省亲去了扬州，之后经由长沙游览成都、峨眉山、重庆等地，又去了洛阳、龙门、少林寺、曲阜、泰山及黄河下游各处。4月初至5月中旬是旅行高峰期。7月作为朝日的海上大学讲师从博多出发奔赴天津，参观了清朝的东陵等处。回家屁股还没坐热，8月再次协同NHK电视台拍摄《丝绸之路》的第八集《热沙中的绿洲吐鲁番》而飞赴新疆。《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就是在乌鲁木齐的旅馆里写的，后面内容是在烈日炎炎的吐鲁番写的。现在回想起来旅行途中人会变得兴奋，创作热情也随之大涨，文思泉涌，第一卷（文库版第一卷的前半部分）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完稿。

最近又翻出《遥远的长安》的录像来看，画面中的我站在西安的钟楼上力劝电视观众出去旅行。十二年前的我头发比现在要黑得多，整体看上去也比现在年轻而精力充沛。那时正好是我构思《中国历史》的当口儿，好像胸中正在沸腾般，手里的笔仿佛自己就能飞起来似的。现在想来好怀念那时候充沛的精力。

## 8.凝视“人”

或许是种错觉吧，觉得走在大街上经常遇见老朋友。旧制中学毕业至今年正好五十年。同年级的小伙伴都已退休，退休后的再聘业已告一段落。四五十岁的人中在大街上晃晃悠悠的大概就属我这样职业的人吧，同级的同学中做管理工作的现在正是最忙的时期，看不见他们也实属正常。

在自己的家乡长大、工作、老去是极为平常的事，但实际上看看身边会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一直以来没有在神户遇见老朋友，除了他们繁忙的原因外，还因为很多人都出外到别处了。离开老家到别处去的伙伴，除了工作还因为孩子教育和升学的关系，不能说回来就回来。终于熬到退休，孩子们也独立成家后才重新恢复自由之身。有几对朋友夫妇都因此回到神户，他们多数已经不工作，因此会在大街上偶遇到，互相看到时会“嗷”一声打招呼。有时候会有些结结巴巴地，生怕打错招呼认错人。

我很享受这种偶遇，不由得联想到鱼儿洄游来。他们是“洄游”回来的，而我一直在这里。他们是平常的，而我则有些“不正经”的感觉。游牧民虽然没有固定居所，但实际上好像画圈定范围似的，基本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移动。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洄游。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死在鄂尔多斯，遗骨根据他的遗嘱被搬运回他的出生地附近埋葬。他的墓穴至今未被找到，据说在他儿时捕鱼、嬉戏的鄂嫩河附近的可能性很大。

驰骋于世界的成吉思汗都要回到故乡安眠，洄游也许是人的一种本能吧。地方政府除了招纳年轻人居住，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回来的老人及有回来打算的老人，为他们提供一些适宜的住处呢。能够注意到大街上的老人说明我也不年轻了。

## 9.杂谈书库

我常常想象司马迁写《史记》时的样子，没有纸只能靠竹简和木简来书写。现今出土不少汉代的竹简，长度多在27.6厘米左右，在汉代相当于一尺二寸的长度。标准宽幅大约一厘米，而马王堆出土的竹简宽幅在0.7厘米左右，银雀山出土的在0.5厘米左右；厚度约一毫米。竹简细薄细薄的，写字的人也尽可能把字写得小小的。

马王堆的竹简用作陪葬品的列表，因此写得很舒展。银雀山的《孙子兵法》每行则写了三四十字，密密麻麻的。上下各留有仅两厘米左右的余白，却要用墨笔写下比我们使用的稿纸格子还小的字。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书写，眼睛一定都累坏了吧。

我们参照的《春秋左传》和《国语》等古文献也都是用竹简书写而成，不是现今的我们能够使用的参考文献。不论把竹子和木片削得多薄也不会比纸还薄，因此总是要和庞大的资料苦斗一番。由《太史公自序》中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可知，司马迁当时使用的可能是国家文书馆。文书馆为石造，重要的文献都用金属盒盛装。他在父亲去世三年后成为太史令，因此可以自由出入国家文书馆。国家文书馆被称为“秘府”“密室”“秘馆”“秘阁”，“石室金匮”是其别称。自从发明造纸术后，书籍的保存变得容易起来，比起竹简时代利用文书馆要方便多了。

管理文书的政府部门为秘书省，负责的官员称为秘书监。阿倍仲麻吕遣唐时委以官职，他在回国前就是担任此职。唐朝时秘书监是从三品官，与京兆尹（京城最高长官）、御史大夫（最高检察长）同一级别。称政府的各部长官为尚书，都是正三品，副手称为侍郎，是正四品。以此类推秘书监相当于部长级官员。

秘书省中还有著作局，书写所有书籍并进行保存。校书郎或正字一职是正九品，在秘书省的官中级别最低。书写本身就是种学习，因此多把此处看作为将来培养干部之所。后来成为宰相的张九龄、元稹原来都曾做过校书郎，既是闻惯文书馆味道的宰相，也是诗人。

还有不少民间藏书家自建书库的例子。十六世纪明朝时的范钦官至兵部侍郎，他就在家乡宁波建造大型书库“天一阁”并得以保存至今日，还模仿二十八星宿做了二十八个橱柜，橱柜里铺上除湿石，将书籍全部纳入其中。所藏之书允许在书库内阅览，不许携带出去，书库内严禁烟火。据说紫禁城的文渊阁书库就是模仿天一阁建造而成。我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范钦这个人，还把他写进自己的长篇小说《战国海商传》。

## 10.学生之花甲

今年正月开始就忙得不可开交，我教过的学生中有十几个人都在这一年（1992）迎来自己的花甲之年，我应邀为他们写些庆祝纪念之类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回到台湾，在老家新建的中学教了一段时间英语。我在日本受的教育，分别在小学三年级的春假、中学二年级的暑假时回台湾待了二十天左右。说是故乡却没有那么亲切，即便如此我仍保持着一颗强烈的爱乡之心。

众所周知，台湾经历了大约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用日语实施教育。可怜的台湾儿童六岁上学时从零开始学习日语，用日语接受六年的初级教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用日语教学的体制也随之瓦解，孩子们又开始用汉语接受教育。学习新知识这一点与日本统治时没什么大区别，授课语言方面也没太多担心。大部分台湾人都讲闽南话，虽然是方言但语法和语调方面都与汉语一脉相承，总之比起日语授课是要轻松很多。学生们都努力学习语言，适应新的学习内容。重视教育的传统下，各县市纷纷建立起初级中学。我老家新庄乡镇人口大约有一万人，即使算上近郊人口也到不了两万人。就这条件还是努力建起初级中学，我也因此得以成为一名教员。

日本是四月开学，中国则是九月开学。我们县中学正式的开课时间是战后第二年九月，当年五月举行入学考试招收了一百三十人左右三个班的学生。开学前还为同学们开设了国语补习班。再说说当时入学的学生情况，大部分新生是当年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已经念完两年制高等科，这些同学只接受过八年日语授课的教育，觉得没有学过国语（中文）就进社会有些不安。有一些原来的高等科一年级的学生也参加考试，还有一部分是应父兄意愿念完五年制小学的优秀学生准备直接念中学的。这样第一届学生中有高等科毕业生、高等科一年级学生、小学六年制毕业生、小学五年制毕业生。我教了他们三年英语，他们七月毕业，我当年十月又回到日本。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这三年我和他们一起，共度青春岁月，对他们也有着别样的眷恋。

但那之后我一直没能再回台湾。刚开始遇上日台往来的困难期，再后来因为家业主要是对中国贸易，我频繁前往大陆，还走过丝绸之路，心想台湾当局不会给我发签证。实际上就是那么个情况。后来形势终于有所改观，1990年我受邀回台湾做日本文学讲座。令我最为感动的是新庄中学的学生们专门为我开了同学会。掐指一算我离开台湾已经四十一年，分别时他们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四岁，如今都已五十多岁了。用一句老套的话来说就是不胜今昔之感！把当时同学会上同学们写的赠言翻出来一数，有六十四人来参加了聚会。当年入学时是三个班，毕业时就变成两个班，有一百名左右的同学毕业。聚会时还有不在台北的学生，也有已经故去的学生，应该说同学会的出席率还是很高的。大概是新学校第一届学生凝聚力强的缘故吧，他们每年开两次同学会。那次聚会上我和大家约定以后每年都来参加。第二年我如约回台，同学会上见到了上次没见到的学生，其中就有赖阿渊同学。前面我介绍说这届学生上下跨了四个学年，实际上还有一个学生已经高等科毕业一年，就是赖阿渊。但是最后他没能毕业。二年级结束时他转学到邻近地方的高级中学去了，本来晚了三年但又跳级挽回一学年。原来同学会对没毕业的同学也敞开大门。还有念完两年中学去念女子师范的同学也来了。

会上听说赖阿渊已经年过花甲，我本来一直以为学生中最年长是五十九岁。还有好几个高等科二年级毕业的说“来年过花甲”，我把要过花甲的学生名字都记了下来。当时数是有十二个人，可能还有漏掉的。他们向我邀约给他们写点儿什么。

今年过花甲的有十几个人，明年是小学六年制毕业的那些同学过花甲，人数更多些。小学五年制毕业的同学还有十几个人。正月里做这样值得庆贺的事很开心，花甲的日语说法是“还历”，而“華”字是由六个十字组成的字。

## 11.闲谈中药

对我来说中药的味道就是祖父的味道。祖父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去世，那之后我家就从神户北长狭搬到了海岸街五丁目。从此中药的味道便从我的身边淡去，海鲜的味道愈来愈浓。

不论在北长狭还是海岸街时，我家都会来很多同乡，一般都会住一两日再走。当时航线的起始口岸是神户和基隆。大阪商船、近海邮船、去台湾的船都是从神户的中突堤出发。住在东京的人或其他地方的人去台湾的话也都要从神户出发。从中突堤出发开往台湾的船是正午起航。

祖父去世是昭和八年（1933）的事，那时从东京来的话要先坐夜间火车到神户，再从中突堤换船。但是这种交通方式实在太着慌，于是大家多选择提前一天到神户住上一晚，再坐次日正午的船。海岸街上的小旅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我家旁边隔着两户还有一个名叫竹中的三层小木楼旅馆。走得近的同乡把孩子送到东京留学，那些孩子会经常来我家住上几天。我在日本长大，原本对故乡台湾没什么亲近感，战后回乡时见到那些曾在日本见过的同乡便觉得十分亲切。

铺垫部分有些冗长。祖父在世时有一位不寻常的老人会经常来我家住宿。说他不寻常是因为一般人只住一晚，最多也就两晚便起程，而这位老人总会长时间住在我家。说是老人其实并没有那么老，只不过小学生的我会觉得他是个老人。父亲总是称呼那个人“先生”，那位先生在我家时，家里总会飘着浓郁的中药味儿。

先生恐怕是位中医，祖父向先生学习中医。祖父兴趣广泛，对中医也十分有兴趣。后来壮年时我归乡听人说祖父虽然不是医生，却经常给病人开处方。估计是煞有介事地给乡下得个小感冒的人开个普通方子。

好像是中药味儿太重以至于周围邻居苦不堪言，于是先生和祖父的中药学习只好偷偷摸摸地进行。至少当时给我那样一种感觉。我上中学后听父亲说那位先生当时正遭到警察追捕，是抗日活动分子。隐约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不是因为中药味儿，而是先生主动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缘故。父亲应该和我提过先生的名字，但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先生来我家时经常让我喝煎药，我对先生就有种畏惧感，哪个小孩儿会喜欢苦药呢？自然对煎药的人不心存好感了吧。

和那位先生熟识后，祖父决心重新学习医学。本来祖父已经过起了隐居生活，应该不会再为医学东山再起吧。那时祖父同时迷恋上种兰花和中医，现在我书架上有祖父收藏的《陈修园医书七十种》丛书，就是当时买的。陈修园是福建人，名念祖，是乾隆朝的举人，还精通医术。这套丛书由他收集七十种医书并加入解说而著成，以他书房之名命名为《南雅堂医书全集》。上面还盖着上海益书局石印，书也已破旧不堪。我偶尔会从书架上拿起医书，眼前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和中药的苦味。祖父习惯出声一节一节地读。七十种医书里有一部《医学三字经》。《三字经》是为初学儒学者编辑，每句三字且押韵，十分便于记忆。众所周知开头是“人之初，性本善……”，作者是宋朝的王应麟。《医学三字经》就是仿照此形式，开头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岐伯、黄帝被称为医祖，《灵枢》《素问》《难经》是古代医书。说是给初学者用的医书，对我来说却很难懂，但反复诵读便其义自现。四书五经也是如此，古人都是先把内容背诵下来然后慢慢理解意思。我尝试着像诵经那样读《医学三字经》，偶尔会出现我知道的“无梦遗，十全设”之类的药名。梦精指没做梦却出精液，因此要喝十全大补汤。产后第一方则有“小柴胡，首特笔”一句，可以推测出小柴胡汤为首选之药。

我的处女作推理小说《枯草之根》中的侦探陶展文是中国餐馆的店主，他的副业就是中医。他开处方的场景，我就是参考祖父的藏书写出来的。

比起中医，从孩童时中药的味道便已渗入我的身体。记得为《朝日报纸》做《茶事遍路》的连载时去中国的茶产地福建省采访，一听说福州中医研究所正在研制将中药渗入茶叶的秘方时，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参观。那项研究已完成，研制出的“药膳茶”在日本也能买到。因为正在研制时便去看过，且对身体有益，我一直都在喝这款茶，还把这茶推荐给其他朋友。

中国称汉方药为“中药”，称汉方医为“中医”，但实际上只是中药、中医的一种而已。其他像藏医学和维吾尔医学都是中医。喀什也有中医院，那里就是采用维吾尔医药进行治疗，特别是治疗白癜风很有名。很多上海、天津的患者都慕名而来，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把在这里制成的药拿到其他地方用就不见效，只有在这里用才行，具体原因不明。

## 12.吉川的《三国志》和我

都说现在日本是“三国热”。明治之前日本人也喜欢三国志，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受到大家的青睐。昭和时代的我们说起三国志当属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吉川的《三国志》影响广泛而深远，虽然也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底本，但不是湖南文山那样的“译本”而是独立创作的“小说”。

幽默的口吻使整部小说的每个人物都给人栩栩如生的感觉。以忠诚汉室为主线，却没有因此削减故事的幽默感。可能因为不是说日本的故事，笔者的笔触十分轻松，悠然自得。读小说也有个人喜好之分，要说吉川英治的代表作，较之《宫本武藏》和《新·平家物语》，更喜欢《三国志》的不乏其人。说得夸张点儿，这部作品凝聚着吉川英治的全部心血。故事的推进方式、人物对话、余白、读者的喜好都安排得游刃有余，这种笔触的纯熟只能用与生俱来来形容。吉川的创作才能在《三国志》这部以异国历史为舞台的作品中自由自在地发挥。后来写三国的作家都因为吉川英治这个高起点而十分辛苦。仿佛攀登高墙般，有的人中途跌落下来，还有的人不得不另辟蹊径。我就是那其中一人，我没有反复去读吉川英治看作底本的《三国演义》，而是直接选取与刘备阵营相对立的曹操作主人公。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当然也是陈寿写《三国志》的原本路径。不得不说的是，吉川英治依照的《三国演义》属于宋代《三国志平话》流派，以庙会时评书先生说的剧本为源本。删掉无聊之处，又渲染了听众喝彩之处，投听众所好又不让人犯困，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到民众喜好的创作方式。把曹操写得过于恶毒，又过于美化刘备，不得不说这是满足民众心理的做法。吉川英治看中这一点，把中国民众的愿望通过小说介绍给日本读者，从而实现了文化交流。

就我个人而言，吉川的《三国志》是我的“作业集”。料事如神的诸葛亮登上历史舞台可谓风流倜傥，不由得让我去想“诸葛亮为什么如此伟大”。作为回应，我写小说《诸葛孔明》就好像是给老师提交作业。不知道回答能否让出题人吉川老师满意，却获得了吉川英治文学奖。

## 13.史籍无载

挖掘乙墓是1978年的事，该墓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千米的擂鼓墩东团坡上。由陪葬品可以断定棺内之人是战国时期曾国的诸侯，名“乙”，因此称之为“曾侯乙”。挖掘出土第二年，我在湖北省博物馆看到一部分文物。那时候称该墓为“擂鼓墩墓”。也许是当时还没有确定该墓主人的缘故吧。今年三月至五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曾侯乙墓”特别展，我也有幸时隔十三年再次一睹出土品的真容。

该墓为竖穴木椁墓，地宫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与闻名于世的马王堆（墓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9米）规模相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贵妇人遗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震惊世界。曾侯乙则全部为遗骨。从出土文物来看，曾侯乙墓要丰富得多。时间上曾侯乙墓比马王堆要早上250年，只是没有出土像马王堆那样保存完好、防腐技术高超的遗骸，因此知名度不如马王堆高。

出土的青铜器上还刻有楚惠王五十六年为曾侯乙所造的铭文。准确时间应是公元前433年。那时春秋时代已结束，处于战国初期。曾国还在当时的大国楚的势力范围内。但是《史记》等记载该时代的文献中未曾出现过曾这个国名。墓被挖掘后才知道有曾国的存在，一国之主为侯爵。

十三年前，令我在湖北博物馆受到打击的就是这件事。学问的世界中，有人主要依赖文献，也有人将研究重点置于田野调查，就暂且把这两类人分为书斋派和田野派。我虽然不是学者，但从事历史小说创作，如果分类的话我也属于书斋派。

还听过这样一件事儿——京都祇园那儿开一个会，学者们在那儿喝酒。书斋派的泰斗说：“学问在书中，书是前人在头脑中反复斟酌精炼之作，都是精华。那些在土里挖东西的，不能算作学问。”由此引发田野派的年轻学者的激烈反驳，最后年轻人忍无可忍挥起拳头喊道：“这个臭老头太可恨了！”年轻时曾是柔道运动员的F氏模仿松之廊下紧紧抱住年轻人喊道：“U君，忍住啊！”

算得上劳苦之作的文献确实荟集着精华，反复咀嚼这些精华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是书斋派，但是创作小说时还是会到具体的事件发生地去看看，也尽可能出去做采访。十三年前，访问湖北就是为做《太平天国》的采访而去。太平天国军从广西北上湖南，未攻克长沙，遂转道岳阳再下武昌，一路东进一直打到南京，武昌之战也打得十分激烈。而打得最激烈之地当属东湖，现在那里已经变成公园，去看过后才知道实际规模。站在被太平天国军付之一炬的黄鹤楼遗迹之上，眼前浮现出当年太平天国军爆破城墙突围的景象。说起黄鹤楼，书斋派一定会想起李白的名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是太平天国军焚烧的并非李白歌咏的那个黄鹤楼，而是清朝乾隆元年（1736）重建的黄鹤楼，还没到百年。站在同一块土地上，遥想太平天国的战斗及一千多年前唐朝全盛时期的诗人们。太平天国军烧毁黄鹤楼后，清末一个总督在同一地点建楼阁，因为规模实在太小，没有叫黄鹤楼而另起名“警钟楼”。这座警钟楼是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武昌起义之处。此楼在1920年因火灾烧毁。我去的时候还是台地，后来借着“黄鹤楼”的知名度重新建了新的观光景观。

我这样的书斋派也逐渐开始走上田野派的道路，出门进行采访，最终走遍丝绸之路全程。出土比马王堆更多文物的曾侯乙墓的主人连同国名，都不曾在史上有所记载，这对于我这个书斋派也是当头棒喝。从墓的位置看正好处于长江和中原之间的要塞地带，如此重要之地在文献上竟然未有任何记载，实在让人难以置信。那附近还有一个随国，曾侯乙墓就是在随州市郊外发现的。千年之后封随之地给杨坚，杨坚后来夺取天下时取国号“隋”。没有直接用“随”作国号的原因是，“随”字中间夹着一个“走”，预示会是个短命王朝，因此去掉中间的“走”，创造一个新字“隋”。如此费尽心机，隋也不过是持续三十年的短命王朝。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这一带就称作“随”或是“隋”，但没有“曾”。研究曾侯乙墓的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曾会不会是随的别名。可是出土文物没有显示“随”的字样，而且有明确历史记载同时代的楚惠王曾亡命于随。这么看同地别名这一说似乎站不住脚。重要的交通要地且土地肥沃，居然没有历史记载？！这恐怕不单单是“曾”独有的现象吧。由此可以看出文献只不过记录了历史的一部分而并没有囊括全部史实。实际历史与文献并非等身大，历史较文献要更广阔。追溯历史不能只坐在书斋里读书，就是读也读不完。要迈开腿四处走走，偶尔还需要挖掘地下。

兵马俑是震惊世界的巨大发现。光是一号坑就埋藏有六千陶兵、陶马，而且都是等身大小（平均在一米八左右），被称为“地下军团”。细看屈膝拉满弓的士兵，能清晰地看到其鞋底上的防滑鞋钉，而且每个人的长相各有千秋，应该不是按模型进行的大规模生产。陶兵们手上拿的兵器都是青铜制品。

一号坑东西长二百三十米、南北宽六十二米，四周有回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如此巨大的工程竟然在历史上也没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详述秦始皇陵，甚至还说到秦灭亡后始皇墓荒废不堪的状况，却对兵马俑未做任何叙述。现今的我们看到这些感到无比吃惊，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过就是黏土烧制的人偶罢了。

项羽动用三十万人花三十天时间搬秦始皇陵的葬品也没有全部搬完，后来就放火焚烧棺椁，想得到里面的铜。大火烧了足足九十天，这么赤裸裸彻底的掠夺却连碰都没碰那些黏土烧制的俑人，因为这些换不了钱。谁都没在意兵马俑，历经漫长岁月最终埋入沙土。别说当时的人，就是那百年之后的司马迁也没打算把它们载入史册。

记录受到价值观左右，而价值观又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我们会觉得就是把始皇陵中的所有铜板都熔掉也抵不上一尊兵马俑的价值。先人辛辛苦苦记录下来的东西确实难得，但是也有比那更珍贵的东西没有记录下来。如何把这些史籍无载的东西找回来，那就是田野派的工作了。

## 14.认识自身

去年十月应邀参加“三峡研讨会”。从湖北省沙市乘坐“峨嵋号”前往重庆，逆长江而上，历时五天四夜，在船上举行不同主题的五组研讨。《朝日新闻》介绍了相关情况，本次研讨会的正式名称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亚洲国际研讨会”。去年我看到好多研讨会、演讲的题目或副标题都是“立足二十一世纪”云云。再有几年我们就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地都在面向新世纪展望未来。能够看出大家要把二十一世纪建设好的坚定决心。

二十一世纪已经悄然走来，也意味着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站在“峨嵋号”船上，我展望未来，思潮澎湃。长江后浪推前浪，未来纵然是时代的浪潮，然而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回顾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

“三峡研讨会”给我带来很大期待。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之际，组委会邀请到了台湾地区《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总编级人物、韩国《东亚日报》的副社长作为会议列席观察员并作发言。这次研讨会不光是中日之间，更是东亚范围内的一次大讨论。

推倒柏林墙、苏联解体这样大的政治事件要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次“三峡研讨会”放在几年前也是想象不到的。说不定不久的将来，很多现在无法想像的事情都会一个一个地实现。一想起这些就会很高兴，这也不失为一种“展望”。站在“峨嵋号”上，我不光考虑未来，还会思考过去，花这么大气力举办“三峡研讨会”表明现在的一些展望一定会慢慢变成现实。

历史越近避讳之处就越多。现今对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没什么避讳了，本世纪之内香港也将回归，希望能借机召开有关鸦片战争的研讨会。鸦片战争的一百年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期待着能尽快解除各类设限而展开绵密细致的学术性讨论。还可以横向与英国、美国、俄罗斯的研究进行对比，二十世纪的整体面貌便会清晰起来。不客气地说，那不会是招人喜欢的面貌。我们要清楚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在借鉴的基础上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对近代史认识不足是日本人的致命弱点，只有克服这一弱点才会在二十一世纪得到尊重。

# 第七部分

## 1.托普卡帕宫珍品展

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陶瓷器展厅原本是宫廷厨房。说是厨房，里面可以为几千人准备食物，还包括职员宿舍和储藏窖，可以说相当大。与其他工艺品、宝石、服装、刀剑等展示厅相比，空间比较充裕。要是去其他如宝石展厅，总是人满为患。

托普卡帕宫的陶瓷器藏品中中国陶器超过一万件，日本陶器也有七百件。不管展厅多大，展出的藏品也仅是一部分。其中特别夺目的大型展品排成一列，每次去都为之倾倒，中途需要出来透透气再接着看下去。按照顺路参观的话，快到最后才能看到日本古伊万里（日本古美术品中价值较高的作品总称）等陶器，这个时候游客也多有些厌倦感。此次为纪念日本与土耳其友好邦交一百周年，在日本举办的“托普卡帕宫秘藏之东洋陶瓷珍宝展”上展出了六十三件中国陶瓷、十三件日本陶瓷共计七十五件展品，这样的展示设计比较理想。

托普卡帕宫的贵重藏品几乎都没有相关记录，这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直到最近还没有收藏品的藏单。藏品中有朝贡而来的也有买来的，至于谁什么时候如何得来的都没有详细记录。不由得让人想起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史记》中详细记述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可是对兵马俑却只字未提。对于现今的我们来说，用“惊天动地”来形容那数千尊等身大的兵马俑都不算为过。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强征徭役去烧制一些人偶，当时的史家一定觉得没有载入史册的价值。

托普卡帕陶瓷器也用于宫廷宴会，属于消耗品，也许也不值得登记在册吧。想想看，陶瓷器本来就是供人使用的器皿，陈列于玻璃柜子中供人观赏也不是陶瓷器原本的作用。要大量收集配得上奥斯曼帝国宫廷的奢华程度、满足大型宴会使用的陶瓷器——源于这个初衷才会有今天这么多收藏品出现。奥斯曼帝国1299年创建，1922年因革命被推翻，是一个统治624年的长命政权。1453年攻打拜占庭帝国攻下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1478年修建托普卡帕宫殿。之前宫廷里使用的陶瓷器也一起运到那里，后来又补充不少，才有现在如此规模。海洋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日本陶瓷器运到托普卡帕宫殿，但是没有切实的历史记载。

这次珍品展上展出的最古老陶瓷器当属龙泉窑的“青瓷浮牡丹瓢形瓶”，或是南宋的物件。晶莹剔透的青瓷釉器“青瓷镐文共盖壶”可能是元初龙泉窑所造。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他们从泉州起航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1293年的事了，时间上也是奥斯曼帝国即将建国时。伊利汗国从十四世纪中期开始分裂，阔阔真公主的嫁妆何去何从了呢？珍品怕是经商人之手流落到帖木儿帝国或是奥斯曼帝国去了吧。元明时期杰出的印染技术成果也是这次珍品展的亮点。特别是“印染龙涛纹天球瓶”，产地肯定是景德镇，但应该是宣德年间设立官窑之前的作品。

明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第一次带去两万七千余人，船队由六十二艘大船组成，最终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1405年被帖木儿帝国打败的奥斯曼帝国又重新崛起。郑和是穆斯林，他率队第七次下西洋是永乐帝殁后的1431年至次年，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并派人到麦加朝圣。这一时期同时还发生的大事是穆罕默德二世率奥斯曼帝国军队进攻东欧。郑和船队肯定与当时统治麦加的马穆鲁克王朝有接触，也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多少有些礼节性交往，那时一定送了不少最高级的陶瓷给对方吧。因为没有确切的记载，我借机对这些珍品的来历做了一番愉快的想象。

## 2.漫步卡帕多西亚

去卡帕多西亚是一次深刻于我内心的感动之旅。人感怀于景观，但感动终归还是与那里的人息息相关。比如我们为千古冰河的景观所感动，而让我们如此感动的原因是冰河拒人类活动于千里之外的那份纯净。又比如我们仰望珠穆朗玛雪峰，撞击我们心灵的是人类攀峰成功那一刻的感动。特别是人类活动条件不允许的地方，如果人类挑战极限稍微成功，我们就感动无比。卡帕多西亚就是那样一块土地。

地球上有许多受风化和侵蚀作用而形成的自然奇观。我私下认定的“世界三大奇观”分别是：科罗拉多河流经科罗拉多高原形成的大峡谷、巨峰林立的桂林山水、将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褶皱之美和桂林奇峰特点汇聚一起的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地区。

卡帕多西亚本来是小亚细亚王的名字，是“骏马”的意思。那位王统治的土地要比今天我们说的卡帕多西亚大得多。当地人把这片“奇观之地”附近的城市称为内夫谢希尔，村庄则称为居里美。但是奇观之地的规模已经超越这一地区，还是全体称作卡帕多西亚更为贴切。卡帕多西亚的发音与日语中“河童”（kappa）（想象中的一种水中怪物）的发音相似，日本人略带幽默地说起来会有种轻松感。

内夫谢希尔市有五万多人，还拥有设施完善的酒店，很多人会驻足这里游览观光。这座城市往南二十千米的名为凯马克勒的地下城也一定要去看看。这座地下城二十年前得以发现，有的比较旧的旅行指南上还没有记载该城。“发现”一词用得有语病，因为当地人早就知道地下有很多屋子，利用这些地方装谷物。“发现”强调的是地下深达八层以及如此大面积的居住区作为隐身之所可以容纳几千人，而作为历史遗迹的巨大价值现在重新得到认定。

印欧语系一支的赫梯人驱走土著民族，公元前1800年前左右建立小亚细亚。赫梯王朝的中心地带就是卡帕多西亚，这里作为中枢要地后来一直是民族和部族抗争时军队往来之地。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平常耕田种地的居民们便会全部躲进地下生活。房间之间用车轮状的大石头隔开，里面还有酿造和制粉场所。人们钻研如何积攒石头缝隙里漏下来的雨水，唯一能够让这些生活在地下的人放松的便是在此酿造出来的葡萄酒。

既然是隐身之所，就不能冒出丝毫炊烟，因此最重要的就是换气装置，除此之外还要及时获得新鲜空气，因而人们苦心研究出一种“隐形烟囱”。这个地下城市还建有带祭坛的教会、聚会大厅。地下城市不光防备外敌入侵，还是基督徒抵抗镇压宗教势力的有力场所。卡帕多西亚经历赫梯王朝统治后，又陆续受到佛里吉亚、吕底亚、波斯帝国等统治，公元前二世纪开始成为罗马帝国领地。东罗马帝国时期，居民接受基督教，七世纪时阿拉伯入侵，十一世纪前后又受到伊斯兰化的土耳其政权统治。总之，这里是民族、宗教领域都非常复杂的地域。

几千人不得不潜入地下生活应该说是一种悲惨经历，他们为了民族荣誉、捍卫宗教毅然决然地选择地下生活，这种行为令人感动。游客借助地下洞窟里的灯和路线指示牌可以下到地下四层进行参观。附近还有几个这样的地下城市，也有最近刚刚在农民耕作过程中发现的。卡帕多西亚一带地下可能像迷宫一样相互连着。

从凯马克勒去居里美的途中有一个查尔达克村，那里有现在已经停用的清真寺。那里原本是基督教堂，后来改成了清真寺。不少清真寺都是这么来的，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是这种情况。只要有指示麦加方向即朝拜方向的米海拉布便可，一般建筑都能改成清真寺。前面也说过，居里美这个村名在土耳其就是指卡帕多西亚。卡帕多西亚的经典景观主要汇聚在居里美地区。那里最适宜观光，周围还有不少卖旅游纪念品的地方，看到人扎堆儿聚群的地方就是了。例如“鸽之谷”这个地方栖息着大群鸽子，人们便把岩壁挖成格子状的小坑引鸽子进入。不仅鸽子是象征和平的圣鸟，鸽子粪还是难得一见的上好肥料。把岩壁凿成鸽子窝是为了定期清理收集里面的鸽子粪。

卡帕多西亚的奇特岩石由太古时代火山喷发飞溅出来的溶岩、火山灰、粉尘等蓄积构成，后来受风化、侵蚀作用慢慢形成今天的奇形之貌。多形如竹笋，顶部像斗笠，看上去好像一个个巨大的松茸。也有人形容是帽子岩，欧洲人称其为“妖精的烟囱”。这样一说好像卡帕多西亚的景观是妖精们做成的，仿佛处在仙界一般。

周边还有称为“粉色之谷”的景点，比鸽子谷视域更宽，卖东西的店铺也多，还把骆驼牵来用于拍照。称作白之谷、雪之谷的地方无不饱含人们的期望，我们则感动于人类的智慧与鬼斧神工般的创造力。而说到人的智慧，不得不提造鸽子窝收集鸽子粪。

居里美之谷中有很多教堂和修道院，已经成为室外博物馆。人们挖洞窟建教堂、修道院，天井和墙上的壁画不由得让我想起敦煌和克孜尔的中国石窟寺院，地形地貌更像克孜尔石窟。居里美石窟教堂中最大的当属带扣教堂，在博物馆区域外。教堂中的壁画精美，以蓝色为主色调，简朴的笔致令人感动不已。卡帕多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堂群建于七世纪前后。当时日本正处于圣德太子时代，中国则是唐玄奘赴天竺取经之时。但是这些早期教堂维持原貌的寥寥无几，多数都在拜占庭帝国时期从726年开始的破坏圣像运动中遭到破坏。那时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卡帕多西亚教堂的壁画也都被剥了下来，破坏圣像运动一直持续到842年。这一地区重新出现神像是在九世纪中叶以后，带扣教堂最古老的壁画大概出现在十世纪初期。博物馆区域内的教堂中被剥下来的壁画下面还依稀可见简单的十字形几何图案。苹果教堂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壁画，会不会是禁止挂人像时留下的装饰画呢？废除破坏圣像运动后，修道士们一定极力想用壁画把自己的教堂装扮得更美。圣巴巴拉教堂里面的画想必是教堂兴建很长一段时间后即神像解禁之后才有的吧。教堂名字也多是当地人长期以来习惯的叫法，未必是兴建之初所用之名。蛇教堂里面有一张君士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二人双手握十字架的画。暗教堂里完好地保存着耶稣诞生、洗礼、被钉在十字架上、天使引导下升天诸图。草鞋教堂要爬楼梯才能上去，地板上还刻着脚印，教堂也因此得名。这样爬楼梯让我不禁想起十二年前在新疆库木吐拉千佛洞战战兢兢爬高梯时的情景。佛教与基督教虽然有很多不同，但石窟里的氛围却出奇地相似。不论是站在教堂的祭坛前还是佛教寺院的祭坛前或是清真寺的龛前，都是同一种心境，总觉得无论是哪种宗教本质都相同。

从居里美谷沿着干线道路往北走，有一个策尔维谷，那里也是野外博物馆，有葡萄教堂等几个石窟教堂。总的来说没有居里美那儿保存完好，侵蚀严重，还时不时有地震发生，沿谷居住的居民们四十年前就都已经搬走了。

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参观的恐怕是卡帕多西亚石窟教堂的遗迹。不知道这些遗迹的准确数量，据说有三百多个，其中有一半教堂有壁画。有不少教堂保存得还比较好，但是也老朽得比较严重。参观策尔维谷时，导游说“下次您再来时可能就看不到和现在一样的了”，现在制粉所里的大臼子就已经裸露出来（原本是在石窟里面的），而且有一半已经崩塌掉落下来了。这种遗迹给人的感觉实在过于强烈，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很早以前这些石窟教堂就被遗弃了，实际上有几个教堂直到本世纪还在使用。姑且不论阿拉伯入侵时期，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希腊裔信仰基督教，两者之间没有互相仇视，在卡帕多西亚地区和平共处。可以推测希腊裔基督徒应该也使用了石窟教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站在德国一方的奥斯曼帝国因为战败面临被分割的命运。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支持主张大希腊主义的韦尼泽洛斯当选首相。1922年，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士克率革命军成功抵御了以希腊军为主的联合国部队的进攻。当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七月在瑞士洛桑举行和谈会议即洛桑会议，规定土耳其境内的二百万希腊人与希腊境内的九十万土耳其人进行交换。在卡帕多西亚住了几百年的希腊基督徒从此销声匿迹，那之后石窟教堂便成为遗迹，但是还算比较新。后来成为世界船王的希腊人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和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夫人再婚而为世人所知）也是此时从土耳其撤走的希腊人中的一个。

说起地下城和石窟教堂不免给人“潜伏”的印象。卡帕多西亚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居民躲在地下生活的时间其实很短，只有在战乱时才有宗教或民族迫害。我前面也说过，历代土耳其政权都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

距离居里美有些远的伊拉拉溪谷也有石窟教堂群，要下到绝壁深处才能一睹风采。过去下到谷底很困难，现在已经修好台阶。悬崖绝壁上凿出教堂和修道院更给人一种潜伏生活的感觉。不可或缺的水资源则倚赖清冽的迈兰迪兹溪流，谷底的土地虽然狭小但还挺适合耕种。

但是这种隐遁未必都是受到迫害而逃脱所致，这里的基督徒受到被誉为卡帕多西亚三星的教父们的引导，一直向往过简朴的群体生活。主张极端禁欲、隐遁的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尤斯塔修斯的弟子巴西尔、弟弟格列高利、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合称为卡帕多西亚三教父。格列高利属于东方教会，被尊崇为“修道生活之父”。逃离世俗，拥有相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的场所就是世间所称的卡帕多西亚，偶尔也是躲避阿拉伯人侵略及其他凶残势力的地下潜伏之所。钻进凯马克勒地下、巡回居里美石窟、下到伊拉拉谷底，我觉得这些遗迹让二十世纪感到羞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和平相处、杂居在一起，卡帕多西亚是二十一世纪的一面镜子。

受海湾战争冲击，卡帕多西亚游客骤减，开往当地最近的机场开塞利的航班也变少。但如果从土尔其首都安卡拉乘车前往卡帕多西亚只需要三个多小时。听当地旅行社的人说，欧洲旅行团一般要在这儿好好玩儿上三四天，日本团一般是待一天。日本团玩儿的时间短可能是对基督教壁画不太熟悉的缘故吧，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只把卡帕多西亚看作奇观之地。山谷里种植的葡萄做成的红白葡萄酒都很好喝。卡帕多西亚出现在法国神父德热法尼翁的调查报告第一卷中，该书1925年之后得以出版，欧洲人由此知道这里。

## 3.勋章

以前看苏联时期的政治会议的电视新闻报道，军人代表们的军装上都佩戴很多勋章。也许不是正式的勋章而是略章，要是戴正式勋章，可能上衣正面的一半都要被遮住。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会多少有些奇怪，还要嘟囔一句：“差不多得了。”

日本虽然有勋章制度，但没有佩戴习惯。文化勋章是挂在脖子上那种，授勋当天照完纪念照就会把勋章放到柜抽屉的最里边（有金库的人还会放到金库里），怕是没什么事儿不会随便拿出来。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文化勋章是在奈良富本宪吉纪念馆的玻璃柜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了文化勋章其他叙位叙勋都废除了。文化勋章1963年恢复授勋，每一届名单都会刊登在报纸上，《喜悦的声音》一栏中登载一些不显山露水的谈话内容。不显山露水的话大多是“这不是终身成就，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一类的内容。而授予一方自然是本着已经相当有所成就才授予的想法。文化勋章的获得者中除自然科学领域的，其余人获得勋章的年龄、经历怎么看都是终身成就的感觉。

十几年来只有文化勋章一项真的是非常理想简洁，要是文化勋章也没有了感觉会更好。去除授勋也是拜这个时代所赐，因此看到苏联军人戴那么多勋章就觉得不自然，甚至还有些滑稽。美国军人也会在出席典礼时戴上很多勋章，各国都会在正式的仪式上戴上勋章以示礼节。但是在日本只有成就等身时才会获得勋章，大使级别之下、现役外交官没人拥有勋章。因此出席典礼时就不佩戴勋章，于是便造成不懂礼节的误解。外交官们是不是需要配戴一下仿制勋章感觉的徽章呢？贫弱的印象有损国家形象，因此要下决心做一些像样的徽章。要是得了什么终身成就奖，再把那个仿制勋章换成真勋章就可以了。

除了电视和电影中，这四十多年来我没有亲眼看过佩戴勋章的人。肯定有人想戴勋章走在大街上，要是那样肯定会被说成脑子有问题，谁都没有如此勇气吧。一般勋章都分等级，勋章本身就代表等级。民主社会中不能戴那种东西，只有军队那种等级十分严格的地方才需要佩戴相应的徽章代表等级。军人戴的徽章统称“天保钱”。陆军大学校的毕业军人佩戴的椭圆形徽章很像“天保通宝”，由此而得名。从战前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一般是少尉军衔，会分配到各连队任职，升到大尉军衔就能上陆军大学校。这难度很大，合格的人寥寥无几。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最高升到校官级别，陆军大学校毕业生能晋升到将官级别。大尉少佐一旦戴上天保钱就意味着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将军阁下。因此这个徽章也预示着与其他将校的不同之处。大部分军人都进不了陆军大学校深造，佩戴天保钱便象征着少数精英派。这是与军队命令、军衔系统不同的一种象征，因此招致多数派的极大不快。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天保钱就被废除了。以前看装束就能看出阶级和职业，而今就完全看不出来了。现在有穿牛仔裤的大学教授，也有穿着宴会服拉小提琴的僧侣。当然也有人想通过穿着打扮刻意显示自己身份。牛津和剑桥毕业的人从说话能判断出来。要是想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是佩戴勋章一类的牌儿比较简便。

同是工薪阶层，为了显示与其他公司职员的不同，佩戴一流大企业的公司徽章就好。暴力组织里还有一眼就能瞅出是直系的代纹牌儿，戴上那个就可以昂首阔步。一定是为满足那些人的这种心理才想出勋章这一出。

在报纸上看到某一流证券公司的职员闯了祸，说：“戴上公司的徽章时觉得很羞耻……”那恐怕是自我意识太强，同一行业里谁也不会刻意去识别各个证券公司的徽章。勋章时代已经悄然远去，戴牌儿时代也快点儿走远吧。

## 4.清代工艺

清代工艺精巧之至，也有人批评其缺少朴素和含蓄之感。但是含蓄一词是过于主观的表达，清代工艺断然拒绝那种暧昧的伪装，坚决彰显自身之美。还有人说过于精致便感受不到制作者的气息。我却觉得没有比清代工艺更能强烈反映人的意念的了。

古代赵孟頫有诗云：“人间巧艺夺天工。”说的是人造之物比天然形成的还要美，却看不出是人工所造，这才是一种理想的艺术表现。清代的历代皇帝都有较高的审美意识，派遣到景德镇做监督官的人都是优秀人才。官窑甚至还被冠以监督官之姓，足见个人影响力之大。因釉里红而闻名于世的“郎窑”就由兼任江西巡抚的郎廷极监督制造。仿造宋代官窑青瓷的“年窑”由内务府总管，妹妹是雍正帝妃子的年羹尧监督制造。其副手唐英接任后监督制造大批作品，称为“唐窑”。此人还是个大富豪、剧作家，可以说是多面手、大文化人。

为了达到夺天工的效果就不能计较费用，需要做大量的实验和尝试性制作。历代监督官都有那样的能力，唐英等人在景德镇闭门谢客，三年与工匠共寝食。他们都是充满个性的艺术的缔造者，在他们的指挥下创造出很多明快的仿佛交响曲般的杰作。

清代工艺的深奥之趣在于，没有一丝缝隙而让人沉醉于那种高度紧张感之中。达到如此境界需要高超的技艺。我们因此而感动，也由此充分感受到人的气息。

## 5.生前交代

无论谁都会在生前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各种具体要求。但是能留下记录的还是有权力之人，一般人的愿望鲜见于文献之中。不管做出什么指示和要求，当事人死后也不会知道是否能够实现。秦始皇曾写诏书命长子扶苏从长城回到国都主持葬礼。大葬的主宰者就意味着是继承人，这是指明继承人的重要诏书。但是贤明的帝王不受重臣欢迎，他们期待的是能给他们相对自由的无能之人。于是宰相们便损毁诏书，做假诏书宣称愚蠢的胡亥公子为继承人并赐扶苏死。扶苏是劝告父亲不要“焚书坑儒”的人，如果他即位也许会改变父亲的暴政，王朝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帝王的巨大陵墓都是生前开始建造，如果等死后再建就来不及了。因此在位时间长的帝王的陵墓都比在位时间短的帝王要豪华得多。游客参观北京郊外的“明十三陵”时，有地下宫殿的定陵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帝（在位时间大约四十九年）之墓。

始皇帝用统一天下的力量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他十三岁即位，在位三十八年。虽然他的遗诏被大臣们废弃，继承人也没能按他的指示来定，但是陵墓却按照他的计划实施，建造了一座巨大陵墓。始皇帝的骊山陵在《史记》中有详细记载。把天下七十万囚徒送到此，打穿三泉（三条水脉）铺上铜板，建造宫殿、望楼，随葬品也是集尽奇珍异宝，还用水银打造百川、江河，上有天文下有地理。但是《史记》中对二十世纪才被发现的兵马俑没有任何记述。想来金银玉器是宝贵之物，而七千多尊等身大的兵马俑不过是用泥土烧制的人偶，不值得记述。

极尽奢华的骊山陵在始皇帝死后三年遭到项羽破坏，项羽将里面的贵重之物洗劫一空。三十万士兵花三十天搬运，没搬完的就一把火烧尽，这把火足足烧了九十天。**[[1]](#_1__Xiang_Guan_Shi_Shu_Ji_Zai_Xi)**巨大陵墓被这把大火燃之殆尽，人心也随之烧没了。但是后来的帝王们还是热衷于建造巨大陵墓。汉代帝王用金缕银缕将玉片缝成玉衣做寿衣，后来还偶有出土。魏文帝即曹操的儿子曹丕（220—226年在位）在遗诏中写道：“骨无痛痒之知。”他禁止用金银铜铁，棺木只要能纳朽骨便可，衣衿能包裹朽肉即可；在无法耕作的土地上建造陵墓，也不要建祭殿、围邑、墓道。他害怕死后这一指示不能实施，于是把诏书正本放于宗庙之中，复本分别交于尚书、秘书、三府保存，作为魏王朝的葬法之定规。

三国混战之时，魏挖掘历代帝王之墓，掠夺金宝作为军队资金，因此专门设立发丘（挖掘坟丘）的中郎将、摸金（找金子）的校尉这样的职位。曹操自己还亲自监督挖掘梁孝王（西汉景帝的弟弟）之墓。陈琳写檄文谴责：“破棺、裸尸、掠取金宝。”曹丕一定是看了帝王们赤身裸体的可怜相，不想自己也遭受如此下场吧，所以他写了好几个复本以求能彻底贯彻他的指示。

中国自传入佛教后便有火葬，帝王们直到清末都一直是土葬。历代皇帝担心延误国政，多在遗诏中指示要尽可能缩短服丧期，这期间文武大臣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 6.药

生病或许是邪灵捣的鬼，二十世纪的我们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事，而古代则一定认为就是那么回事。比起吃药，做驱除邪灵的法事更重要；比起医生，萨满之类的祷告师更让人信服。中国称驱灵法师为“巫”。

中唐时有位做到宰相的诗人叫元稹（779—831），壮年时曾流放到四川通州这个边境地带。那里因为白天会有老虎现身衙门而名声大噪。好友白居易怜惜他便赠诗一首，其中一句为“人稀地僻医巫少”，“医”在“巫”之前，似乎要表现医师在巫师之上的意思。其实不过是考虑平仄才会医字在前。八世纪的中国，医和巫基本属于同一级别，往往医还兼任巫。

“藥”（药）字是“楽”（乐）加上一个草字头。甲骨文中“楽”字意为两手摇着系线的铃铛。铃既用于古典舞乐，也是驱除邪灵的道具，同样，医巫兼做的人既能驱邪还能把植物用作药材。埃及和巴比伦自古便有记载草药的文献。中国则传说有位叫神农的神，用红色鞭子抽打草木，尝百草寻找医药。印度的药师如来救众生脱离病苦、灾难，左手持的药壶里装着植物。我最近去了一趟奈良的药师寺，里面种着大片药草。原本植物是药材的主体，慢慢地动物和矿物也成为药材。植物和动物都会枯萎死去，人们便认为这些原料做不出不死之药，于是便把目光投向稳定的矿物，用来炼丹。

有好几个中国皇帝喝了不老不死之药即刻便死，那赶快召来巫师摇铃铛不就好了？比起病，需要赶紧医治的恐怕是人的欲望。

## 7.向往慈悲

公元618年，中国经历四个元号更迭，分别是隋大业十四年、隋黄泰元年、隋大兴元年、唐武德元年。这一年玄奘三藏十七岁，正在洛阳净土寺修行。隋朝受李密军围困，“饿殍十之二三”，已经濒临灭亡。

《隋书》中有如此描述：“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简直一幅地狱之图。一千三百年后，也是十七岁的平山郁夫看到同样的地狱景象。身处广岛原子弹爆炸地，这已决定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玄奘三藏为众生求向佛教，平山郁夫的绘画事业也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隋末的地狱景象，史书中用“天下土崩”来形容，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藏法师传》的作者写道：“白骨交衢烟火断绝。”用以形容少年玄奘三藏茫然站在街头，目睹眼前的惨状。同样，少年平山也把自己看到的惨烈景象刻进脑子里了吧。

画作《佛教传来》是平山郁夫的成名作。我想象不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算是他的起点，唯有此。库车当地人告诉我说：“大概一个月前，平山先生来这儿了。”几乎是同一时期，我和平山郁夫机缘巧合地都去了那条佛教传来之路。站在天山南麓，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用文章来表达这里的感觉。眺望这一望无际的黄沙世界，我仿佛已经词穷，或者说是涌起一种恐惧。此时我试图想起平山郁夫的画作。看着眼前这绵延不断的风景，我为何要把平山郁夫的画作放进来呢？

平山郁夫描绘残酷的大自然时，脑子里一定偷偷地把少年时看到的地狱图融入自己的画中了吧。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也许我们眼前也能浮现出那般景象。再唱着《般若心经》去遐想，那便是玄奘三藏封存自己地狱般体验的风景吧。空中无飞鸟，地上无走兽。如果真的有生命碎片，路边倒下的人和骆驼骨头便是路标，这便是死的世界。我用《赛之河原》来形容这样的戈壁。死的世界里玄奘三藏和平山郁夫都曾身处这样的景象，这原本便是有缘的风景。

平山郁夫描绘的“佛教传来之路”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追求极致之美的画家审美，还有信者的那片诚心。即使画中描绘的是一个放逐人类的世界，而我们却无法从他的画中放逐自己，他的那份温存来自信仰。

佛教原本连佛像都没有，为回应那些无法满足于“法”的人才画出菩提树、台座、脚印这些来代替佛陀，后来逐渐才有佛像。佛教信徒们深谙这种暗示，仿佛在心里插上美好的翅膀飞翔。鉴赏平山郁夫的画时就能充分感受到这样的暗示。

天山一带原本是佛教传入之处，现在大多信仰伊斯兰教。遗憾的是佛教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平山郁夫以这个地区为主题的作品，包括《佛教传来》在内都充满梦幻色彩。在幻想的世界里遨游的未必只是和佛教有缘之人，追求美的人描绘的世界都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反对把平山郁夫的作品都冠以“佛教美术”之类的名字。

我去敦煌时看到许多极美的壁画，画里所展示的另外一个世界远超出我们平时对佛教的想象。不，“另外”这种说法不准确，应是一个过于广阔，实在无法用语言来概括的世界。我想平山郁夫以画家的感性精准地捕捉到了敦煌放射出来的光芒。

平山郁夫还热心于文化财产保护活动，特别在保存敦煌文化遗产方面倾注很大精力。我能充分体会到他的这份心。温厚的他试图摆脱死亡的恐惧，想像玄奘三藏一样蜕变，敦煌就是他的导航灯。敦煌以东是佛教世界，佛教遗迹的保存也要比天山南麓好得多。但也有不少遗迹随着时间慢慢变得脆弱不堪。平山郁夫在描绘炳灵寺、麦积山、云冈及布达拉宫时，心里一定有种想要通过作品来保存这些遗迹的想法。这种保存不是单纯对外形的保存，更是从精神上守护缔造这些遗迹的人之魂。

看似平山郁夫作为画家的业绩与文化财产保护的工作不在一条线上，但仔细一想，这二者的延长线是相互交错的。如果仔细鉴赏平山的作品就会领悟到这其中的道理。

我把元末倪震林**[[2]](#_2__Zuo_Zhe_Si_Jiang_Yuan_Mo_Hua)**描绘的无人世界和平山郁夫的沙漠画一起比较着看，会发现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倪震林的画作中贯穿一种拒绝精神，平山郁夫的画中许诺姿态是主基调，用佛教用语来形容就是“慈悲”。画家心中燃烧着对慈悲的向往，已全然流露于画中。

注解：

**[[1]](#_1_114)　相关史书记载项羽盗掘秦始皇骊山陵，但对烧毁陵墓一说未有明确记载。——编者注**

**[[2]](#_2_62)　作者似将元末画家倪瓒误写作倪震林。——编者注**

# 原载一览

第一部分

《故宫文物》（1990年1月21日熊本孔子庙明清展指南）

《东之桃源乡——有关徐福》（1990年2月14日角川书店）

《牧歌期的终焉》（1990年5月9日《朝日新闻》报社的《周刊百科》）

《关帝庙的由来》（1990年7月12日）

《气之运行》（1990年8月19日妇女之友杂志社《明日之友》）

《二羊图》（1990年8月30日《墨》）

《青瓷色》（1990年10月17日《银座之铃》）

《曲笔史官》（1990年9月12日In·Pocket）

《埋头》（1991年1月20日《青丘》）

《吴越》（1991年2月4日佐贺东亚文化交流研究会杂志）

第二部分

《十八世纪的酒馆、茶馆、客栈》（1990年3月10日朝日新闻报社《周刊百科》）

《茶馆和茶文化》（1990年3月10日朝日新闻报社《周刊百科》）

《茶故事——茶的礼节》（High-Mrs.1990年1月号）

《茶故事——水和茶》（High-Mrs.1990年3月号）

《茶故事——英国茶》（High-Mrs.1990年5月号）

《茶故事——茶里加冰》（High-Mrs.1990年7月号）

《茶故事——乌龙茶》（High-Mrs.1990年9月号）

《茶故事——俄式茶壶》（High-Mrs.1990年11月号）

《话说麹子》（1990年4月11日Esquire）

《待春》（1990年10月30日《四季之味》）

第三部分

《桥的故事》（Oval 1992年5、6月号）

《威尼斯和桥》（Oval 1992年7、8月号）

《鹊桥》（Oval 1992年9、10月号）

《查理大桥》（Oval 1992年11、12月号）

《首里城的故事》（Oval 1993年1、2月号）

第四部分

《驴的价钱》《金钱之恨》《陪购随想》《汽车社会》《同名同姓》《海尔比》《羊》《女性的名字》《夫妇别姓》《白菜》《义战》《常识》《袈裟》《红白》《升田氏的木屐》《典礼问题》《文字》《萨拉丁》《命名》《乌鸦》《俘虏的命运》《伸缩》《云仙》《信息化社会》均出自（1991年1月4日至6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报社promenade）

第五部分

《关于二十年》《改变视角》《船之眼》《琉球馆客商信局》《紫禁城的甲胄》《苦瓜琐记》《奇谈怪论》《酒铺泡盛屋》《新米利特组织》《清明》《布拉哈的劝酒文化》均出自（1992年6月21日至1993年6月20日《冲绳时代周刊》）

第六部分

《械斗》（1990年2月2日《民涛》）

《重温旧作》（1990年5月9日朝日新闻报社）

《落成的来历》（1990年8月19日shinika）

《我未成名时》（1990年11月4日《全读物》）

《三十年》（1991年共同通信社）

《重逢之旅》（1991年中国时报）

《又一跋——〈中国历史〉开笔之时》（1991年3月5日In·Pocket）

《凝视“人”》（1991年7月30日《周刊新潮》）

《杂谈书库》（1991年12月5日《神奈川近代文学馆》）

《学生之花甲》（1992年1月6日《全读物》）

《闲谈中药》（1992年1月19日《周刊朝日》）

《吉川的〈三国志〉和我》（1992年7月23日“吉川文学奖”）

《史籍无载》（1992年5月15日别册文春）

《认识自身》（1992年12月25日朝日新闻报社《论坛》）

第七部分

《托普卡帕宫珍品展》（1990年7月11日）

《漫步卡帕多西亚》（1991年6月12日全日空《翼之王国》）

《勋章》（1992年11月15日《中央公论》）

《清代工艺》（1992年5月14日《朝日新闻》）

《生前交代》（1992年7月21日《朝日新闻》）

《药》（1993年3月22日No side）

《向往慈悲》（1991年2月18日《平山郁夫全集》）